

战略决策研究

(双月刊)

JOURNAL OF STRATEGY AND DECISION-MAKING 2024年 第1期(总第84期) 第15卷

目录

全球治理

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及其限度

欧歌 (3)

大国战略竞争

按行自抑：崛起国何以战略收缩？

普宜媛 (25)

国别研究

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的行动逻辑及前景研判

石立春 (60)

区域问题

非对称性报偿结构如何影响地区合作

——基于对南亚区域合作进程的分析

李铭恩 (85)

Journal of Strategy and Decision-Making (Bimonthly)

Table of Contents

Global Governance

Biden Administration Restarts US Climate Cooperation with China and its Limits

OU Ge (3)

Strategic Competition Among Major Powers

Self-restraint: Domestic Reason for Rising Power Strategic Retrenchment

PU Yiyuan (25)

International Studies

Operational Logic and Prospective Analysis of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Ideological Offensive against China

SHI Lichun (60)

Regional Issues

How does Asymmetric Structure Determine Regional Cooperation :

an Analysis of Regionalism in South Asia

LI Mingen (85)

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及其限度

欧 歌

摘 要：拜登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其上任后着手重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陷入停滞的美国对华气候合作。为此，拜登政府“内外兼修”，在国内重振气候治理政策议程，在国际上恢复履行全球气候治理义务，进而推动重启与中国的气候合作。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是拜登总统个人及其政策团队的气候理念使然，受到民主党气候立场传统、党内进步派施压、利益集团推动等国内政治因素驱动，同时也服务于其总体对华政策。但重启却始终难以摆脱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范式束缚，面临对华更加强硬的共和党不断掣肘、中美围绕全球气候治理责任分摊的立场差异难以弥合以及气候优先还是遏华优先的两难选择等多重因素制约。

关键词：气候治理；拜登政府；中美合作；战略竞争

作者简介：欧歌，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气候变化的消极影响日益凸显，国际社会合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紧迫性陡升。美国和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碳排放国，也是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且最具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能力、资金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两国能否在气候问题上进行有效合作关乎全球气候治理成败。因此，主张严肃应对气候变化的历任美国政府都高度重视对华气候合作，气候合作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更是成为中美关系的一大亮点。但特朗普政府极端消极的气候政策和对华政策给一度积极的中美气候合作按下了“暂停键”。同样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竞争”取代“接触”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核心。拜登执政后继续推行对华竞争战略，却又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试图在对华战略竞争的框架内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

鉴于拜登政府的气候优先理念和多边主义倾向，学界期待中美气候合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对本文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作在拜登政府时期能够取得积极进展，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气候变化合作应该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支柱，为不断探底的双边关系起到“托底”作用。^①不过从现实来看，拜登政府的对华气候政策既不同于特朗普政府时期的“避而不谈”，也区别于奥巴马政府的“合作导向”，其“边合作边竞争”“合作中藏竞争”的两面性比较突出。既有研究从拜登政府的气候政策构建和实施、能源产业布局等多方面剖析，认为拜登政府对华气候政策的整体竞争色彩浓厚，且竞争程度、内容和形式较奥巴马政府时期明显变强、增多、升级。^②上述研究的切入视角是合适的，得出的结论也是中肯的，但总体而言对合作面的关注相对不够，未能充分体现拜登政府对华气候政策的两面性，也未能深入阐释竞争与合作之间的相互关系。合作诉求是拜登政府较之特朗普政府对华气候政策的重大转变，也是其进步意义所在，因此从寻求重启对华气候合作的视角观察拜登政府的对华气候政策不失为对既有研究的有益补充。鉴于此，本文拟结合拜登时期美国气候政策调整、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变化和中美关系新近发展，探讨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的具体内容、背后动因及其制约因素，并尝试揭示重启对华气候合作与拜登政府总体对华政策之间的逻辑衔接以及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之间的现实冲突。

① 参见王瑞彬：《拜登新能源气候政策取向及中美合作前景探析》，载《国际石油经济》2020年第12期，第28-33页；于宏源、刘璐莹：《面向全球1.5度温控时代的中美气候变化合作》，载《能源》2021年第12期，第64-67页；唐新华：《美国气候战略及中美气候合作》，载《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1期，第8-16页；Aimee Barnes, “How the US and China Could Renew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Center on Global Energy Policy, December 18, 2020, https://www.energypolicy.columbia.edu/wp-content/uploads/2020/12/Biden_China_CGEP_Commentary_v3.pdf; David Victor, “Rebuilding US-Chinese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pportunity”, Brookings, October 28, 2021,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rebuilding-us-chinese-cooperation-on-climate-change-the-science-and-technology-opportunity/>。

② 参见汤伟：《拜登政府对华气候政策的竞争逻辑》，载《现代国际关系》2023年第3期，第22-40页；孙海泳：《拜登政府对华新能源产业竞争的导向、路径与前景》，载《国际关系研究》2023年第1期，第132-153页；于宏源、张潇然、汪万发：《拜登政府的全球气候变化领导政策与中国应对》，载《国际展望》2021年第2期，第27-44页；Ferguson and Michael P. “Strategic Imperative: A Competitive Framework for US-Sino Relations”,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Vol. 15, No.3, 2021, p.51; Nima Khorrami, “Can China and the US Cooperate on Climate Change?”, *The Diplomat*, November 22, 2022, <https://thediplomat.com/2022/11/can-china-and-the-us-cooperate-on-climate-change-2/>。

一、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

拜登政府执政后，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列为执政优先事项，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是其气候政策议程的重要内容。为此，拜登政府统筹内政与外交，在国内重振气候治理政策议程，在国际上恢复履行全球气候治理义务，进而推动重启与中国的气候合作。

（一）“内外兼修”奠定对华气候合作基础

一方面，重振国内气候政策议程。“好的外交政策始于国内”，拜登政府意识到要重拾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美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信心，需要坚实的国内气候治理基础支撑。拜登政府的国内“气候新政”集中体现在其推出的两大历史性气候立法上。一是《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Jobs Act，以下简称《两党基础设施法》）。2021年11月15日，拜登正式签署《两党基础设施法》，法案计划总投资额达1.2万亿美元，是美国近半个世纪以来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法案。法案将应对气候变化与重建美国基础设施、加强制造业、创造高薪就业机会、发展经济等并列为投资优先事项。具体而言，该法案将通过支持升级改造电力基础设施、建立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器网络、扩大公共交通和客运铁路并使之电气化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同时帮助社区增强对干旱、野火、飓风等极端天气的抵御能力，并对环境清理和修复进行历史性投资。白宫称法案是“确保美国能够应对气候危机的第一笔重要投资”。^①二是《降低通货膨胀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IRA）。2022年8月16日，拜登总统签署了堪称迄今为止美国历史上最雄心勃勃的气候清洁能源立法——IRA。法案计划投入370亿美元用于建设清洁能源经济、降低新能源消费成本、推进环境正义和增强气候适应能力，因此该法案又被称作“气候法案”。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Chuck Schumer）称“这项法案将在美国开启一个崭新的清洁能源时代”。

^① “FACT SHEET: the Bipartis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Jobs Act Advances President Biden’s Climate Agenda”, White House, August 05,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8/05/fact-sheet-the-bipartisan-infrastructure-investment-and-jobs-act-advances-president-bidens-climate-agenda/>.

另一方面，恢复履行全球气候治理国际义务。特朗普于2017年6月1日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The Paris Agreement），意味着作为全球温室气体第一大历史排放国、第二大现排放国的美国背弃了减排国际承诺。拜登执政后采取一系列行动恢复履行美国全球气候治理的国际义务，展现气候行动雄心。2021年1月20日，拜登总统执政首日便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启动了美国重新加入《巴黎协定》的程序。同年4月，拜登政府更新了美国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NDCs）：2030年美国的温室气体净排放量将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50%~52%，这一新的减排目标意味着美国的减排量要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承诺的减排量基础上翻番。另外新的NDCs还包括美国在2035年之前实现电力行业净零排放和在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①2021年11月2日，白宫发布《美国甲烷减排行动计划》（U.S. Methane Emissions Reduction Action Plan），承诺到2030年将人为甲烷排放放在2020年的基础上减少30%。^②拜登政府还推动国会参议院于2022年9月21日通过《基加利修正案》（Kigali Amendment），承诺美国将减少氢氟碳化物的生产和使用。此外，为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拜登政府先后发起了“小岛屿经济体倡议”（SALPIE）、“国际气候融资计划”（Climate Finance Plan）、“气候农业创新特派团”（AIM for Climate）、“适应和复原力紧急计划”（PREPARE）、“可持续银行联盟”（Sustainable Banking Alliance）等全球气候援助计划或倡议，重点为气候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见表1）。

（二）重启对华气候对话

对话往往是合作的第一步，拜登政府积极重启对华气候对话，为中美气候合作创造条件。元首层面，拜登总统在与习近平主席的多次通话和会晤中都主动提及要同中国就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进行合作。自2021年1月20日入主白宫以来，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共进行了五次通话，除了双方第四次通话（2022年3月28日）专门讨论乌克兰问题，其余四次通话拜登总统都同习近平主席谈到了要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其中双方第五

^① “Reducing Greenhouse Ga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2030 Emissions Target”,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NDC/2022-06/United%20States%20NDC%20April%202021%20Final.pdf>.

^② “U.S. Methane Emissions Reduction Action Plan”, White House, November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11/US-Methane-Emissions-Reduction-Action-Plan-1.pdf>.

表 1：拜登政府提出的全球气候援助计划或倡议

发起时间	倡议或计划名称	主要内容
2021年3月22日	“小岛屿经济体倡议”	旨在建立一个加强美国与加勒比、北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区岛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框架，巩固当地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基础
2021年4月22日	“国际气候融资计划”	重点关注国际气候融资，提供或调动财政资源，协助发展中国家减少和/或避免温室气体排放，建立复原力并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
2021年4月23日	“气候农业创新特派团”	由美国和阿联酋共同倡议发起，寻求通过增加对气候智能型农业和粮食系统创新的投资和支持来推动更快速和变革性的气候行动
2022年11月11日	“适应和复原力紧急计划”	旨在通过为适应和复原力工作准备知识、资金和私人资本，提高发展中国家适应和管理气候变化影响的能力，重点帮助建立抵御气候对粮食系统、水、基础设施、健康和经济影响的韧性
2022年11月11日	“可持续银行联盟”	支持美国国际开发署与全球社区金融机构和银行协会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银行开发侧重于气候融资、气候风险管控和碳核算的工具和能力，以深化可持续金融部门，鼓励设定气候融资目标

资料来源：根据白宫网站简报相关内容整理制作，<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

次通话（2022年7月28日）“特别关注气候变化”（见表2）。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分别于2022年11月和2023年11月在巴厘岛G20会议期间和旧金山APEC会议期间举行元首会晤，应对气候变化问题都成为双边会谈的重要内容。两国元首对气候变化的高度重视构成重启中美气候变化领域合作的政治基础。^①

作为对中美两国元首推动气候治理合作共识的落实，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John Kerry）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进行了多次会谈，就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进行磋商协调。值得一提的是，克里

^① 解振华：《中美应重启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从遏制竞争走向共赢》，载《全球化》2021年第2期，第15页。

表2：拜登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五次通话

通话时间	通话方式	通话内容
2021年2月10日	电话通话	拜登表示“美中两国应该避免冲突，可以在气候变化等广泛领域开展合作”
2021年9月9日	电话通话	双方达成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协调合作的共识
2021年11月16日	视频通话	双方特别讨论了气候危机以及美国和中国可以发挥的重要作用
2022年3月18日	视频通话	重点讨论俄乌冲突
2022年7月28日	电话通话	特别关注气候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白宫网站简报相关内容整理制作（通话时间以美国当地时间为准），<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

和解振华两人曾分别作为中美首席气候谈判代表在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上合力促成了《巴黎协定》的签署，两位“老将”的重逢对于中美重建气候工作关系具有积极意义。2021年4月14日-17日，克里作为总统气候特使首次访华，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在上海举行会谈，双方就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相关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沟通交流。此次访问的成果体现在会后发表的《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声明一方面强调了中美气候合作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为双方未来一段时间在气候领域的务实合作做出了具体部署。声明中关于“气候危机”的表述是双方第一次在书面文件中用“危机”来定义气候变化，表明中美在气候变化的威胁认知上取得了一定共识。同年8月31日-9月3日，克里二度访华，并与解振华在天津再次举行会谈，双方就一系列气候合作具体问题交换了意见。为落实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达成的关于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共识，中美气候特使及团队分别于2023年7月16-19日在北京、11月4-7日在加利福尼亚阳光之乡举行两轮会谈，最终发表了《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强调“中美双方重申致力于合作并与其他国家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危机”，并决定启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开展对话与合作，以加速21世纪20年代的具体气候行动。^①

^① 《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2023年11月13日，https://www.mee.gov.cn/ywdt/hjywnews/202311/t20231115_1056452.shtml

（三）推动对华气候务实合作

随着美国对华气候合作对话的重启，中美之间的气候务实合作也渐次展开。鉴于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和特殊影响力，拜登政府寻求与中国协调以共同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多边进程。克里首次访华达成的《中美气候危机声明》表示，“中美致力于相互合作并与其他国家一道解决气候危机，这既包括强化各自行动，也包括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等多边进程中开展合作。”^①克里首次访华的一个重要背景是由拜登总统倡议的领导人气候峰会举办在即，拜登政府希望得到中国的有力支持，确保领导人气候峰会的成功举办。2021年4月22日，应拜登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以视频方式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展现了中美携手推动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姿态，成为此次峰会成功举办的一个重要标志。同年4月，解散三年后得以重启的G20可持续金融研究小组在G20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上升级为可持续金融研究工作组（SFWG），由中国人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任联合主席，共同牵头G20可持续金融工作。10月，SFWG发布了《2021年G20可持续金融综合报告》，并推出《G20可持续金融路线图》，提出促进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多项建议，成为中美重启气候合作后的首批重要合作文件成果。

此外，中美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的关键时刻携手推动了会议进程。2021年10月31日-11月13日，因新冠大流行延期一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届缔约方会议（COP26）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在各方围绕减排路径激烈争论致大会僵局之际，中美共同发布了《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宣言通过回顾历史、着眼当下、展望未来体现了两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成为COP26的主要成果之一，也成为大会的重要转折点，最终会议以各方签署《格拉斯哥气候公约》圆满落幕。同样的一幕再次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27）上演。由于各方围绕大会协议文件细节争执不下，原定于2022年11月18日闭幕的会议被迫延期。11月19日，中美气候团队宣布恢复因佩洛西访台而暂停的双边气候变化问题正式磋商，为充满分歧的沙伊赫谈判进程开辟了一条“外交生

^① 《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中国政府网，2021年4月18日，http://www.gov.cn/xinwen/2021-04/18/content_5600381.htm。

命线”。^①大会最终通过了《沙姆沙伊赫实施计划》成果文件，就气候变化减缓、适应和《巴黎协定》履约等重点议题做出进一步安排，释放了继续坚持多边主义、合力加强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积极信号。2023年12月13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在延期一天后闭幕，中美在大会期间进行了积极的协调与合作，有力推动了大会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大会就《巴黎协定》进行了首次“全球盘点”（Global Stocktake）、就“损失与损害”基金、能源公正转型等多项议题达成“阿联酋共识”，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

与此同时，中美在清洁能源、甲烷减排、绿色金融等方面积极开展政策对话、项目交流与研究合作。2021年6月22-23日，中美能源与水联盟年会重启，来自中国科技部和美国能源部的官员以及中美相关研究人员共150余人参加，双方就进一步开展清洁能源科技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挑战进行了交流协商。甲烷减排是中美气候合作的一个新亮点。2022年1-6月，来自中美两国20家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开展了关于甲烷减排的联合研究，并共同撰写了一份旨在推进中美甲烷减排合作的研究报告。报告通过对两国甲烷排放现状、相关政策框架和减排机会的全面概述，为两国梳理了甲烷减排方案，明确了两国在排放清单编制、政策和标准、技术推广应用等方面的合作可能。^②中美绿色金融合作也持续推进。2021年12月，在国际金融论坛（IFF）第18届全球年会上，国际金融论坛同高盛集团共同启动了中美绿色金融工作组，工作组将汇聚全球企业的高级领导和领先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共同深入研究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加强公共及私营领域的绿色金融协作，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建议和工作支持。^③2023年10月23-29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访华。访问期间，纽森州长先后到访了香港、深圳、广州、北京、上海、江苏等

^① Chao Deng and Sha Hua, “Resurrection of U.S.-China Ties Boosts COP27 Climate Talk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17, 2022, <https://www.wsj.com/articles/resurrection-of-u-s-china-ties-boosts-cop27-climate-talks-11668698953>.

^② Jenna Behrendt and Mengye Zhu, “Roadmap for U.S.-China Methane Collaboration: Methane Emissions, Mitigation Potential, and Policies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Center for Global Sustainability, University of Maryland & Energy Foundation China, 2022.

^③ 《国际金融论坛第18届全球年会在穗举行》，中国新闻网，2021年12月4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cj/2021/12-04/9622294.shtml>。

地，与中国政府、地方以及企业界重点商讨环境保护、清洁能源转型等气候变化合作问题，并签署相关合作谅解备忘录。在中美气候合作重启的背景下，纽森州长此访开启了中美地方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新篇章。

二、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的动因

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有多层动因：一是与拜登总统个人及其政策团队的气候理念有关；二是受民主党气候立场传统、党内进步派施压、利益集团等国内政治因素驱动；三是服务于拜登政府的总体对华政策。

（一）拜登总统个人及其政策团队的气候理念使然

首先，拜登总统本人是一个典型的气候保护主义者。拜登在国会担任参议员期间就对气候变化问题特别关注。从美国国会网站的统计数据来看，从第99届国会（1985-1986年）到第110届国会（2007-2008年），拜登作为参议员共提出了9项法案或决议，其中5项都与气候变化问题有关。另外，拜登还作为共同发起人参与了其它多项与应对气候变化有关的议案和决议。1986年，拜登参议员推出《全球环境保护法案》（S.2891），建议政府建立一个全球气候工作组，以研究、制定和实施一项协调的全球气候国家战略，体现了拜登看待气候变化问题的多边理念和全球视野。^①进入奥巴马政府后，拜登作为副总统负责监督了《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of 2009）的实施，其中包含900亿美元清洁能源投资。2020年大选期间，气候变化问题成为拜登的核心竞选纲领。拜登将应对气候变化与控制新冠肺炎疫情、复苏美国经济、恢复种族平等并列作为政府施政的四大优先事项，成功塑造了“气候总统”的标签。

其次，被拜登任命为总统气候特使的克里也是坚定的气候治理派。同拜登一样，克里在做参议员期间大力推动气候变化立法。美国国会网站的统计数据显示，从第99届国会（1985-1986年）到第111届国会（2011-2012年），克里作为参议员共提出了多达26项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议案或者

^① 参见美国国会网站：<https://www.congress.gov/member/joseph-biden/B000444?q=%7B%22search%22%3A%5B%22Global+Environmental+Protection+Act%22%5D%2C%22sponsorship%22%3A%22sponsored%22%7D>。

决议。^① 2004年大选，克里作为民主党候选人参选，其重要主张就是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以应对气候变化。2009年7月，作为参议院外委会主席的克里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全国记者俱乐部讲话中呼吁，“为应对气候变化，美国和中国需要只争朝夕地建立气候伙伴关系（Climate Change Partnership）。”^② 2013年1月，克里接替希拉里出任奥巴马政府的国务卿，推动了中美在战略经济与对话框架下就合作应对气候变化进行磋商。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克里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气候代表进行了数十轮磋商，最终促成了《巴黎协定》的成功签订。如今再次出任总统气候特使，可以说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贯穿克里整个政治履历。

最后，负责拜登总统外交安全政策的核心团队普遍支持中美气候合作。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与拜登一样，都曾在奥巴马政府有过供职经历：布林肯曾任拜登副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随后官至国务院的常务副国务卿，沙利文曾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两人都不同程度参与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制订和执行，也见证和亲历了中美气候合作的黄金时期。沙利文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Kurt Campbell）在正式进入拜登政府之前还曾在《外交事务》上发表《没有灾难的竞争：如何与中国在竞争中共存》一文，就美国对华政策发表见解，认为美国应避免冷战逻辑，与中国进行“没有灾难的竞争”（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是完全可能的，美国与中国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存在合作的空间。^③

人事即政策，随着带有气候治理偏好的拜登入主白宫，布林肯、沙利文、克里这类民主党传统建制派政策精英进入政府外交安全决策团队，他们的气候情结和政策理念也逐步反映到拜登政府的对华气候政策之中，构成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的重要推动力。

^② 参见美国国会网站：<https://www.congress.gov/member/john-kerry/K000148?s=1&r=1&q=%7B%22search%22%3A%5B%22John+Kerry%22%5D%2C%22sponsorship%22%3A%22sponsored%22%2C%22subject%22%3A%22Public+Lands+and+Natural+Resources%22%7D>。

^① John Kerry, “America And China On The Road To Copenhagen: Toward A Climate Change Partnership”, July 29, 2009, <https://china.usc.edu/sen-john-kerry-america-and-china-road-copenhagen-toward-climate-change-partnership-july-29-2009>.

^② Kurt M. Campbell and Jake Sullivan, “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 How America Can Both Challenge and Coexist With China”, *Foreign Affairs*, Vol.98, No.5, 2019, pp.96-110.

（二）受到国内政治因素驱动

其一，是对民主党传统气候立场的回归。气候变化在美国不仅是环保科学议题，也是个政治议题。在有关如何看待及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调查显示：近八成（78%）的民主党人将气候变化描述为对国家福祉的主要威胁，相比之下，只有大约四分之一（23%）的共和党人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主要威胁。^① 不过随着极端天气在美国的频繁发生和造成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采取实际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大多数美国选民（56%）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美国应该与中国合作来解决这个问题。^② 拜登作为典型的民主党建制派，重启对华气候合作既符合民主党在气候问题上的传统立场，也是对广大民主党选民诉求的积极回应，且在全球气候危机日益凸显的背景下，这种进步主义立场也能形成对共和党的某种“道德优势”。

其二，受到党内进步派的施压。民主党进步派和温和派在美国对华气候合作问题上存在一定分歧：前者认为在对华气候合作应优先于对华战略竞争，后者则认为可以兼顾对华战略竞争和对华气候合作。拜登虽属于典型的温和派，但进步派的政策诉求对拜登难免产生影响。2021年6月9日，美国参议院通过遏华色彩浓厚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U.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USICA）后，长期支持民主党的28个进步团体写信敦促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推动一种更平衡、更合理的国家安全方法来应对与中国的竞争，而不是让类似USICA中咄咄逼人的条款为与中国合作解决从气候变化到核扩散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制造困难”。^③ 同年7月7日，被认为是拜登传统“票仓”的四十多个进步派组织致信拜登总统和国会，

^① Alec Tyson et al., “What the Data Says about Americans’ Views of Climate Change”, Pew Research Center, April 18, 2023, <https://www.pewresearch.org/science/2020/06/23/two-thirds-of-americans-think-government-should-do-more-on-climate/>.

^② “Understanding American Voter Attitudes Toward U.S.–China Climate Cooperation”, The 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 February 2021, <https://asiasociety.org/sites/default/files/2021-02/Download%20the%20Joint%20Paper.pdf>.

^③ “28 Undersigned Groups, Are Writing to Urge You to Support Efforts by House Democrats to Advance a More Balanced and Reasonable National Security Approach to Competition with China”, 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 July, 2021, <https://quincyinst.org/wp-content/uploads/2021/07/Pelosi-Letter.pdf>.

“呼吁拜登政府和所有国会议员在处理对华关系时避免采取目前主动性的对立方式，而应优先考虑多边主义、外交方式与中国合作，以应对气候危机这一生死攸关的威胁。”^①

其三，国内利益集团的推动。利益集团政治是美国政治的本质，美国的气候政策最终取决于各个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以及它们之间的利益交换和妥协情况。^②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得到国内以清洁能源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利益集团的支持。他们希望中美气候合作，以加快落实全球减排进程，推动全球能源转型提速升级，从而有利于进一步扩大清洁能源产业的国内外市场。另外，伴随着气候变化认知的深化以及新能源技术的普及和发展，美国国内支持全球气候治理的利益集团正在不断壮大。如代表金融资本的华尔街开始意识到在碳交易、新能源等气候融资方面有利可图，转而支持全球气候治理。此外，面对气候危机背景下全球能源转型的大势所趋，美国传统能源集团内部开始出现分化。一些传统化石能源、汽车制造等行业也开始进行业务转型和拓展，如埃克森美孚专门成立了碳捕集和封存商业化的新业务子公司，通用电气提出“净零排放”的战略发展目标，不断加大对低碳产业的投资力度。业务的转型和拓展也带来气候立场的逐步转变，传统能源利益集团内部坚决反对气候治理的一派式微。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布局绿色产业的美国跨国公司纷纷寻求扩大在华业务，争夺中国市场，他们也更倾向于支持中美气候合作。

（三）服务于拜登政府的总体对华政策

拜登政府一方面继承并发展了自特朗普政府确立的对华竞争战略，但另一方面也寻求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打击毒品、粮食安全、全球宏观经济等领域与中国进行合作。换言之，拜登政府寻求与中国的“竞争性共存”。在拜登政府看来，“竞争”是美国对华战略的核心，但“共存”是前提，而气候变化事关人类生死存亡，与中国进行气候合作即是为了“共存”。202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不能让分歧阻止我们

^① “Cooperation Not Cold War to Confront the Climate Crisis”, Friends of the Earth, July 7, 2021, <https://foe.org/wp-content/uploads/2021/07/Cooperation-Not-Cold-War-To-Confront-the-Climate-Crisis-129.pdf>.

^② 赵行姝：《透视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载《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8期，第51页。

(美国和中国)在诸如应对气候变化这类关乎彼此人民利益和世界共同利益的优先事项上共同前进。”^①需要明确的是，拜登政府的对华气候政策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虽然寻求与中国进行气候合作，但不会改变拜登政府对华进行“长期竞争”和“激烈竞争”的总体政策，且在某种程度上服务于这一政策。这里的基本逻辑是：拜登政府认为，要“竞赢”(Out-compete)中国，美国必须注重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但特朗普政府赤裸裸的单边主义行径和对华极限施压并没有提升美国的竞争力。^②拜登政府希望推动美国对华政策由“蛮对抗”到“巧竞争”的转变。具体到对华气候政策上，拜登政府不断推动对华“合作型施压”，^③以合作之名行竞争之实。

一方面，拜登政府通过重启对华气候合作以回应国际社会诉求，带领美国回归气候治理多边主义，使美国在对华竞争中更具“道义的力量”。为实现上述目标，拜登政府采取了“损人利己”的策略。所谓“损人”，是指拜登政府旨在贬损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国际形象，具体表现为炒作“中国气候责任不够论”。尽管中国制订了“到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拜登总统依然认为中国还需要“强化温室气体的排放目标”，克里也称“中国在气候应对方面做出的承诺还不够好”。在中国宣布因佩洛西窜访台湾暂停双边气候变化工作商谈后，克里指责中国“不识大局”，认为中国暂停气候变化商谈“不止是在惩罚美国，更是在惩罚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所谓“利己”，是指拜登政府注重打造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负责任”形象，展现全球气候领导力，占领国际道义制高点。具体而言，拜登政府通过设定较为激进的减排目标，加大国际气候治理援助力度等，以凸显美国的气候雄心和中国的“贡献不足”。例如COP26大会期间，拜登政府宣布与欧盟正式发起“全球甲烷承诺”(Global Methane Pledge)，提出到2030年将全球甲烷排放减少至少30%的目标，拜登政府在全球甲烷减排的目标设定上“带节奏”，不仅可以彰显美国的负责任形象，也可以借此向中国施压。

^①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hite House”, October 2022, p.25.

^② Kurt M. Campbell and Ely Ratner, “The China Reckoning: 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97, No.2, 2018, p.70.

^③ “合作型施压”是指一方充分利用合作的契机，以合作领域、合作规则、合作概念和合作方式来影响另一方。参见王帆：《不对称相互依存与合作型施压——美国对华战略的策略调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2期，第35页。

另一方面，拜登政府借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重振西方国家气候议题联盟，联合盟友以确立起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导权和规则主导权，形成对华竞争的“领导力优势”和“规制效应”。特朗普政府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避而不谈”，导致当时美欧在全球气候治理问题上几乎“无话可谈”，不仅损害了美欧同盟关系，也客观上推动了中国与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问题上利益契合，全球气候治理成为中欧合作的一个重要支撑点。拜登政府强势回归全球气候治理，推动重启与中国的气候合作，不仅可以打破中欧在全球气候治理问题上的协调共治局面，争夺全球气候治理话语主导权，还可以离间因全球气候治理而密切的中欧关系。为此，拜登政府将依靠盟友、注重“规则”的遏华策略在对华气候政策中如法炮制，即通过与盟友协调，率先在气候治理领域确立符合自身利益的相应规则，再将规则进行“国际化包装”，构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期实现对中国的“规锁”（Confinement）。如拜登政府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提出美国要与印太伙伴在清洁能源、脱碳等基础设施方面加强合作，其本质是要在印太地区确立起一套清洁能源生产、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的标准和规范。2021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年度报告，称拜登政府将把碳边境税纳入考虑，以改革国际贸易体系，并宣称要与盟国合作对不履行环境义务的贸易伙伴采取行动。^①一旦美国与盟友特别是已经建立“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的欧盟就碳税问题达成一致，建立某种形式的“气候俱乐部”（Climate Club），^②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写国际贸易规则和全球气候治理规则，对中国形成规制压力。

三、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的制约因素

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始终难以摆脱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范

^① “2021 Trade Policy Agenda and 2020 Annual Report”,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2021), March 2021,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reports/2021/2021%20Trade%20Agenda/Online%20PDF%202021%20Trade%20Policy%20Agenda%20and%202020%20Annual%20Report.pdf>.

^② “气候俱乐部”是指积极落实碳减排责任并就“国际目标碳价”达成一致的各方成立一个集团，集团成员之间实行自由互惠贸易，但对非集团成员国的进口商品则征收统一的碳关税，作为对其不积极承担减排责任的惩罚。参见 William Nordhaus, “Climate Clubs: Overcoming Free-riding in International Climate Polic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105, No.4, 2015, p.1341.

式束缚，面临多重制约因素。从国内政治维度看，气候立场相对消极、对华态度更加强硬的共和党始终是中美气候合作的一大障碍；从国际政治维度看，中美围绕全球气候治理责任分摊的立场差异难以弥合，拜登政府同时面临气候优先还是遏华优先的两难选择。

（一）共和党的强势持续压缩中美气候合作空间

反华遏华已成美国“政治正确”，共和党热衷于通过批评拜登政府重启对华气候合作是对华软弱和攫取政治利益。就克里访华商谈气候合作一事，时任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共和党领袖迈克尔·麦考尔（Michael McCaul）指责克里是在“对中国发出错误信号”，表示美国“不应和正在制造或恶化国际问题的国家合作”。^①保守派媒体《华尔街日报》更是形容克里之行是“借气候向中国磕头”。众议院监督和问责委员会主席、肯塔基州共和党人詹姆斯·科莫（James Comer）扬言要对奔走在中美气候协商一线的克里进行“严格审查”，指责克里在进行一项与美国不利的气候谈判。

除了言论上的攻击，共和党还采取实质行动制约中美气候合作。首先是在国会层面为中美气候合作“制造麻烦”。2021年5月25日，时任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议员格雷戈里·米克斯（Gregory Meeks）提出《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地位与接触法案》（EAGLE Act），旨在聚焦应对中国挑战。共和党议员却抱怨此份涉华法案力度不够，尤其反对法案中有关就应对气候变化寻求与中国合作的条款，他们认为与中国进行气候合作“不合时宜”“美国的气候变化战略不能依赖中国”。作为拜登气候政策议程标志性法案的《降低通货膨胀法》在参议院遭遇了共和党的顽强阻击，最后凭借副总统哈里斯的“破冰票”才以51：50涉险过关。另一项包含气候投资的《两党基础设施法》也在共和党压力下以严重缩水版本通过。^②2022年中期选举之后，共和党取得了国会众议院的优势，对拜登政府重启对华气候合作将产生两大不利影响。第一，共和党可利用众议院

^① “McCaul: Kerry Traveling to China to Discuss Climate ‘Sending the Absolute Wrong Signal’”,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April 13, 2021, <https://foreignaffairs.house.gov/press-release/mccaul-kerry-traveling-to-china-to-discuss-climate-sending-the-absolute-wrong-signal/>.

^② 拜登政府于2021年3月提出“基建一揽子计划”（Infrastructure Package），计划投资规模高达3.5万亿美元，但在共和党的反对以及民主党党内出现分歧的情况下，最终投资规模在几经妥协后缩水至《两党基础设施法》中的1.2万亿美元左右。

多数席位继续对拜登政府气候政策立法施加更多限制，削弱拜登政府的气候行动力。第二，共和党议员可在国会推出一系列涉华消极立法或就涉华问题展开听证调查，破坏中美气候合作的“大气候”。例如，共和党在众议院成立了“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宣称要对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进行监督，确保“美国对华政策不会偏离战略竞争的轨道”。

其次，共和党对中美企业间的绿色合作进行阻挠和干扰。美国新能源企业因在华投资而在美国国内频频受到共和党的不公正对待。如美国电池制造商微宏公司根据《降低通货膨胀法案》可从美国能源部获得2亿美元拨款，用于支持其在田纳西州新建一个电动汽车电池组件工厂。但众议院科学委员会的共和党议员弗兰克·卢卡斯（Frank Lucas）却以该公司在华有投资提出反对。他在给能源部长格兰霍姆（Jennifer Granholm）的信中写道：“向一家已知与中国有联系的公司提供资金，令人严重担忧能源部保护美国纳税人资金不受中国剥削的能力。”^①美国能源部最终在压力之下宣布取消向微宏提供的2亿美元拨款。中国新能源企业的赴美投资之路也因共和党的反对而路途坎坷。2023年1月，弗吉尼亚共和党籍州长格伦·扬金（Glenn Youngkin）叫停了福特汽车公司与中国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在弗州共建电池厂的合作计划，声称“弗吉尼亚制造不能成为掩护中国的幌子”。同年2月14日，福特与宁德时代又宣布了新的合作计划：福特将投资35亿美元在密歇根州新建一座电池工厂，由宁德时代提供技术支持。但再次遭到多位共和党人士反对，他们以安全风险为由要求政府审查福特与宁德时代的合作协议。

最后，即将到来的2024大选也会为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带来更多不确定。从克林顿到小布什，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再到如今的拜登，白宫层面的两党轮替导致美国政府的气候政策呈现一定的周期性特点：民主党政府往往重视应对气候变化，主张严肃对待气候问题，并采取切实行动；共和党则倾向于否认气候变化，拒绝全球气候治理。^②作为传

^① “Letter from Frank Lucas, Ranking Member, House Committee on Science, Space, and Technology to Jennifer Granholm, Secretary of Energy”, March 9, 2023, https://republicans-science.house.gov/_cache/files/d/1/d1381eb1-7e3e-4f91-87f2-f8dd1411741b/27CFCC8A001AD09D7C9473A00C443303.2023-03-09-doe-iiija-battery-grants-letter.pdf.

^② 欧歌：《拜登政府的气候优先：表现、动因及困境》，载《国际研究参考》2021年第7期，第3页。

统能源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气候变化的怀疑论者和单边主义理念的倡导者，共和党始终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的一大障碍。气候政策的党派属性和国内政治的周期性为美国对华气候政策带来巨大不确定性，若共和党在2024年大选后上台执政，美国的气候政策可能再次出现翻转。而即便民主党在2024年大选后继续执政，作为民主党的牵制力量存在，共和党的强势也会持续压缩美国对华气候合作空间。

（二）中美围绕全球气候治理责任分摊的立场差异难以弥合

一是围绕温控目标的争论。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达成的《巴黎协定》制订了“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之内而努力”的温控目标。2018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提出1.5℃为“气候临界点”（Climate Tipping Points），警告一旦超过临界点，由全球变暖引发洪水、干旱、野火等极端天气和粮食短缺、能源危机的可能性将急剧增加，要求国际社会尽快设定1.5℃的新目标。^①拜登政府为展现气候雄心和领导力，极力“兜售”1.5℃的温控目标。中国支持国际社会朝1.5℃的温控目标努力，但不赞成将1.5℃作为一个对所有国家都适用的强制性气候目标，主要基于下几点现实考虑：第一，全球气候治理累积的巨大赤字需要弥补。目前各国自主决定贡献的总和与《巴黎协定》制订的目标还相去甚远，在2℃目标任务都没有完成的情况下仓促设定1.5℃的新目标只会加大愿景与现实之间的鸿沟。第二，不具备1.5℃温控目标的现实条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的报告评估显示，要实现将全球变暖控制在1.5℃以内的目标，需要在2030年将目前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45%，但目前没有可信的途径可以达到将升温幅度控制在1.5℃以内的目标。^②大规模的减排需要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转型的配套跟进，广大发展中国家并没有相关的经济

^① “Global Warming of 1.5°C. An IPCC Special Report on the impacts of global warming of 1.5°C above pre-industrial levels and related glob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pathways, in the context of strengthening the global response to the threat of climate chang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fforts to eradicate poverty”, IPCC, 2018, https://www.ipcc.ch/site/assets/uploads/sites/2/2022/06/SR15_Full_Report_HR.pdf.

^② “Emissions Gap Report (EGR) 2022: The Closing Window – Climate Crisis Calls for Rapid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ies”, UNEP, October 27, 2022, <https://www.unep.org/resources/emissions-gap-report-2022>.

技术基础。第三，不符合“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要求所有国家设定1.5℃的温控目标，实际上是要求发展中国家“平摊”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发展中国家要为此承担巨大的经济成本。研究估计，1.5℃温控目标要求中国为此减少90%以上的碳排放和近40%的能源消耗，到2050年，中国的累计政策成本可能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至5.7%。^①

二是有关气候治理融资的落实难题。当下全球气候治理谈判之所以步履维艰，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始终未能兑现气候融资承诺。2009年丹麦哥本哈根气候大会（COP15）上，发达国家作出到2020年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融资以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显示，发达国家2020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和调动的气候融资总额为833亿美元，与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融资承诺相比少了167亿美元。^②其中美国对国际气候融资缺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美国2020年仅提供了国际气候融资5%的份额，为欧盟十二分之一，而同年美国的经济规模却是欧盟的140%。^③拜登政府虽然在气候融资问题上的表态相对积极，但能否落实到行动，并尽快补齐历史“欠账”仍有待观察。气候治理融资兑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气候资金接收方和提供方存在认知上的差异：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负有历史责任和国际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资金，但发达国家则认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资金是出于道义的考虑。如果美国等发达国家不改变对气候资金的既定认知，不正视自身碳排放的历史与各国发展差异的现实，国际气候融资的落实就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全球气候治理的未来也就无从谈起。

三是对于中国“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争议。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发达国家需要承担更多历史责任。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按照世界银行的标

^① Hongbo Duan et al., “Assessing China’s Efforts to Pursue the 1.5°C Warming Limit”, *Science*, Vol.372, No.6540, 2021, pp.378–385.

^② “Aggregate Trends of Climate Finance Provided and Mobilised by Developed Countries in 2013–2020”, OECD, <https://www.oecd.org/climate-change/finance-usd-100-billion-goal>.

^③ Sarah Colenbrander et al., “A Fair Share of Climate Finance? An Appraisal of Past Performance, Future Pledges and Prospective Contributors”, ODI, June 26, 2022, <https://odi.org/en/publications/a-fair-share-of-climate-finance-an-appraisal-of-past-performance-future-pledges-and-prospective-contributors/>.

准，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美国对此日益不满。2022年9月下旬，美国参议院批准了旨在减少氢氟碳化物生产和使用的《基加利修正案》，同时全票通过了一个附加提案，要求终止中国在条约中的“发展中国家”身份。根据《基加利修正案》相关条款，发展中国家有相对更宽裕的时间来逐步减少使用氢氟碳化物，并可以获得一定的资金援助。美国还试图让中国成为“损失和损害基金”（Loss and Damages Fund）的出资国。拜登政府认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当下最大的碳排放国，有责任提供“损失和损害基金”。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对此明确表示，中国支持建立“损失与损害基金”赔偿机制，但发达国家负有责任和义务提供更多资金，发展中国家出资与否应当基于自愿原则。^①美国则指责中国利用“发展中国家”身份逃避承担气候责任。2023年3月29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全票通过《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法案，要求拜登政府剥夺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发展中国家地位。美国执意要摘掉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帽子，其用意是要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等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额外责任，充分暴露了美国无视自身历史责任、蛮横剥夺中国发展权的自私傲慢，也体现了美国对国际规则“合则用，不合则弃”的霸权逻辑。

（三）拜登政府面临气候优先还是遏华优先的两难选择

第一，拜登政府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的强势打压会冲击全球气候治理的产业技术根基。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顺利推进，离不开全球绿色产业发展和清洁能源技术变革的支撑。拜登政府为护持美国技术霸权，先后提出“小院高墙”“去风险”等理念，推动与中国在关键产业上的脱钩断链，以阻滞中国在高科技产业的追赶势头，确保美国产业和技术优势。如拜登政府以确保供应链安全和韧性为由，推动美国绿色产业供应链“去中国化”，要求以清洁能源为代表的绿色产业尽快摆脱对中国关键矿产等原材料的供应链依赖，以实现“美国制造”“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等目标。但从全球绿色产业的供应链现状来看，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几乎难以撼动。以太阳能光伏产业为例，国际能源署（IEA）2022年7月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底，中国拥有占全球79%的多晶硅产能（多晶硅是生产太阳能组件的关键原材料），以及高达97%的太阳能硅片产

^① 《解振华：发达国家有责任和义务为应对气变提供更多资金》，中国政府网，2022年11月21日，http://www.gov.cn/xinwen/2022-11/21/content_5728042.htm。

能、85%的太阳能电池产能和75%的成品太阳能组件或电池板产能。中国是世界十大太阳能光伏生产制造商的原材料供应商来源地。^①此外，拜登力推的《降低通货膨胀法案》鼓励电动汽车“美国制造”，特别是要实现电池的“本土化”生产。但目前全球电动汽车最大的两个电池供应商分别是中国的宁德时代和比亚迪，二者合计约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0%，他们凭借成熟的技术和低廉的成本成为包括美国特斯拉、福特在内的众多电车制造商的长期电池供应商。

强行推动绿色产业供应链“去中国化”，不仅违背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破坏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也是在给美国的清洁能源转型作茧自缚，最后拖累全球气候治理进程。2023年8月9日，拜登政府酝酿已久的对华投资限制行政令在经过内部激烈讨论后最终出台，要求设立对外投资审查机制，限制美国主体投资中国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值得注意的是，该限制令未包括一开始政府内部讨论的清洁能源和生物技术，似为中美在此类对全球气候治理具有重要意义的技术领域进行合作预留了一定余地，也凸显了拜登政府在“气候优先还是遏华优先”这一问题上的矛盾心理。但不排除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和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拜登政府后续会在相关领域出台进一步的限制措施。

第二，拜登政府不断挑战中国核心利益会持续干扰中美气候合作。2022年8月，时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拜登政府则以行政部门不能干预立法部门为借口默许此行。中国外交部随即宣布采取包括暂停中美气候变化商谈在内的一系列反制措施，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遭遇重大挫折。直到2022年11月拜登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巴厘岛举行会晤，中美气候商谈才得以再次重启。然而，2023年2月初，中国两个用于气象监测的民用气球因不可抗力因素误入美国领空，却被美国污蔑为“间谍气球”，拜登总统下令美军击落气球以示对华强硬。拜登政府在“气球事件”上的过度反应和持续炒作严重破坏了中美关系氛围，中方再次暂停了双边高层沟通，中美气候合作再次停摆。

^① “Special Report on Solar PV Global Supply Chains”,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July 2022, p.58.

拜登政府批评中国将气候变化问题“武器化”，称气候合作不应成为外交的“附属物”。但气候合作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能脱离中美的战略互动独立成事。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中美气候合作早已超越了气候问题本身，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含义。拜登政府把气候合作比作中美关系的“绿洲”，也希望气候合作可以成为中美在关键时刻进行沟通接触的“绿色通道”，实现对华“有管理的竞争”。但事实是，美国一方面在涉台、涉港、涉疆、涉藏等一系列问题上不断挑战中国核心利益，另一方面却要求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无条件与美国合作。这种违背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原则的“照单点菜式”外交，中国显然不会接受，这也是拜登执政以来中美气候合作多次重启后又陷入停滞的症结所在。

2023年6月以来，拜登政府先后派遣多位高官来华，就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商讨，中断数月的中美高层沟通渠道得以重建。同年11月，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也在旧金山APEC峰会期间再次实现了元首会晤。正是在中美关系止跌企稳的大背景下，中美气候合作才得以再次重启，并取得积极成果。中国通过牢牢把握中美气候合作的主动权向拜登政府传递了足够清晰的信息：美国一边打压中国一边寻求气候合作的两面行径注定走不远、行不通，唯有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中美气候合作方能稳定高效、可持续。

四、结语

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顺应了国际社会期待，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了正能量，也为中美关系带来了些许积极的“气候变化”。但中美气候合作的前路不会是一马平川，根本在于拜登政府难以摆脱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范式束缚。其一，共和党利用反华遏华的国内政治共识，通过国内政治过程有效牵制拜登政府，持续压缩中美气候合作空间。其二，拜登政府强推1.5℃温控目标、推脱兑现美国气候融资承诺、否定中国“发展中国家”身份，本质是要向中国推卸全球气候治理的责任，妄图用气候治理的超额“负重”迟滞中国发展。其三，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与其鼓吹的对华战略竞争存在不可避免的现实矛盾，面临气候优先还是遏华优先的两难选择，从目前态势来看，拜登政府似更倾向于后者。

对此，中国一方面要回应国际社会期待，对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持开放态度，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另一方面也要继续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捍卫全球气候治理的公平正义。同时继续用实际行动向拜登政府表明，决不容许美国在寻求气候合作的同时，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接受在全球气候治理问题上对中国的“道德绑架”。正如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所说，美方希望气变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绿洲”，但如果“绿洲”周围都是“荒漠”，“绿洲”迟早会被沙化。中美气变合作不可能脱离中美关系的大环境，美方应与中方相向而行，采取积极行动，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①拜登政府唯有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才能避免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出现“卡顿”甚至“死机”，确保中美气候合作长期稳定，持续高效。

^① 《王毅应约视频会见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新华网，2021年9月2日，http://www.news.cn/2021-09/02/c_1127818786.htm。

按行自抑：崛起国何以战略收缩

普宜媛

摘要：作为积蓄自身实力、缓解外部安全压力的战略手段，战略收缩成为部分崛起国的主要选择，但崛起国出现战略收缩现象却缺少相应的理论逻辑解释。既有研究往往关注秩序更迭时期霸权国战略收缩以应对崛起国挑战，而忽视了崛起国在崛起时期选择有限战略收缩的现实。基于战略手段调整时序、战略资源分配以及战略目标修订等维度辨析，本文将扩张与收缩等战略选项相联结，并通过能力与意愿两种内部政治逻辑考察俾斯麦德国与北宋统一初期的两个战略收缩案例，两者在存在相当程度的外部收益预期下，基于国内政治逻辑选择战略收缩，从而延缓、甚至避免了霸权国与崛起国秩序之战的出现。探究崛起国在大国竞争中维持自身战略定力存在内部政治机理，有助于重新思考国际秩序大变局下的崛起国战略选择。

关键词：战略收缩；文武关系；国家汲取能力；俾斯麦德国；北宋统一战争

作者简介：普宜媛，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问题的提出

大国对外扩张需要谨慎把握扩张收益、机会成本与资源投入所构成战略偿付能力的平衡，伴随着当前国际政治中的大国战略竞争景象的重现，更应审慎认识大国的对外战略选择及其偿付能力平衡的问题。在国际关系史中，世界或地区性帝国对外大规模军事扩张，通过获得领土、扩展外部安全承诺来彰显国家强盛的故事屡见不鲜；也有大国选择通过减缓对外扩张、削减财政支出来实现有限收缩，从而稳固其国际地位与战略收益；或有国家却失智于“扩张”的美梦，没有及时调整国家扩张性的对外政策，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对本文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从而崩塌于过度扩张的沉疴、湮灭于历史的长河中。例如时为16、17世纪霸权国的西班牙王国在其黄金年代持续斗争，在欧陆与大西洋四面出击，最终在过度扩张、政府贪腐与高昂军费导致的经济停滞下走向衰落。而面临衰落的英国却在19世纪60年代与20世纪初两次选择战略收缩，避免了过度安全承诺使自身“不堪重负”，从而维持了英帝国在长时间内的“霸权利益”。^①作为崛起国的隋王朝初期采取了对突厥的强硬对抗政策，在开皇初年采取了战略收缩的政策安排，形成了对扩张收益的相对克制，因此也缔造了隋初时代的“开皇之治”。同样的，在德意志统一之后俾斯麦并未维持建国初期的扩张政策，而是选择了有限程度的战略收缩从而维持了德国在19世纪70到80年代中期相对稳定的国内经济发展阶段。同为崛起国的法兰西第一帝国，却在拿破仑不断的对外征伐中深陷过度的外部安全承诺所带来的弊病，最终在不断的对外征伐与反击中走向衰亡，成为帝国历史上的昙花一现。

由此可见，不论是衰落的霸权国亦或是崛起国都存在成功战略收缩、及时止损的典范，也有深陷过度扩张泥潭、最终衰亡的悲剧。为何部分崛起国能够实现战略扩张转向战略收缩的转型，在及时止损的同时弥合了战略偿付失衡的“李普曼缺口”？而其他崛起国则深陷过度扩张无法修正，最终导致了国家的衰微甚至灭亡？本文在此主要回答的便是崛起国家何以实现战略收缩的问题。

二、文献回顾与批评

吉尔平（Gilpin）指出，霸权国在和平年代过度且持续的军费开支将浪费国内资源，限制未来的经济增长，并侵蚀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财政基础。^②此后，则吸引了诸多学者关注霸权衰落背景下的国家对外战略扩张与收缩的问题，但也因此，霸权衰落构成了对于过度扩张与战略收缩研究的基本前提，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多数假定国家处于衰落状态，即“衰

^① 保罗·麦克唐纳，约瑟夫·培伦特 著，武雅斌 郭晓梦 译：《霸权的黄昏：大国的衰退和收缩》，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69页。

^②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156-185.

落”提供了战略收缩的动机。

在既有文献中，关于战略收缩出现的成因可以分为两类：基于新现实主义逻辑的结构性解释以及基于国内政治视角的解释。

受吉尔平霸权必衰的观点影响，从国际实力分布出发的结构性解释往往带有对于国家“相对衰落”的消极预期，吉尔平在解释国家为何难以收缩时认为，维持霸权国的全球承诺将付出高昂成本，但收缩将释放自身脆弱的信号，因此国家很少主动采取收缩政策。^①而权力转移理论则存在不同的观点，权力转移所带来的的不确定性、恐惧与双方的不信任成为衰落中的大国决定固守现状或扩大雄心的基础。^②无论是霸权稳定论还是权力转移理论，其最终都否定了战略收缩的可能，并且认为国家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将最终致使战争爆发。保罗·麦克唐纳（Paul McDonald）与约瑟夫·佩伦特（Joseph Parent）则从结构层次出发，提出了关于霸权衰落时进行战略收缩的乐观主义解释，认为实力结构排序、外部盟友的可获得性、对外承诺的相互依存程度与对扩张收益的考量将影响国家是否采取以及采取何种收缩政策。^③这一解释实际上是通过揭示国家地位相对变化来理解收缩政策成因的路径，认为国家可以通过收缩来保留实力谋求适时复兴。但这一解释无法解释国家在何时何地会选择战略收缩，更是完全忽略国内政治的差异性，因而无从谈起对非衰落国收缩行为的解释。^④

总的来看，结构性的解释无法回应国家内部能力汲取的问题，并且也

①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84.

② A. F. K. Organski,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 19.

③ 麦克唐纳与佩伦特也某种程度上注意到了本文所提出的“崛起国放慢脚步或停止扩张”的现象，并且认为国内政治是可能的动因，但却没有在其理论中对这一现象做出解释。参见：保罗·麦克唐纳，约瑟夫·培伦特 著，武雅斌 郭晓梦 译：《霸权的黄昏：大国的衰退和收缩》，法律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5 页。

④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麦克唐纳与佩伦特的研究并非忽视崛起国，而是通过国家在大国中的 GDP 份额将部分崛起国视为衰落国家，这很明显存在极大争议，因为在这一标准下 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纳粹德国也属于衰落国，这显然是荒谬的。类似批评参见：Kyle Haynes 与 McDonald 及 Parent 的通讯稿：“Correspondence: Decline and Retrenchment—Peril or Promi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No. 3, Vol. 4, 2012, pp. 189–203. 并且麦克唐纳认为在相对衰落的情况下有 70% 左右的国家出现了收缩，但在经历国内政治变革的情况下，只有 33% 左右的国家出现收缩，进而因此排除了国内政治的竞争性解释，这显然是鲁莽的，因为在框定衰落的前提条件下审视国内政治变革并没有多少说服力，相对衰落论本身就没有给予国内政治以国际层面的相同尊重。

无法对崛起国的战略收缩现象进行解释，因为对于结构主义者而言只有霸权衰落才可能出现战略收缩，而也有研究指出，即便是正在崛起的新兴国家也有出现战略收缩的现象。^①由此，又该如何解释存在外部扩张收益预期下，崛起国选择战略收缩的现象？

此外，也有从战略主体与外部行为体的互动关系中解释战略收缩现象，这一解释与结构性解释相关联，其不强调实力差距缩减等结构变动的外部环境，转而强调国家间关系的重要性。卡尔·海恩斯（Kyle Haynes）提出了对于相对衰落的国家进行战略收缩的互动性理论。其认为，只要存在一个适当的地区继任者，相对衰落的国家将考虑继任者的适宜程度和该地区对本国的战略重要性，从而选择是否将其目前的责任进行移交，以及何时、如何迅速进行战略收缩。^②这一模型从外部互动关系决定是否战略收缩的角度提供了有力解释，但却遗留下另一个重要问题，即国家如何判断地区权力继任者的国家意图？在国家具备隐藏自身战略意图的动机前提下，国家收缩一旦被实施欺骗的国家视为示弱将更有可能诱发冲突从而致使收缩国的衰亡。^③

由于对于战略收缩问题的结构性解释处于垄断地位，所以即便是强调国内政治视角的理论解释也仍然无法摆脱“衰落”这一基本的假定，但国内政治视角往往反对结构决定论的观点，转而更加强调国家内部政治在阻碍或推进收缩政策时的关键作用。

既有关于国家在扩张后选择战略收缩的国内政治解释中存在深刻的“失能”与悲观偏见。早期关注战略收缩的国内政治基础的学者往往强调决策者的决策失误是战略收缩无法形成的关键，其往往认为是领袖的错误决策造成了国家自我挫败和做出非理性对外政策。库普乾（Kupchan）发现国内经济收益对于国家逆转战略扩张并没有明显作用，并且提出了“那

① 刘博文：《崛起国的战略收缩缘何逆转——以日本（1920—1927）和苏联（1953—1960）为例》，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第88—124页。

② Kyle Haynes, *Decline and Devolution: The Sources of Strategic Military Retrenchment*,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9, No.3, 2015, pp. 490-502.

③ 关于这一问题，Yoder做出了相关研究，其指出收缩是对于崛起国战略意图的试探工具而不是在已判定崛起国类型的前提下进行的固有选择。Brandon K. Yoder, *Retrenchment as a Screening Mechanism: Power Shifts, Strategic Withdrawal, and Credible Signal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63, No. 1, 2019, pp. 130-145.

些认为自己的国家不那么脆弱的领导人将更倾向于削减对外围国家的承诺”的观点。^①斯奈德（Sayder）在《帝国的迷思》中则强调了被政客和领袖内化的、基于国内利益联盟的错误认知，将致使国家难以及时收缩。与之相似的是多兰（Doran）的解释，其同样侧重于从决策者认知来解释战略调整问题。^②托利弗（Taliaferro）则注意到了大国常常在一些没有多少利益的边缘地区进行过度干涉的现象，并且运用“风险平衡理论”来解释大国对边缘地区的干涉与过度干涉行为。^③此类解释有一定的可信度，因为我们总是可以在历史学家的著述中发现对于领袖错误决策的批评，但与之相对的是，我们无法期待每一个执行战略收缩的都是英明的领袖，在现实中往往有诸多领袖实现了在战略扩张之后推行战略收缩而避免国家破败的过程，也有诸多领袖沉醉于扩张收益而最终走向衰亡的悲剧。由于实现扩张或收缩政策的领袖本身都具有极强的个人能力，所以我们无法简单地将收缩或扩张战略的形成归因于认知因素。

另一类内部解释逻辑则是关注政治体制、国家与社会关系等对于国家执行战略收缩政策的影响。^④其中早期的阿隆·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在分析英帝国在20世纪初的衰落时指出，国家内部分散的利益结构将阻碍大国形成对于权力变化的准确评估。^⑤而布劳利（Brawley）则认为

① Charles A. Kupchan, *The Vulnerability of Empire* (Cornell: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② 斯奈德的工作贡献了一个潜在意义的理论推断，即过度扩张并不一定是由于领导权的经济衰退，因此在部分崛起国也存在过度扩张的可能；而这也造成另一种猜想，即历史上的战略收缩不仅是衰落的霸权国的政策选择，同样存在崛起国执行收缩的可能。参见：杰克·斯奈德著，于铁军译：《帝国的迷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以及Charles Doran, *Systems in Cri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③ Jeffrey Taliaferro, *Balancing Risks: Great Power Intervention in the Peripher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需要说明的是，前景理论中预期决策者应该在获得扩张收益的情况下更倾向于“收缩”此类规避风险性的行为，但事实却是，崛起国既有沉迷扩张的现实，也出现过规避风险的收缩行为；因此前景理论在回答战略收缩现象时并不能形成一致性解释。

④ 斯奈德同样强调了国内卡塔尔化的利益集团对于帝国迷思的传播作用，因而也可被归为国内政治结构的解释之一，并且其在解释英帝国衰落时期（19世纪50-70年代）及时抑制扩张选择收缩时同样具有解释力；但是由于其选择性的忽视了崛起国收缩的现实，因而致使其理论并未给崛起国的战略收缩现象“留有余地”。参见，杰克·斯奈德著，于铁军译：《帝国的迷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4-167页。

⑤ Aaron Friedberg, *The Weary Titan: Britain and the Experience of Relative Decline, 1895-1905*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一个国家“对过度扩张的反应”取决于军方、中央银行等机构与国家的财政、民政等官僚机构之间的权力平衡，前者希望保持广泛的外部影响力，从而不愿轻易放弃国家承诺，因此寻求影响财政部。而布劳利同时认为，官僚政治的惯性存在将使得对外政策难以调整，进而影响扩张性国家无法进行战略收缩。“余晖效应”的解释尽管发现了国内政治对于战略收缩的关键作用，但其简单地将军方、中央银行归于重视外部承诺的机构存在明显的过度简化，并且布劳利对于国内政治保持悲观看法，没有注意到国内政治推动战略收缩的现象。^①

与此前的悲观论调不同的是，洛贝尔（Lobell）的解释或许是少有的收缩“乐观派”，其从颠倒的第二意象出发解释了国际经济环境对于霸权国外交政策的约束效应，进而基于国内政治的第二意象将国内领导地位的政治联盟区分为“自由贸易联盟”与“民族主义联盟”，前者掌控的衰落国家将更有可能容纳不断崛起的挑战者并且放弃过度延伸的安全承诺，而后者掌控的国家将对崛起国采取惩戒措施，并且不会出现收缩行为。洛贝尔的理论最为重要的是，其认为衰落中霸权国内部执政联盟将寻求和解（自由贸易联盟）或惩罚（民族主义联盟）战略，而不需要审视外部崛起国家的意图。^②此后，斯普劳特（Spruyt）则指出在国家内部权利分散的情况下会存在诸多“否决点”从而影响国家大战略的转变，而战略收缩更有可能出现在内部相对一致的国家中。这一解释描绘了分裂的国内政治不利于收缩政策的出现，但却没有解释为何国内同样紧密的国家会出现“扩张/收缩”两种现象。^③查普曼（Chapman）、麦克唐纳（McDonald）与莫泽（Moser）则进一步利用博弈论分析权力转移背景下大国战略收缩时期的国内政治，认为国家需要同时保证国内税收来提高外部议价能力，并且降低因提高税收而引发的反对派的政治抗议；其进一步的推论则侧面证明了斯普劳特关于分散的内部政治会限制战略收缩的可能。但两者仅仅解释了分散的国内政治不利于收缩，却没有解释何种国内政治更利于推行收

① Mark R. Brawley, *Afterglow or Adjustment: Domestic Institutions and Responses to Overstretch* (Columb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② Steven E. Lobell,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3), pp. 27-34.

③ Hendrik. Spruyt, *Ending Empire: Contested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Partiti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缩政策。^①此外，扎卡利亚基于政府中心主义解释了美国为何在19世纪90年代扩张，而不是更早的19世纪60年代的崛起时期选择大规模扩张。理查德·马斯（Richard Maass）则观察到了美国在托马斯·杰斐逊扩张主义下，从1776年以来扩大了十倍，但自从1910年以来美国却并没有进行过重大兼并的奇怪现象。^②这类观点夸大了物质限制对美国扩张主义的重要性，同时其案例特殊适配性的特点也使其逻辑无法适用于美国之外的其他崛起国。

在中国学者的研究中，孙学峰、杨原等从崛起国何以成功崛起的视角，从崛起的整体过程出发认为崛起的渐进战略可以使得崛起国成功规避霸权国的制衡从而部分关注到了崛起国的收缩现象这一问题，但其并没有解释崛起国为何会出现这一战略安排。^③刘博文也观察到了崛起国战略收缩的现象，但其更为侧重于对崛起国收缩逆转以至大国崛起失败现象的解释，其认为收缩手段无法消除对手威胁认知、无法树立自身地区权威以及为满足自身政权合法性造成的短视行为将使得崛起国战略收缩形成逆转，却没有回答关于战略收缩如何形成的问题。^④

事实上，既有关于国内政治的解释存在诸多不足。第一，与结构性解释相同，国内政治的解释并没有注意到非衰落国家的战略收缩现象，因此多数的国内政治解释都存在预设“外部环境”的基准命题，这也致使其往往是一种悲观论的视角。第二，国内政治的解释对于解释“扩张后的突然克制”现象缺乏说服力。总的来说，结构性解释与互动性解释强调战略主体的“被动应激反应”却忽略了收缩作为国家主动能力的可能；而经典的国内政治解释却多数受制于“霸权衰落论”视角下对战略收缩的悲观色

^① 这一认识也得到了部分跨地区案例的支持，参见张一帆、马荣久：《精英分裂、成就动机与战略透支——以北宋中后期西北拓边政策为例》，载《战略决策研究》2021年第4期，第22-57页。

^② Richard W Maass, *The Picky Eagle: How Democracy and Xenophobia Limited U.S. Territorial Expansi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20.)

^③ 孙学峰、杨原：《大国规避体系制衡之谜》，载《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2期，第103-121页。

^④ 刘博文将崛起国的战略收缩主要归因于他国遏制行为所带来的国际压力升高情况下，国家战略收益趋近战略成本，难以维持有效的平衡。参见：刘博文：《崛起国的战略收缩缘何逆转——以日本（1920—1927）和苏联（1953—1960）为例》，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第88-124页。

彩，没有注意到更广阔的战略收缩成功案例。^①

三、战略收缩的内部起源

通过既有研究可知，简单地将国家出现战略收缩归因于霸权衰落、地区重要性等外部环境将忽略更广阔历史视野中的战略收缩现象。历史中既有面对外部环境恶劣的情况下维持扩张战略的现实，也存在诸多崛起国在面临极大的扩张收益的情况下出现战略收缩的案例。霸权衰落致使国家采取收缩战略的逻辑在于“衰落时期的国家将更有保持战略偿付能力的诉求，因此衰落将会导致相应的收缩”。^②但衰落中的霸权并非无法从既有的安全承诺中获得收益，^③正在崛起的国家也并非不会考虑自身的战略偿付能力平衡问题。^④战略收缩作为历史上反复呈现的战略调整现象，内部自主性抉择更为重要。^⑤

（一）何谓战略收缩？

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认为国家外交政策需要保持盈余，用以平衡国家对外承诺与国家能力，此是指国家需要在实现对外战略目标所需要的资源与可承担的成本间做出判断，一旦国家的战略雄心超过了可用资源则会出现“李普曼缺口”：即一种入不敷出后的脆弱状态。^⑥而脆弱的国家将成为其他国家的攻击目标，所以国家需要通过收缩自身对

① 本文谋求进一步扩展基于洛贝尔、斯普劳特的国内政治观点，通过将崛起国纳入考察范畴，从而审视非“霸权衰落”的“战略收缩”这一现象；并且进一步细化分析国家由扩张转向收缩的国内主导力量的政治结构，为解释历史上扩张时期的“突然的克制”提供解释。

② 保罗·麦克唐纳，约瑟夫·培伦特 著，武雅斌 郭晓梦 译：《霸权的黄昏：大国的衰退和收缩》，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序言，第2页。

③ Stephen G. Brooks and G. John Ikenberry, Don't Come Home, America: The Case against Retrench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7, No.3, 2013, pp. 7-51.

④ 关于崛起国主动的战略选择问题，参见：孙学峰：《中国崛起困境：理论思考与战略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59页。

⑤ 同样的强调战略调整是一种主动性体现的判断，可以参见：周丕启：《大战略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0页。以及 Aaron Friedberg, *The Weary Titan: Britain and the Experience of Relative Decline, 1895-1905*.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209-291.

⑥ 保罗·麦克唐纳，约瑟夫·培伦特 著，武雅斌 郭晓梦 译：《霸权的黄昏：大国的衰退和收缩》，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2页。

外战略的雄心与诉求来避免陷入“李普曼缺口”的脆弱状态，即便无法阻止他国的挑战，但通过战略收缩可以减少盲目的外交政策资源投入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将战略资源投放在核心利益关切上，从而维持自身的竞争能力，为再次复兴提供空间。“李普曼缺口”首先解释了国家过度扩张走向衰亡的现象，也同样启发了对于国家弥合、规避缺口出现的战略收缩的研究。^①

而战略收缩需要从时间与空间两个层面来进行辨析。^②首先在空间的静态维度上必须考虑到与战略收缩相对立的两种非收缩情况：一是维持现状，即维持当前国家的军事部署、战略资源分配和安全责任承诺；二是战略扩张，即指寻求进一步扩大自身海外利益、寻求改变地区秩序甚至寻求建立世界霸主地位在内的进一步的帝国主义式扩张行为。前者意味着战略成本与国家雄心的维持不变，国家希望长期维持自身已获得的外部利益与地位；而后者则意味着国家对外战略目标与成本支出的进一步上升。因此在国家大战略状态的定位中，三者战略成本支出、战略目标设定有着明显的差异（见图1）。在静态上，战略收缩状态是相对于维持现状与战略扩张而言的，当一国不再寻求在某一方面的现状维持或扩张性政策，而是降低了这一方面的战略存在，从而展现出战略目标的降级与战略成本的下降或优化使用，即呈现出明显的战略收缩状态。

其次，在时间维度上判断一国是否属于或出现战略收缩，必须要从时序上明确该国此前的对外战略状态，如果缺失此前对于国家战略的判断，也就无从谈起当前战略是否属于收缩。^③对于不同的国家类型而言，其战略收缩的时序性调整也有所差异。在此处，本文对于“战略收缩”与“收缩战略”进行区别，“收缩战略”是指一种消极防御的静态姿态，而非“战略收缩”所强调的动态调整；而就现实中来看，霸权国的战略收缩意味着通过放弃海外承诺来削减不必要的外部成本支出，是一种从维持现状

① 关于大国过度扩展陷入“李普曼缺口”而走向衰亡的历史，参见：明克勒著，程卫平译：《帝国统治的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66-170页。

② 关于战略研究中对于时间维度缺失的批判与反思，参见：徐进：《时间维度与战略目标》，载《国际政治科学》2021年第1期，第1-23页。秦立志：《窗口预期与崛起国应对战略透支风险的启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11期，第96页。

③ 刘博文：《崛起国的战略收缩缘何逆转——以日本（1920—1927）和苏联（1953—1960）为例》，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第96页。

转向收缩战略的过程（即图1：Type 3）；而对于崛起国而言，其崛起初期往往奉行对外扩张性政策来获取外部声望与安全收益，其战略收缩往往表现为改变自身扩张性战略而转为维持现状战略或收缩战略（即图1：Type 1或Type 2）。而从静态与动态审视收缩时即分别构成两种表述——静态层面的收缩战略与动态层面的战略收缩，本文在此处主要关注的是崛起国为何在崛起过程中出现下调战略的“目标-成本”的调整过程，因此则需要统筹观察战略调整在两个层面的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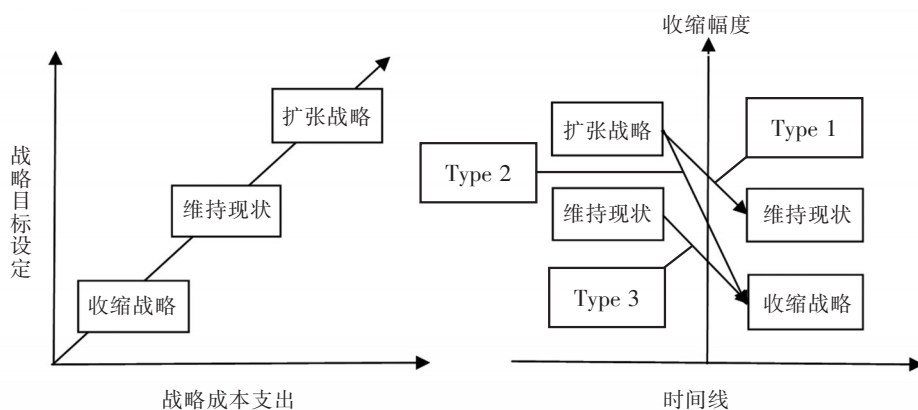


图1：战略收缩的空间-时间区分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同时，还需要注意到霸权国战略收缩与崛起国战略收缩的过程差异，这主要体现在两者的收缩程度上。战略收缩的程度则主要取决于由战略调整幅度与调整时间所构成的相对比率。^①在确定的时间内国家在持续性的扩张政策之后选择暂停扩张政策而维持现状，也有国家在难以维持某一地区秩序时选择放弃维持现状的政策而退回国内，这都属于有限状态下的收缩战略；而也有国家在扩张战略之后选择退出/放弃对于某一地区或事务的安全责任，则呈现出急剧的收缩状态，此类收缩程度则明显强于前两者；同理，在国家进行相同的战略调整背景下，其实现战略调整的时间越短，则战略收缩的程度则越大。由此可以得到比较战略收缩程度的公式：

^① Kyle Haynes, Decline and Devolution: The Sources of Strategic Military Retrenchment.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15, Vol. 59, pp. 493-494.

$$\text{战略收缩程度}(V)=\frac{\text{战略调整幅度}(S)}{\text{战略调整时间}(T)}$$

由此，可以从战略序列调整时序、成本支出与目标设定三点出发明晰不同类别的大战略是否属于收缩战略或者正在处于战略收缩的状态。^①

首先，战略收缩是基于时序性的战略调整。战略收缩必须是基于动态时序性上的差异性、长时段观察，即一个国家早期是扩张性战略而在某一时间节点后呈现出稳定的维持现状战略或收缩性战略，或一个国家早期呈现出维持现状战略而在某一节点后呈现出战略撤退的收缩性战略时，我们才可将其视为出现了大战略收缩的调整现象。举例来讲，我们并不能将离岸平衡战略、克制战略直接视为收缩战略，而必须将其放置于美国冷战后的自由主义霸权战略之下，才可以将其视为对此前的美国大战略的收缩调整。

其次，则是战略收缩需要符合“目标-成本”维度上的目标设定降级以及成本的削减或优化使用。其一，战略目标设定的降级主要体现为收敛国家的战略目标，调整过高的战略目标意味着缩小目标所涵盖的威胁范围、重新明确国家安全的核心范围。^②如19世纪末的法国通过法绍达危机中对英国让步、调解美西战争以及在非洲殖民地上的让步实现与意大利的和解等举措，降低了外部威胁数量，使其得以应对德国这一核心威胁。其二，战略成本削减与优化调整是国家有限战略资源运用的核心问题，既需要增加可调动的资源储备，也需要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损耗。^③诸如在国内削减军费开支、改革国内机构、增加社会福利与市场经济活力等均属于国家战略收缩时期的“开源”行为；在外部选择性撤回海外军队、支持边缘地带的冲突降解以避免危机升级、向盟友转移自身的非本土防御义务等均属于成本“节流”的典型手段。

最后，战略收缩需要对国家大战略做出整体性判断，而非片段性的侧

① 关于学者对于大战略的类型化区分参见：罗伯特·阿特著，郭树勇译：《美国大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页。

② 周丕启：《大战略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1页。

③ “开源节流”的表述也可被视为内部政策与外部政策的不同调整，参见：保罗·麦克唐纳，约瑟夫·培伦特著，武雅斌、郭晓梦译：《霸权的黄昏：大国的衰退和收缩》，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20-26页。

面评估。战略收缩并不意味着国家对外战略的全面撤退或者让步，战略收缩的本质在于降低成本，放低雄心的同时更好地将资源集中于关键战略领域中来，即国家放弃不必要的战略支出而转向将资源相对聚焦投入到某一大国竞争领域中来。如拿破仑时代向美国廉价出售路易斯安那州的行为，其实质是为了筹措军费支持其帝国在欧洲的全面战略扩张与霸权政策，因此即便其放弃了部分安全承诺，却并没有降低其对外战略竞争规模与烈度，因此并不能将1803年的法国视为收缩的案例。因此，在对案例进行是否属于战略收缩的判断时，需要对案例进行全面性考察，审视其是否整体性地降低了对外部战略目标的雄心以及实现了既有战略资源的再度有效分配。

总之，作为克服“李普曼缺口”的战略收缩是国家在评估当前自身战略偿付能力的基础上，进行缩小战略雄心、削减成本开支的整体性动态调整过程，并且收缩程度/内容（削减雄心与开源节流）和时间维度相匹配；战略收缩不同于具体的大战略类型，绝非美国大战略的专利，这一现象反复出现在国际关系史中，或成为崛起进程中缓急相济的佳话，或成为衰落霸权维持自身优势的苦口良药。^①

（二）战略收缩的国内政治逻辑

正如前文所述，战略收缩是国家评估自身战略偿付能力的基础上进行的战略调整，而正如费尔伯格所指出的，“外部冲击只是（衰落国家战略调整的）必要部分，并不能充分解释收缩的形成，在这一过程中‘个体代理’（即个体自主性）尤为关键”。^② 换言之，外部变化是解释衰落国收缩现象的必要不充分条件，但并不意味着这一条件同样可以解释崛起国的战略收缩现象。因为对于崛起国而言的外部冲击——即“崛起困境”中的外部压力，始终伴随着崛起国的崛起进程，并且从反面来讲，国际无政府体系同样对于崛起国也存在鼓励扩张的体系诱因；^③ 因而外部因素对于崛起国是一定的常量存在，并且受到国家决策集团主观判断与解释的影响，

^① 笔者在此并非认为收缩必然成功，国家收缩当然存在失败的可能，但成败与否受到多重因果复杂性的影响，因而本文在此不予讨论，而仅仅关注收缩这一战略调整现象的内部形成问题。

^② Aaron Friedberg, *The Weary Titan: Britain and the Experience of Relative Decline, 1895-1905*.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291.

^③ 国际无政府状态推动国家选择扩张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圭臬，参见：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 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进而无法完全解释崛起国的战略调整现象。^①这就使得我们回答崛起国的战略收缩起源必然需要回到国内政治视角中，将崛起国内部的政治机理纳入到战略扩张与收缩研究中，才可能准确地解释崛起国调整扩张政策而出现战略收缩的关键成因。

大国崛起本质上是国家有效运用自身军事与政治手段来实现国家向外部延展自身影响的进程，推动国家对外战略的调整则必然涉及国家对于自身政治与军事力量的权衡。而国内政治中的官僚机构中的精英团体及其结构、国内社会经济状况则构成了权衡政治与军事力量的主要约束条件。此前研究中，学者多利用官僚政治视野下的精英凝聚力与精英共识这两类变量来解释国家决策过程，但事实上两者都不足以明确国家的自身偏好。^②

崛起国家主动选择战略调整往往是基于“意愿—能力”两个维度的考量，意愿维度影响国家对外决策的认知起点，而能力维度则影响着国家对外战略的执行能力。两者所驱动的战略收缩分别意味着国家在决策认知层面不再寻求战略扩张，或者国家对于社会资源的汲取能力到达了边界，进而无法继续执行国家扩张型战略。而这就构成了本文所需要考察的核心猜想，即崛起国选择战略收缩是基于缺乏“继续扩张”意愿的逻辑还是基于缺少“维持扩张”能力的逻辑？本文在此主要使用崛起国内部的军政关系以及国家汲取能力来判断崛起国对外战略的意愿选择与能力逻辑，这是因为国内军政关系与国家汲取能力分别作用于国家对外战略中的意愿形成过程与战略动员能力，即国家意愿与国家能力两个维度。

首先在意愿维度上，一般认为国家在对外战略中的武力使用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军事”手段的偏好权衡：即军事黩武主义与军事保

^① 正是由于崛起的外部压力存在是一种常量，而与此同时崛起国的崛起进程无法停止，所以才会出现所谓的“崛起困境”。参见：孙学峰：《中国崛起困境：理论思考与战略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8页。

^② 精英共识仅提供了对于精英间偏好相似性的衡量；而凝聚力也并不能说明精英团体的外部政策偏好。精英共识更多意指的是精英在某一方面的共识，即局部共识；施伟勒在论证制衡不足现象时也指出只有制衡共识才能支持制衡行为的出现，其他的共识或没有共识将致使制衡缺失。而这就意味着施伟勒无法解释制衡共识的起源，而只是将其归因于战略背景等一系列因果复杂性环境中。此外，正如我们可以像施伟勒一样预期分裂的精英不会出现制衡，但却无法期待凝聚的精英一定出现制衡。所以精英凝聚力、精英对某一事项的共识往往必须同时出现才构成判定国家行为偏好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参见：兰德尔·施韦勒著，刘丰译：《没有应答的威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2-71页。

守主义。前者代表了短期内的迅速决策，而非长期的审慎争辩，并且更为偏好于武力手段来解决外部争端的倾向；后者则代表了精英内部对于审慎应用军事、暴力等手段的认识。而国家对于两种武力使用的偏好取决于内部的军政关系，熊彼特（Schumpeter）在解释帝国形成时期的国家扩张行为中就注意到了军政关系对于国家外交行为的影响，认为军人阶层在完成国家建构的任务后，为了保持在社会中的政治特权与声望就会转向鼓吹、推动国家进行边缘地带的军事扩张来获得民众的支持，从而形成帝国主义扩张政策。^① 拉斯韦尔（Lasswell）与斯奈德（Snyder）也同样认为国家内部军政关系影响国家对外战略，即在国家面临外部威胁时，脆弱的文官控制将使得国家出现军队组织将自身立场压制于文官之上，进而使国家形成使用武力或进攻战略的倾向。^② 因此，大国崛起时期内部的军政关系对外交战略选择形成了重要影响。^③ 在崛起国决策过程中实现稳定的文官控制对于避免崛起国陷于不断对外使用武力扩张的战略在理论上存在积极预期；而在大国崛起初期，国家内部往往存在军队能力过剩的现象，因此文官控制既可以控制军队，防止军队威胁社会内部安全，也可以防止军队能力过剩进而威胁和侵略其它国家的社会安全。^④

在此，本文将崛起国内部的文官控制界定为国家内部文官对于武官介入对外决策的排斥，以及面对崛起初期所出现的战略窗口保持审慎态度的现象。本文沿用了雅吉尔·利维（Yagil Levy）对于文官控制国家武力使用提出两种限制机制，一是文官集团对于武力执行组织的权力掌控，是将军事武力使用的议程排除出政治议程（去政治合法性），从而实现国家放

^① Joseph Schumpeter, *Imperialism and Social Classes: Two Essays*, trans. Heinz Norden, (World Press, 1968.)

^② Harold D. Lasswell, The Garrison Stat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46, No.4, 1941, pp.455-468. Jack Snyder,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nd the Cult of the Offensive, 1914 and 1984,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84, Vol. 9, No. 1, pp. 108-146.

^③ 经典军政关系研究往往由比较政治学所主导，很少观察到这一因素在大国崛起与衰落过程中的对外决策影响。参见：塞缪尔·亨廷顿：《军人与国家：军政关系的理论与政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而国际政治研究的学者尽管同样极为重视军事力量在战争与和平中的作用，但却将武力视为国家间等质个体的单一手段，因此并没有讨论国际环境中使用武力的内部政治与社会起源。因此，两种研究视角存在着一定的视野鸿沟。这一批评参见：高民政编：《国家兴衰与军政关系纵论 大国崛起中的军事与政治》，时事出版社2011年版，第36页。

^④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并不期待对于军政关系理论化作出更多理论贡献，而是谋求考察崛起国军政结构来解释崛起国对外战略行为的调整现象。

弃对外使用武力的意愿。^①由此则可以延伸出第一类关于国家意愿的相关预期，崛起国家内部可以通过文官控制来实现国内政治的去军事化过程，从而消弭崛起国战略扩张的意愿来使得国家拒绝维持扩张型战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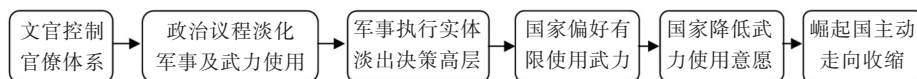


图2：国内文官控制下的去军事化机制

假设1：即崛起国内部存在强有力的文官控制情况下，将避免国家出现军队主导决策以及社会军事化倾向，从而促使国家拒绝延续此前的扩张型战略（见图2）。

其次则是基于能力逻辑的战略收缩解释，这一逻辑认为崛起国进行战略调整是由于其没有继续维持扩张性战略的能力。国家能力学说在政治学中往往被用于描绘国内政治-社会建构与治理问题，但在对外政策研究中，这一学说同样具有相当的解释力。^②国家能力可以被区分为军事能力、制度能力、行政能力与汲取能力，但在对外扩张中所优先考量的是国家对于社会层面的资源汲取能力，一国对战略资源汲取能力与使用是国家执行对外扩张战略的基础，而限制国家汲取能力的往往是国家财政制度的脆弱性以及政府对于社会层面的控制能力的低下。在均势理论研究中，米尔斯海默、柯庆生以及托利弗都强调了国家内部能力的聚集对于国家应对外部威胁的制衡能力；^③而扎卡利亚的政府中心现实主义则更是直接强调了决策者一旦认识到政府权力的增长则会转向相对扩张性的政策。崛起国家在面对外部威胁挑战时，没有进一步激化矛盾而选择调整自身目标设定与削减成本的收缩策略，这一现象或许也是由于其缺乏相应的国家能力。斯考切波（Skocpol）就曾经指出，“忠诚且有技能的官员与丰富的财政资源是国家有效追求各类目标的基础。”^④这一点也同样存在于施伟勒

① Yagil Levy, What is Controlled by Civilian Control of the Military? Control of the Military vs. Control of Militarization. *Armed Forces & Society*, 2016, Vol. 42, No. 1, pp. 75-98.

② 法利德·扎卡利亚 著, 门洪华 等译:《财富与权力》, 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③ 约翰·米尔斯海默 著, 王义桅 唐小松 译:《大国政治的悲剧》,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第169页。Jeffrey W. Taliaferro, State Building for Future Wars: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Resource-Extractive State, *Security Studies*, 2006, Vol. 15, No. 3, pp. 464-495.

④ 彼得·埃文斯、迪特里希·鲁施迈耶、西达·斯考切波著, 方力维等译:《找回国家》,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第21页。

(Schweller) 对于国家霸权地位追求的判断中，即“一个国家的自然禀赋要么允许、要么阻止其拥有对霸权地位的现实主义抱负”。^①因此，与意愿逻辑不同的是，能力逻辑更侧重于一种条件约束下国家的“被动”性自主决策，但这与本文强调由内部政治看待自主性的战略收缩并不矛盾，能力不足的国家主动权衡对外战略的“成本-收益”的行为本身也是自主性的体现。

鉴于国家能力学说中关于能力界定的维度与范畴有相当程度的灵活性以及无法穷举性，^②本文在此主要关注的是崛起时期国家对于社会层面的资源汲取能力以及军事动员能力，两者直接关系到国家是否有能力继续维持崛起初期的扩张性对外战略。此外，两者也具有一定的可转换关系，如米尔斯海默（Mearsheimer）就曾指出财富是军事权力的基础，但并不能将财富与军事权力相等同。^③因此，本文对于两种能力均进行相应考察，并根据具体案例进行判断是否呈现出国家扩张性能力不足的情况。

本文延续传统意义上的汲取能力概念，将国家的资源汲取能力界定为国家从社会中获得相应的经济物质资源支持与社会总体经济产值的比值，即国家汲取能力是相对于自身全部社会基础而言的，是一个有限区间、内部性的概念而非一个无限区间的、外部性的概念。因此，本文将通过考察崛起国国内财政制度、税基以及最终的财政收入水平等来判断国家的资源汲取能力。此外，本文同样将国家军事动员能力定义为国家在进行战略安排时所拥有的常规与潜在的军事力量，其主要用于达成某种外部性政治目的、执行武力攻击或强化威慑能力以及进行强制外交等等。因此本文也需要考察案例中国家崛起时期所维持的常规军队水平以及国家战争资源储备等情况来审视国家军事动员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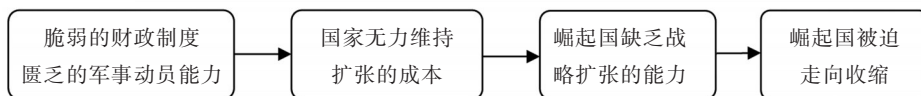


图3：国家能力不足约束下的收缩机制

① 兰德尔·施韦勒著，刘丰译：《没有应答的威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2页。

② 关于国家能力的相关界定问题，可以参见：王仲伟、胡伟，《国家能力体系的理论建构》，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第18-22页。

③ 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2-82页。

假设2：崛起国内存在脆弱的汲取能力与动员能力的情况下，国家无法维持相应的武力扩张成本，因而放弃此前的扩张型战略（见图3）。

此外，一国战略文化、领袖人格以及战略调整时期的社会舆论都对国家战略收缩的意愿与能力逻辑存在不可忽视的促进或约束作用。为明确地判断和检验崛起国在选择战略收缩时是在遵循能力不足的逻辑还是自身意愿的逻辑，本文仅关注崛起国国内军政关系以及国家能力汲取方式两者对战略收缩的单向性影响，而不进一步讨论两者在不同情况下的交互情况。^①

四、案例分析与理论延展

近现代史中，德国、日本、苏联都在崛起时出现过战略收缩现象。既有研究也指出，在古代中国同样有通过设置合理崛起边界与目标从而规避域内大国战略遏制的史实。^② 本文选择内外部背景各不相同的两个崛起大国战略收缩案例，即1871-1888年的威廉德国以及古代中国在五代十国乱局中崛起的北宋王朝来进行案例对比，基于求同法中最大差异化的原则进行异时性共性比较。

首先需要判断两个崛起国进行战略调整是否属于收缩现象，以及其战略调整时是否存在外部收益。从战略收缩的判定上讲，1864年普鲁士向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出兵、1866年向奥地利宣战、1870-1871年普法战争和最终德意志帝国的建立都象征着帝国雄心的高涨。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崛起、建立的欧洲霸权地位引起了其他国家的恐慌。尽管大多数大国承认德意志帝国的统一，但其他国家并不能确定普鲁士在取得了1864至1871年间三次统一战争的胜利之后是否会就此满足，而俾斯麦对于修正自身战略目标也作出了明确表态，即“我们已经吃饱

^① 事实上，两者直接关系到国家战略的目标偏好与执行能力，即意愿与能力本身，两者在“强弱”二分的逻辑下存在四种组态，但本文研究设计的目的是为了判断崛起国家存在自主战略收缩的意愿存在、用以驳斥“修昔底德陷阱”话语陷阱，因此并未进一步展开更为深入的类型化研究。

^② 关于崛起国出现战略收缩的相关判断，也可以参见：刘博文：《战略收缩时期大国竞争的印象管理》，载《国际政治科学》2022年第1期，第38-85页。王震、高程：《崛起国对外策略中的大国与周边》，载《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1期，第90-129页。

了”。^① 此后的德国并未进一步扩大其在欧洲的战争，而是选择积聚实力。德国在普法战争的胜利使之获得了大量的战争赔款，德国迎来了名副其实的繁荣。生产力的上升带来了煤钢需求的急剧增长以及现代船舰建设速度的加快，这也使得大多数德国人对德国海军舰队建造的加强感到欣喜若狂。^② 显然，这一时期的德国更多地将战略资源用于扩大内部生产而非此前的军事扩张。

从外部收益预期来看，这一时期的德意志帝国加紧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行为，其对外战略具有明显的扩张性、修正性。^③ 普法战争后虚弱的法国、在第二次石勒苏益格战争中已经无法保护丹麦盟友的英国都意味着19世纪70年代的德国在欧洲大陆存在明显的外部收益预期。但在社会层面的扩张诉求与外部明显的收益预期下，却出现了在1871-1888年近二十年内，德国对于现状的维持与在扩张问题上表现出克制。由此可见，威廉一世后期的德意志帝国在存在外部收益预期的前提下形成了明显的战略收缩。

而北宋王朝建立时期同样进行了战略收缩的调整。^④ 公元960年北宋王朝代后周而自立，成为中原地区屈指可数的新兴崛起势力，此后北宋于公元964年、965年、970年先后消灭南平（荆南）、后蜀、南汉三国，并且于公元975年击败了势力较为强大的南唐。北宋王朝在建立初期扩张顺利的情况下，其在兼并西南割据势力之后却与西南地区的大理、交趾达成和解并划定国界，放弃对西南地区的次要对手的战略竞争，从而降低了自身外部战略竞争的强度并调整了竞争的目标，转而将大量的精力用于攻灭

① 克里斯托弗·诺恩著，陈晓莉译：《俾斯麦：一个普鲁士人和他的世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55页。

② 关于1870-1871年德国经济繁荣历史的解释可以参见：Understand the economic boom in Germany during 1870-71, Encyclop?dia Britannica, <https://www.britannica.com/video/179953/Overview-boom-Germany>.

③ 杰克·斯奈德著，于铁军译：《帝国的迷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8页。

④ 对于北宋王朝初期是否属于战略收缩存在明显的学术争议，历史学中往往认为北宋初期对北部辽王朝以及北汉的积极防御政策是一种战略克制与相对收缩，而部分国际关系学者认为北宋初期尽管实现了梯度性战争安排，但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与财政亏空，属于过度扩张造成的“战略透支”。前者观点可以参见：曾瑞龙著：《经略幽燕 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后者观点可以参见：张一飞：《中国战略文化中的“战”与“和”：“自修”文化的两种战略选项》，外交学院博士论文，2018年10月。

主要竞争对手南唐以及兼并吴越与福建、漳泉等地的地方势力，使其“纳士”投降宋朝，并且在此过程中始终保持对北部北汉政权以及辽王朝的战略收缩态势。此后，北宋在兼并北汉过程中依然保持了对于契丹、党项势力的收缩态势，最大程度将战略目标（雄心）限定在有限的范围内，并保持了战略资源的有效配给，同样属于明显的战略收缩案例。

诚然，北宋的战略收缩是在极大的外部收益预期下完成的，后世史家对此颇有微词。王夫之认为北宋太祖时期南方政权涣散，根本没有任何抵抗能力，“先南后北”的收缩战略只会造成“天下已收其八九，而将卒之情胥涣矣”。^①并且此时的辽王朝正值穆宗、景宗时期，其内部政争剧烈、军事实力下滑，宋太祖更是直言“其（辽）精兵不过万人”，即便以绢募兵而战也“止费我三百万匹绢”。^②由此可见，此时期的北宋是拥有完成对北方战略扩张的收益预期的。

（一）1871年后威廉一世后期的德国战略收缩的形成

普法战争的胜利标志着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建立，1871年的德国被欧陆传统国家视为对欧洲均势体系的最大挑战与威胁。但是在1871年之后，德意志第二帝国并没有像历史上新生的欧陆霸权去寻求扩大自身的海外殖民地以及寻求霸权国所应得的政治声望，反而保持了相对程度的克制。斯奈德就曾指出，1870年-1890年之间德国总体上推行的是防御性与合作性政策，而这样的对外政策缓和了形成潜在敌对性联盟的危险。^③德意志选择收缩自身外部扩张的雄心，一方面是受到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的影响，即英法等国逐步地将德国视为安全威胁，其面临愈发严峻的安全压力；另一方面，也与其国内政治因素有着紧密关系。本文这一部分主要通过国内政治视角考查1871年普鲁士赢得普法战争之后，为何没有继续寻求扩张自己的霸权。

首先，就德意志第二帝国内部的文官控制体系而言，其属于亨廷顿（Huntington）笔下典型的客观文官控制体系，即军事力量的自身职业化，在国家放任军队自由管理政策和战略的同时，防止其参与政治。德国建立

① 王夫之：《宋论》卷一，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20页。

② 李攸：《宋朝事实》卷二〇《经略幽燕》，商务印书馆（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版，第608册，第231-232页。

③ 杰克·斯奈德著，于铁军译：《帝国的迷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4页。

的军事职业主义下的文官控制体系，很大程度上使得军官不会过问政治事务，军事权威仅提供对于战事的职业建议而不会对政治或者战略安排做出过多干涉。亨廷顿认为德国军官很少鼓吹战争，而是将其作为政策失败的最后方式。尽管其海军力量长期鼓吹对外战争与帝国主义政策，但陆军军官却对此不以为然。^①然而这却是对于德国国内军政关系几近片面的解读，事实上军方始终对于对外扩张有着强烈偏好。

早在普鲁士的帝国统一战争时期，俾斯麦为首的文官对于帝国武力扩张就始终保持了相对的审慎态度。如1865年普奥战争前夕，普鲁士总参谋长毛奇在5月的一次内阁特别会议上就曾声称，普鲁士军队已经做好了同哈布斯堡皇朝战斗的准备，而国王威廉也表达了使用武力的意愿，然而俾斯麦却表达了迟疑。^②而在1866年普法战争前期，同样的剧情再次发生，普鲁士军队寻求主动性军事扩张，毛奇甚至做好了相关的战争准备，但是俾斯麦却否决了前者发动预防性战争的想法。^③事实上，三次统一战争期间，俾斯麦使用毛奇所统领的武装力量执行政治目的，一旦完成目的就停止使用武力；而军队与政治家的利益诉求常常相互冲突，作为行政首脑的威廉一世却时常偏袒作为政务家的俾斯麦的战略安排。如在普法战争期间，毛奇曾试图拒绝俾斯麦等文官对于军事计划的干预，并且试图干涉战后政治安排，这些行为均被德皇与俾斯麦阻止。^④正如历史学家布莱恩·邦德（Brian Bond）所指出的，俾斯麦战争“是克劳塞维茨著名的关于战争是一种政策工具的公理的近乎完美的例子……这主要是由于俾斯麦的治国之道下，战争受到政治的严格控制，这给胜利者带来了持久的政治利益。”^⑤这一时期俾斯麦利用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实现了控制战场上的

① 亨廷顿著，李晨译：《军人与国家：军政关系的理论与政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7-111页。

② 克里斯托弗·诺恩著，陈晓莉译：《俾斯麦：一个普鲁士人和他的世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38页。

③ 弗里茨·斯特恩著，王晨译：《金与铁：俾斯麦、布莱希罗德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76-177页。但这并不意味着俾斯麦向往和平，其否决使用武力的提议不能被视为其反对与法国开战。

④ Michael Epkenhans, Bismarck, Wilhelm II., and German Military Leadership, *Journal Of Military And Strategic Studies*, Vol. 13, No. 1, 2010, pp. 45-46.

⑤ Brian Bond, *The Pursuit of Victory: From Napoleon to Saddam Hussein* (Clarendon Press, 1998), p. 49.

成功所产生的扩张欲望。^①

其次，1871年后德国民族主义上升，民众认为帝国的建立是崛起的开始而不是结束，他们敦促帝国应该通过寻求进一步扩张来巩固1871年初实现的“部分统一”。^②而作为帝国杰出军事统帅的毛奇则更是始终支持对法国与俄国的预防性战争，并且认为这是保障德国国家安全的必要手段，而社会中的中产阶级也同样弥散着鼓励扩张与使用武力的气息。^③事实上，德意志第一帝国政治框架下，军队的指挥权在皇帝手中，军队领袖（如军事内阁、总参谋长、普鲁士战争部和战争部长）直接向德皇负责，不受政府和政治的操控，但其无法触犯或损害俾斯麦的权威，这是由于后者的权威来自于德皇本人。帝国宪政体制下军事权威被严格地限定在有限的军事指导意见领域内，无法染指首相与外交部所主导的对外战略领域。另外，诸如总参谋部、陆军部、海军部之间则形成了显著的竞争关系，老毛奇所主导的陆军部更是完全受到俾斯麦主导下的文官控制。因此，这一时期的德国在对外战略上，呈现出明显的由帝国首相俾斯麦、帝国议会等文官集团进行决策的特征，作为军事职业化的德意志陆军、海军并没有介入到帝国对外战略的议程中来。俾斯麦在回忆录中表示，“总参谋部及其长官们总是被迷惑以致于危害到和平，这一事实的原因在于制度的必不可免的精神。我不能否定这种精神，只不过是出于皇帝的政策缺乏眼力和不能抗拒狭隘的和不符合宪法精神的影响，这种精神在这样的君主统治下才变成了危险的东西。”^④

此外，“战争在望”危机一直被视为俾斯麦鼓动战争的印证，但俾斯麦与这场危机并不存在直接的关系，这场危机的导火索是德国公众舆论对于法国军队扩张与军制改革的过激反应，俾斯麦虽然没有明确表达对于德国国内不满的反对，但却始终明白德国不可以在这场危机中陷入战争，因为这一场战争很有可能给法国以及其背后的英俄两国削弱德国的机会，

① Roger L. Ransom, *Gambling on War: Confidence, Fear, and the Traged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44.

② James Retallack, *Imperial Germany, 1871-191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5.

③ Gordon Alexander Craig, *The End of Prussia: The Curti Lectur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3), pp. 53-55.

④ 奥托·冯·俾斯麦著，山西大学外语系译：《思考与回忆》（第二卷），东方出版社1985年版，第72页。

所以其无意因此与法国开战。^①相反，毛奇却相信，“144个新营意味着法国的战斗秩序将增加14.4万人”，并依据这个毫无根据的结论开始考虑预防性战争。^②1875年4月，他问国家自由党议员约翰内斯·米奎尔：“如果军队在今年年底前发动进攻，国家将如何应对？”并带着悲观的兴致补充说，“今年的兵力将比两年后少10万人”。^③而尽管俾斯麦在这场危机中没有做出令外界满意的答复，但“他从未考虑过接受参谋长关于采取预防行动的建议。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首相从不相信预防性战争。……即便在他看来，法国军队的扩张是危险的，必须加以制止。”^④

最后，更为明显的例证是1885年的保加利亚危机。此间德国高级军官鼓动奥地利与俄罗斯开战，其中作为老毛奇副手的瓦尔德将军一度试图在保加利亚危机中干涉外交政策，在此次危机中极力鼓动奥地利向俄国开战，从而扩大德国在巴尔干的军事收益。^⑤而这一预防性战争心理，引起了俾斯麦的警觉并迅速作出了反应。在给驻维也纳大使的一份威严的信件中，他敦促奥匈帝国大使应该明白，根据1879年的（德奥）双重同盟，德国只有在其盟国受到俄国的攻击时才有义务支持它，并且提醒奥匈皇帝“我无法避免这样的印象，”他写道，“维也纳某些军事圈子的目的是扭曲我们的联盟……我们双方都必须注意，向我们的君主提供政治建议的特权不会从我们手中溜走，而转移到总参谋部。”^⑥并且俾斯麦威胁毛奇与军事内阁首脑阿尔贝狄尔，战争将是鲁莽的，并告诫后者如果有进一步的干涉，他将不负政治责任。而到12月底，毛奇则向俾斯麦保证军方无意干

① 埃伯哈德·科尔布著，张丽译：《贝克福德意志史·俾斯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04-106页。

② 埃克著，启蒙编译所译：《俾斯麦与德意志帝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236页。

③ 关于老毛奇预防性战争的主张可以参见：W. Kloster, *Der deutsche Generalstab und der Präventivkriegs-Gedanke* (Stuttgart, 1932), pp.6-19. Winifred Taffs, *Ambassador to Bismarck, Lord Odo Russell: First Baron Ampthill* (Frederick Müller, 1938), p. 89.

④ Gordon A Craig, *Germany, 1866-194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108.

⑤ 关于瓦尔德在保加利亚危机中的角色与行为，可以参见：Gordon Alexander Craig, *The Politics of The Prussian Arm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266.

⑥ Politisches Archiv des Auswärtigen Amtes, *Die Große Politik der europäischen Kabinette 1871-1914*, VI, pp. 67-69. 也可参见：Gordon A Craig, *Germany, 1866-194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134.

涉其外交政治权力范围，而这一次军方试图接管外交政治权力的行动以完全消弭而告终，也由此平息了保加利亚事件。^①

由此可见，1871年后的俾斯麦为首的文官集团对国家的战争诉求实际上起到了控制作用。在这一时期，军事权威无法干涉对外武力使用的决策，在1871年后的德意志帝国政治议程中，军队的扩张诉求被文官集团排除出核心决策事项。但不可否认的是，普鲁士统一德意志之后的文官控制体系并不是稳定的。相反，其极大程度上依赖于俾斯麦与威廉一世的政治联盟，只属于德皇的军事指挥权很少交由陆军部、参谋部染指，德皇由此成为核决与平衡军事与外交两个领域的中枢。^②但遗憾的是，俾斯麦的继任者并没有像俾斯麦一样参与军事决策，反而屈从于军方压力，^③脆弱的文官控制体系在威廉二世上台后迅速走向崩溃。^④因此，德意志第二帝国在1871-1888年之间的文官控制下并没有完全实现去军事化过程的制度化，而仅仅是由于俾斯麦个人这一特例形成的短暂现象。^⑤

相对于文官控制下国家意愿缺失所导致的战略收缩的解释，崛起国出现战略收缩的能力逻辑对于1871-1890年间的德国而言却存在相

① Gordon A Craig, *Germany, 1866-194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134.

② 威廉森·默里, 麦格雷戈·诺克斯, 阿尔文·伯恩斯坦编, 时殷弘译:《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 第257-258页。

③ 威廉森·默里, 麦格雷戈·诺克斯, 阿尔文·伯恩斯坦编, 时殷弘译:《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 第256-257页。

④ 1883年德意志帝国内部出现了关于军事政策决策的宪法争执, 军队内部剔除了唯一的对议会负责的陆军部的权力, 总参谋长获得直接觐见皇帝的权力, 陆军大臣的人事任命权也转交给军务内阁, 军队对于国家政治与对外武力使用的决策合法性上升。1889年“皇家大本营”军事机构设立, 直接觐见皇帝的军官人数扩大到40余人, 军队对于皇帝的影响力明显上升。在1890年社会民主党获得选举多数席后, 军方在威廉二世的同意后下达了对社会民主党的监视命令, 军方进一步拥有了干预政党政治的权力; 1899年的一项帝国敕令直接明确地方军事指挥官可自行挑选适当时机取代文职当局, 部署武力镇压平民, 并中止对公民自由的宪法保障。参见: 威廉森·默里, 麦格雷戈·诺克斯, 阿尔文·伯恩斯坦编, 时殷弘译:《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 第259页。

⑤ 亨廷顿指出这一现象是一系列巧合下所形成的, 德皇驾崩、俾斯麦辞职以及老毛奇的退休, 致使德国出现了文官政治集团的真空现象, 军事权威趁机进入决策核心圈, 毛奇的继任者瓦德西则是先发制人战争的鼓吹者。参见: 塞缪尔·亨廷顿著, 李晟译:《军人与国家:军政关系的理论与政治》,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第92-93页。

当的争议。一方面这一时期的德国维持了相对其他国家的高武备水平，因此其具备相应扩张的军事能力；但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德国却缺乏对于内部资源的有效调配能力，其不具备进一步扩张的社会经济基础。

在普法战争之前，欧洲列强相对冷静地看待1870年至1875年德国对法国的进攻性诉求，但欧洲无疑低估了统一战争期间普鲁士的军事实力，普法战争的结果尤其是色兰战役的胜利，粉碎了欧洲对新兴的德国军事力量的轻蔑。普鲁士军队的专业精神和效率显然使其他任何欧洲大陆强国的军事实力相形见绌。^①另外，普鲁士统一之后的国家工业发展水平在欧洲仅次于英国，在德意志帝国存在的前20年中，其始终被其他国家视为“潜在霸权”或“半霸权”的国家。^②

然而同时也有部分历史学家认为这一时期的德国军队并非拥有绝对实力。根据德国宪法规定，和平时期常备军的兵力占人口的1%。在1871年（根据1867年的人口），这一数字约为40.1万。1874年5月2日《帝国军事法》的通过代表了议会和政府之间的妥协，其基本确立了军队从1875年1月到1881年12月的实力维持水平，并成为德意志军队到1914年7月的基本法律基础；此一时期虽然普鲁士-德国军队拥有大量的常备方阵，但实际上这是一支动员起来人数超过一倍的骨干部队，造成了帝国现役部队的兵力几乎是和平时期应当维持兵力的两倍，因为军队吸收了大量的预备役（包括军官）。与之相映衬的，还有德意志帝国军队在1871-1888年间对于传统作战部队的维持，以及后勤、运输部队的缺乏（见表1）。因此很难认为完成普法战争后的德国军队是否有足够的军事动员能力来维持帝国扩张。

从反面看，对于俾斯麦政府后期的德国，其对于帝国内部的资源调动与信息获取能力并不尽如人意。最为显著的是邮政、电报和铁路三个国家内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1871年之前帝国战争的武力努力只致使这些代表国家能力的基础设施实现了简单跨州界的部分整合，尽管其帝国很快建立了一个全德国的邮局（1871年）以及统一的电报系统，但直到第一次世

① James Retallack, *Imperial Germany, 1871-191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23-24.

② James Retallack, *Imperial Germany, 1871-191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23-24.

表 1：威廉德国军备扩张程度表

日期	步兵	骑兵	阵地炮兵	步炮兵	先锋队	运输部队	后勤
2 April 1874	469	465	300	29	18	-	-
6 May 1880	503	465	340	31	19	-	18
11 March 1887	534	465	364	31	19	-	18
15 July 1890	538	465	434	31	20	-	21
3 August 1893	624.5	465	494	37	23	7	21
25 August 1899	624	482	574	38	26	11	23
15 April 1905	633	510	574	40	29	12	23
28 June 1909	624	465	494	37	23	7	21
27 March 1911	634	510	592	48	29	17	23
14 June 1912	651	516	633	48	33	18	25
3 July 1913	669	550	633	55	44	31	26

资料来源: Daniel J. Hughes, Richard L. DiNardo, *Imperial Germany and War, 1871-1918*^①

界大战之后其国内的铁路网络仍然基本不协调。^②因此，国家汲取能力不足的收缩逻辑也同样备受历史学家青睐。

但尽管史实证据表明德国存在国家能力上的欠缺，但这一现象相对持久，实际上德国国家能力状况一直延续至德国煽动一战前始终如此；国家能力缺失的情况下德国既出现了1871年的克制，也出现了1899年后的扩张，因此这一逻辑既不是1871年的“突然的收缩”的充分条件，也无法证明其是德国在1871年后出现收缩的必要原因。

（二）北宋王朝崛起时期的战略收缩

北宋王朝作为崛起力量同样在崛起初期出现了明显的战略收缩，在崛起初期限定了有限的优先战略目标，并且实现了对于战略资源的重新配给。北宋王朝初期的文武关系对于抑制北宋的全面性扩张战略起到了关键作用，这分别体现在两个阶段的战略收缩过程中：第一是北宋对于南部后

① 数字代表步兵和先锋队的营，骑兵的中队，阵地炮兵、步兵炮兵、战车和火车部队的炮台。此外，*这个数字包括538个全营和173个半营，比1890年7月15日增加了173个半营。1899年8月25日的数字显示，显然净损失了半个营。Daniel J. Hughes, Richard L. DiNardo, *Imperial Germany and War, 1871-1918*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18), pp. 83-84.

② Ulrich Pfister, Jan-Otmar Hesse, Mark Spoerer, Nikolaus Wolf, *Deutschland 1871, Die Nationalstaatsbildung und der Weg in die moderne Wirtschaft* (Mohr Siebeck GmbH & Co. K, 2021).

蜀、南唐等政权的兼并战争前实现对于北部势力（即北汉与辽王朝）的战略收缩；二是在完成对后蜀、南唐政权的兼并战争后，停止对西部与南部等边缘地带的武力扩张，进而转向相对的战略收缩，而完成对于割据中国华北地区的北汉政权进行兼并战争。

首先，在北宋建国初期，其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是位于西南的后蜀、南部的南唐以及北部的北汉与契丹建立的辽王朝。宋王朝开国元年的三月，辽就入侵棣州，意似在探试新王朝对辽军事行动的反应；而北汉则大搞策反，原后周大将、据守潞州（今山西长治市）的昭义节度使李筠起兵叛乱，北汉主刘筠则亲率三万大军南下，与之形成掩角之势，以相配合攻击北宋王朝；南方的淮南节度使李重进也力图联合南唐，伺机蠢蠢欲动。因此，北宋作为承继后周崛起趋势的新兴势力，面临着严峻的外部环境压力。

但崛起的北宋王朝制定了“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即对北部辽王朝这一霸权国相对收缩，先行统一南部割据势力的大战略。这一过程中，北宋建国初期的武官并没有参与到这一大战略决策中来，相反，以赵普为首的文官则对这一决策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赵普认为宋的主要任务是“削平诸国”而不是贸然与北部北汉政权以及突厥势力进行对抗，“（太祖与晋王赵光义）因与普计下太原。普曰：‘太原当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则我独当之，不如姑俟削平诸国，则弹丸黑子之地，将安逃乎？’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试卿尔。’”^①由此可见，在北宋初期的战略谋划中，正是魏仁浦、赵普为首的文官参与了对于北宋战略扩张进度的谋划，并且制定了对北方敌对势力相对收缩的安排。

而此后，太祖皇帝削弱相权而提高军事决策机构枢密院的政治地位，但这一军事机构并非由传统武将所执掌，而是由传统文官兼职来分割相权中的军事决策权力。北宋初创之时，赵普就被任命为枢密直学士、枢密副使等职，而后更是在建隆三年升任枢密使，这实际上形成了文官对于武将的压制局面，虽然李崇焕、曹彬等开国武将后也出任枢密使，但枢密院这一机构始终掌握在文官集团掌中，军政决策并不会受到军事将领的干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开宝元年七月丙午，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04-205页。也可参见：脱脱：《宋史》卷256，列传第十五，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1页。

涉。^①这种中央统兵制度初始目的是为了克服唐末以来节度使藩镇割据的乱象，避免政权的分裂或崩溃，但同时也在文官控制的情况下也起到了相当程度对于国家战略收缩的促进作用，即武将不再能够鼓动国家滥用武力扩张，而是严格遵守文官集团制定的相应安排。

北宋伊始的政治议程中对于在北境动武的议程的排除，以及帝国制度层面的对于军事执行实体（武将）的限制都致使这一时期的北宋王朝国家偏好转向有限使用武力。期间宋太祖更是直接下诏，要求禁止民众出境盗马，从而避免与辽王朝的军事摩擦。^②宋史中对于太祖初期的对辽战略收缩的偏好做了一个表述，“太祖别置封桩库，尝密谓近臣曰：‘石晋割幽燕以赂契丹，使一方之人独限外境，朕甚悯之，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十万，即遣使与契丹约，苟能归我土地民庶，则当尽此金帛充其赎值，如曰不可，朕将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耳。’”^③这也直接证明了，宋太祖更多地希望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北境边疆问题，并不愿意直接与契丹的辽王朝进行直接的武力对抗。包弼德也指出，这一时期的北宋国家整体偏好为强化文治与文学的兴趣，而弱化武力的地位。^④

由此可见，在以文制武的决策环境下，加之制度设定对于武官的挤压，使得国家偏好转向了有限使用甚至于不使用武力。王夫之认为，这一时期的北宋王朝对北部进行战略收缩是有相应历史镜鉴的，“汉高帝尝困于白登矣，至武帝而幕南可无王庭；唐高祖尝称臣于突厥矣，至太宗而单骑可使却走。夫汉与唐，未尝不偃戈息马以靖天下也，未尝不制功臣使蹲伏而不敢窥天位也。”^⑤因此，尽管王夫之极尽批评赵普“对北部收缩”的决策论调没有依据，但是也认为北宋对北部进行战略收缩的决策是正确的。^⑥这一战略安排的效果也在《宋史》中有较为清晰的解释：“宋初，

① 陈峰：《武士的悲哀》，重庆出版社，2021年版，第51页。

② 徐松：《宋会籍辑要》，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版，蕃夷一之一。

③ 王辟之撰：《澠水燕谈录》，卷一，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36页。

④ Peter Bol, *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pp. 155-160.

⑤ 相关对宋太祖的评论内容可以参见：王夫之：《宋论》卷一，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20页。

⑥ 王晓波：《宋辽战争论考》，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页。

交、广、剑南、太原各称大号，荆湖、江表止通贡奉，契丹相抗，西夏未服。太祖常注意于谋帅，命李汉超屯关南，马仁瑀守瀛州，韩令坤镇常山，贺惟忠守易州，何继筠领棣州，以拒北敌。又以郭进控西山，武守琪戍晋州，李谦溥守隰州，李继勋镇昭义，以御太原。赵赞屯延州，姚内斌守庆州，董遵海屯环州，王彦昇守原州，冯继业镇灵武，以备西夏。其族在京师者，抚之甚厚。郡中管榷之利，悉以与之。恣其贸易，免其所过征税，许其召募亡命以为爪牙。凡军中事皆得便宜，每来朝必召对命坐，厚为饮食，锡赉以遣之。由是边臣富贵，能养死士，使为间谍，洞知敌情；及其入侵，设伏掩击，多致克捷，二十年间无西北之忧。”因此，在北宋文官集团参与决策的情况下，对北部采取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收缩安排，而将战略重心转至对南方势力的兼并，从而为北宋王朝的初创打下根基。

其后，宋在完成对于南部各国割据势力兼并后，北宋转而寻求对大理、交趾的战略收缩，而将战略目标转移至北部的北汉与党项政权。在对大理的战略安排上，宋太祖直接限制了武将进一步向西南扩张的欲望，“时王全斌既平蜀，欲因兵威取滇以图进于上，太祖鉴唐之祸基于南诏，以王斧画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① 北宋没有向大理进一步扩张的内部原因并没有见著史料，但有学者认为当时北宋面临严峻的外部安全威胁而被迫收缩（南唐、北汉与辽王朝），但这一解释并不可信，因为此时北宋的北部战略安排已经初显成效，尽管后唐拥有较强的军事与财政实力，但961年李煜就已经向赵匡胤称臣纳贡，沿袭宋的年号，表明并无威胁北宋的意图。^② 而对于更为偏远的交趾，北宋也采取了相对克制的战略：979年，越南丁朝内乱，权臣黎桓阴谋篡位，邕州知州侯仁宝上奏请宋太宗请求出兵收复交趾。而面对北方与辽朝交战失利的情况，宋太宗急切地发动了这场毫无战略筹算的战争。而这场战争本身与北宋文官集团所鼓励的对西南边疆的收缩政策并不匹配，因此遭到了文官集团的集体反对，太宗时期的文官集团代表、右谏议大夫田锡引用周公、唐太宗典故劝谏太宗停止对交趾的战争，“交州未平，不足损陛下功业；交州既得，不足光陛下威声”。^③ 在奏疏的最后，田锡建议宋太宗“不务广于边鄙，唯

① 杨慎著，王文才、万光治编：《杨升庵丛书》，天地出版社2002年版，第207-210页。

② 李煜：《即位上宋太祖表》，载蒋方编选：《李璟李煜集》，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201页。

③ 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645页。

务广于德业”，如此“远夷自然入贡，外域自然来降”。^①不久后，在文官集团的集体反对下，宋太宗停止了对于交趾的武力扩张，而转向此前对西南疆域的防御政策，避免了国家对边缘地带投入资源的浪费。

此后，在北宋完成对于南方的统一以及对于大理、交趾的收缩性的羁縻政策安排后，北宋将战略目标与资源重新投放到北部的北汉政权以及与辽王朝的竞争中。这一进程中，宋太祖也同样维持了对于辽王朝的相对克制，其中文官集团也扮演了相对重要的角色：在开宝二年（969年），以魏仁浦为首的文官就明确反对过宋太祖过早向北汉扩张。“太祖密谓仁浦曰：‘朕欲亲征太原，如何？’仁浦曰：‘欲速不达，惟陛下慎之。’”^②在974年北宋为了进一步孤立北汉，选择了与辽王朝达成“雄州和议”，即对辽王朝明显战略收缩的第一个标志。最终宋辽为了共同的利益，双方都采取了克制态度来防止冲突的升级。^③此时的辽王朝已经不可能为了北汉而撕毁与宋的和约或者与北宋出现大规模的军事对抗，在此背景下，976年11月宋军开始分路高歌猛进地向北汉进攻，并且辽王朝并没有强烈地军事干预这一场战争。^④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宋军继续进攻，辽朝则可能作出某种让步，但令人遗憾的是，10月癸丑日（二十日）夜宋太祖赵匡胤在斧声烛影的千古谜团中驾崩，而此时北宋的北征也因此中止。即便如此，我们也能够看到，文官集团对于北宋王朝对辽王朝的战略收缩构想是相对成功的，北宋对辽的战略收缩以及由此形成的宋辽之间心照不宣地达成的默契，成为宋太宗最终兼并北汉、完成中国局部统一的坚实基础。

而对于北宋战略收缩这一案例，国家能力不足的解释逻辑在不同时期说服力则存在明显差异。本文在此主要考察了北宋初期的军事动员能力、资源汲取与调配能力。事实上，北宋初期仅仅存在部分军事实力不足，其经济财力与调配手段均没有制约北宋外部扩张的迹象。

① 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645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24页。

③ 曾瑞龙：《经略幽燕 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06页。

④ 据辽王朝的记载，辽景宗应北汉的请求，在九月曾派南府宰相耶律沙、冀王烈烈赴援；十月，北汉又以辽军击退宋师遣使前来致谢。但在北宋的有关史料中，却没有这样的记录。史学家所给出的相应解释是：辽军的赴援仅仅是象征性的，亦带有警告宋朝要适可而止、不要图谋幽燕的暗示。参见：王晓波：《宋辽战争论考》，四川大学出版社，第22-23页。

历史学界多数学者赞同北宋王朝“先南后北”战略安排是由于其并没有足够的军事能力去与南北两面势力进行作战。首先，宋初兵力确实相对有限，不足与北部辽国霸权争夺燕云失地。宋人吕陶说：“艺祖受命之初，国家之兵十有二万。”^①甚至于“上考太祖皇帝取天下，正兵不过十万人。”^②因此，在宋初太祖时期，旗下善战之精锐部队始终不过十五万左右。这证明了宋朝初期的军事动员能力相对有限，北宋无法将有限的军事实力投送至南北两面的战场之中，因此必然选择其中一方进行战略收缩。但北宋初年，尤其是宋太宗完成对北汉的兼并后，宋王朝的国家汲取能力却并不符合常识中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形象。宋王朝为了应对国家间生存竞争的需要，改变了秦汉王朝时期形成的土地产权制度与赋税制度，从而增强了自身的国家汲取能力。

在唐末，田制逐步被放弃，宋初确立了“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原则，塑造了最早的类似于私有制的土地产权方式。私有田产下国家的赋税只对土地田亩进行征税，这一准私有制的土地政策极大刺激了土地租赁关系的发展，人口增长下劳动力的增加伴随着土地流转的加速，使得农业生产商业化程度提高。^③与此同时，宋代的赋税制度更是做出了相对隋唐更为重大的调整，其在确立“税地”为核心的税收制度的同时，建立了从工商业汲取财源的“税商”制度。农业生产商业化的加速也刺激了以雇佣劳动力为主要支撑的手工业与矿业生产不断加速商业化，宋王朝也凸显商贾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四民（士农工商）皆本”的观念深入人心。在此背景下，宋代制定了系统的针对工商业税征收条例，在作为国家重要财政来源的专卖领域中吸纳商人参与，实行间接专卖，通过商税和专卖税实现了宋朝官僚所说的“富商大贾为国贸迁”。^④因此，北宋时期国家与工商业形成了良好的“分利机制”，“养财于民，富国于民”成为北宋国家经济的主要写照。

就国家资源调配能力来看，为了应对外来军事威胁以及克服内部分裂，北宋建立了强有力的资源调配权力机构。三司制度使得北宋可以将大

① 吕陶：《历代名臣奏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卷二二一。

②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0，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033页。

③ 葛金芳：《宋代经济史演讲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1页。

④ 黄纯艳：《经济制度变迁与唐宋变革》，载《文史哲》2005年第1期，第42-45页。

量地方财力由各路转运使征集财富、供输中央，而北宋皇帝设立的内库财源制度，使得皇权可以直接干预财政收入分配，并且很大程度上弥补了部分时期正式财政机构财力不足的情况。^①此外，北宋时期漕运发达，张方平就曾指出“大体利漕运而赡师旅，依重师而为国也。则是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②北宋国都开封的地理存在确保可以快速地将南方生产的粮食与税赋转移至北方并配送前线，并且宋朝发明了“入中”手段，通过官商合作来刺激市场，使商人在政府组织下完成大规模的军事物资调配。^③由此可见，北宋的国家汲取能力既拥有丰厚的社会基础，更具备完善的制度设计与调配方式；因此即便我们认为北宋太祖时期军事实力相对较弱，无法实现四面出击的扩张雄心，但却不能认为太宗皇帝后的北宋不具备扩张的物质实力。因此，北宋的案例也仅仅是部分支持了我们前文所提出的关于崛起国选择战略收缩的能力逻辑。

值得注意的是，北宋完成统一之后仍延续了此前对辽王朝收缩的战略态势，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国力不足所导致的收缩解释。宋王朝国家实力在太宗时期得到了急速膨胀，其统一北汉后短短40年时间内，北宋军队扩大了2倍有余，禁军更是扩大了2.2倍。但急剧扩张的军事实力却并没有用于实现“恢复汉唐疆域”的扩张目标，相反，文官控制下的决策集团认为与其扩大军队，不如向北方辽王朝委曲求全，如北宋著名贤相王旦曾对真宗皇帝表示“国家纳契丹和好已来，河朔生灵方获安堵。虽每岁赠遗，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④由此可见，文官控制下形成的“偃武修文”的特性使得原本可以进行武力扩张的军队成为国家“冗余”；北宋前期为消减外部安全压力，避免内部军变而形成与战略收缩相匹配的文官控制体系却最终成为束缚自身战略调整的枷锁。^⑤

① 刘守刚：《财政中国三千年》，上海远东出版社2020年版，第211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9，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592页。

③ 关于“入中”手段的相关研究可以参见：黄纯艳：《唐宋政治经济史论稿》，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页。

④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578页。

⑤ 这一观点可以参见：陈峰：《宋代的文官掌军制度及其效应》，载《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7期，第130-146页。

（三）案例内比较以及替代性逻辑的竞争

北宋统一局部中国以及普鲁士统一除奥地利外的德意志，两者都是作为地区性崛起国的面貌出现在历史舞台之上，虽然时间与空间将两个案例严格地区分开来，但两者在崛起初期的历史命运极为相似。

与其他战略收缩起源的竞争性解释相比，文官控制的国家意愿逻辑与经验历史更为匹配。普鲁士统一德意志的崛起进程初期，其文官控制相对脆弱，更是在1888年威廉二世上台后被迅速颠覆，最终走向了对外扩张的道路。而北宋则是在太祖、太宗两朝为文官控制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与传统文化，更是成为北宋此后相当一段时期的主导战略，但北宋长期的偃武修文也为自身后期的军事力量疲软埋下伏笔。而国家能力的逻辑在解释北宋初期的收缩选择时得到了很好的检验，但却不能解释太宗朝之后的北宋收缩现象，因为宋太宗时期北宋的国家能力实际上已经饱和，其有实力先后发动对辽战争与对交趾的战争也侧面印证了北宋实力的积累。但国家实力不足的解释逻辑对于德意志1871年至1888年的战略选择的解释并不严谨。

至于战略收缩的其他竞争性解释，在面对普鲁士与北宋两个崛起国战略收缩的案例时，均出现了相当程度的理论与现实的龃龉。其中结构性解释关注崛起国对于外部竞争者的相对实力衰落。普鲁士统一时期法国已经遭到严重削弱，而同时期的英俄等国并没有相较于普鲁士更为迅猛的相对实力增长，相反却出现了相对的衰落。以马克唐纳与佩伦特对相对衰落的衡量来判断，1871年-1888年间如俄国（1879、1888）、法国（1883）、英国（1872）均出现了相对程度的衰落；^①因此结构性逻辑虽然可以解释后者衰落群体的相对收缩，但却无法解释同时期没有衰落的德意志的收缩现象。对于北宋的崛起来讲，结构性解释同样缺乏说服力，同时期北宋的竞争对手均出现了相对衰落，如辽王朝则进入了辽穆宗时期，在经历此前辽王朝太宗、世宗、穆宗三任皇帝残酷的内部权力斗争，并且太宗、世宗长期用兵中原，国力消耗严重，因此穆宗时期的辽王朝相对走向了一种衰落的态势。因此结构性解释无法理解面对北方颓势的情况下，北宋为何仍然在前期选择了相应的战略收缩。其次，在结构—互动性视角解释崛起国的

^① 保罗·麦克唐纳，约瑟夫·培伦特著，武雅斌、郭晓梦译：《霸权的黄昏：大国的衰退和收缩》，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51-52页。

战略收缩同样无法描述两个崛起国选择收缩的历史，结构互动视角下其预期拥有可偏好相同的“继任者”时，其将会选择将责任与义务移交给相应的共同利益者，进而选择战略收缩。但显然这一逻辑并不适用于普鲁士与北宋两个崛起国收缩的案例，因为两者在各自的崛起过程中显然不存在与自身利益相一致的伙伴，两者均面临着多个外部安全竞争对手，其崛起过程所提出的利益诉求往往被多方势力进行否决。最后，国内政治视角下自由主义者的乐观假设也并不契合本文的两种案例，首先普鲁士统一战争之后，帝国议会基本无法影响德意志的外交政策，议会权限仅仅限于有限的国内行政与立法问题上。^①对于北宋的案例来讲，自由贸易主义的执政联盟更是无法用以描绘儒学思想下的文官集团及其偏好。而对于诸如杰克·斯耐德、查尔斯·多兰等将崛起国未进行收缩性战略调整的现象归因于错误认知与集体迷思的解释，并不能解释本文所选择的案例，即崛起国选择战略收缩并非在内部杜绝了集体迷思等错误认知，没有出现过度扩张的错误认知对于崛起国选择战略收缩而言属于既不充分也不必要的条件。^②

通过德意志第二帝国与北宋帝国两个崛起国案例内的战略调整与延续历史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国内文官控制的意愿逻辑更能解释崛起国收缩的现实（见表2）。但基于求同求异视角下的比较，尽管可以证明文官控制的国家意愿逻辑对于两个案例均有较好的说服力，但却无法识别是否存在其他混淆变量对两个案例存在干扰，这一缺陷也同样限制了本文逻辑的外部有效性。^③

① 约翰·马里奥特，格兰特·罗伯逊著，褚嘉君译：《帝国的崛起：从普鲁士到德意志》，重庆出版社2021年版，第435页。

② 从集合论的角度理解错误认知的缺失对于战略收缩的因果效力，并不能粗浅地认为收缩的崛起国一定没有错误认知，错误的高估与低估对手实力或外部环境，都可能造成决策者选择收缩的认知动力；因此错误认知的缺失与否对于解释战略收缩的形成与否并无裨益。这一观点也可参见：尹继武：《私有信息、外交沟通与中美危机升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8期，第71-99页。

③ 另外，本文所采取对于文官控制的界定相对宽泛，仍属于二分法式的判断，但在诸多历史案例中，文武关系较为多样化，更为精准的区分文武关系同样对于本文结论的后续研究有着关键意义。

表 2：既有解释逻辑与经验案例的匹配程度

战略态势	考察案例			
	1871年-1888年的德国	1888年后的德国	北宋崛起时期	太宗之后的北宋
	收缩	扩张	收缩	收缩
竞争性理论				
实现文官控制	√	×	√	√
缺失国家能力	√	×	√	×
结构决定逻辑	×	×	√	×
结构-互动逻辑	×	×	×	×
自由主义	×	×		
国内政治逻辑				无法适用

五、结论

战略收缩不仅仅是衰落国规避过度透支、避免陷入“李普曼陷阱”的选择，同样也是崛起国收敛锋芒、蓄势待发的必要前奏。本文抛弃了传统意义上的外部结构决定论，而选择从国内政治的视角来审视崛起国出现战略收缩的机理。通过对北宋建国到实现局部统一的历史以及完成普法战争后的威廉一世德国进行异时性共性比较，证实了文官控制逻辑下崛起国基于内部政治“去军事化”来实现战略收缩的可能，同时也说明了崛起国与霸权国迥异的战略收缩方式，即崛起国本身存在极大的战略自主性来进行对外安全战略的调整，从而规避与衰落霸权国“战与不战”的选择。

就本文案例来看，崛起国选择战略收缩既有所得亦有所失。德国在普法战争后放弃扩张型战略，转而实现了目标重置与资源优化后的战略收缩态势，既维持了欧洲大陆均势体系的运转，保证了自身外部威胁（英法俄）的相对分散，也使自身可以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成为欧陆首屈一指的强国。但其难以维持脆弱文官控制下的宪政体制，最终在军事力量脱离政治缰绳的情况下走向战略扩张。而北宋在太祖初期，受制于军事力量不足以及规避晚唐军人内部政变，其在初期就主动将军事力量置于枢密院、宰相等文官机构的控制之下，并且由此形成了“偃武修文”的社会风气，重塑了武力使用在国内政治生活的地位。但这一体制同样存在积弊，在文官控制下国家汲取能力与军事动员能力得到了长期增长，却并没有推动国

家对外武力扩张，反而使得不断膨胀的职业化军队成为国家的严重财政负担。由此可见，崛起国既不能轻易坠入军方鼓吹扩张获益的彀中，也不能走向文官控制下对于武力使用的完全摒弃。崛起国应在研判外部战略环境的同时维持内部文武平衡，从而实现平稳且有序的崛起进程。^①

对当前中国对外安全战略而言，本文可能提供的启发则是中国需要在准确研判外部战略环境的基础上，审慎看待如何设置自身战略目标以及实现目标与资源配置相耦合匹配的问题。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积累了丰富的战略资源以及相匹配的军事动员与执行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如美国所鼓噪的中国必然扩张的预言来临。相反，中国在面对外部安全压力升高的同时，可以借鉴历史上战略收缩的积极面，通过主动调整内部资源配置与自身目标设定来延长自身发展机遇的窗口期，同时以实际外交行动释放信号来否定西方话语霸权对于中国“修正主义崛起国”的标签化判断。一言以蔽之，中国战略转型需要发挥自身主动性，既不能贪图冒进以至于过度透支，也不可怯于改变、自缚手脚以至于错失战略收益最大化的良机。

^①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仅能说明文官控制的意愿逻辑属于崛起国实现战略收缩的必要性条件。

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的行动逻辑及前景研判

石立春

摘要：拜登政府执政以来“萧规曹随”，沿袭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愿景与目标，对华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斗争不断加剧，其战略意图仍是遏制中国崛起、维护美国霸权。拜登政府重拾对华意识形态攻击的政治战理念，奉行联盟战略、善用涉华热点敏感议题炒作的攻击战术，精心打造了以民主价值观统领对华全领域的战略竞争格局，对中美关系乃至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产生深远影响。拜登政府发起对华意识形态攻势有着自身的优劣势，未来走势充满不确定因素，对此，我们既不能低估其能力与已经取得的效果，又要密切关注其客观困难与主观意愿的上下波动，采取措施有效应对。

关键词：拜登政府；意识形态；战略攻势

作者简介：石立春，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萧规曹随”，沿袭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愿景与目标，将“中国是美国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近乎全面的敌对威胁和竞争对手”定位为中美关系的最基本性质及其对华政策的唯一重心，进一步强化对华竞争的联盟战略，以“民主国家联盟构想”兼顾地缘战略竞争与区域治理议题，发起对华意识形态的新攻势。2022年10月12日，拜登政府在中国共产党“二十大”召开前夕，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全面谋划了“竞赢”中国的系统性工程，明确强调未来十年是“取胜关键”^①，与“二十大”报告中“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对本文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① “The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The White House, October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1/8-November-Combined-PDF-for-Upload.pdf>

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①形成鲜明对比。拜登政府以民主价值观为统领的对华新攻势，将进一步加剧中美战略竞争，干扰中国发展进程，增加地区安全风险，势必引发中国的自我变革调适与强力反制。深度剖析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的战略缘起、行动逻辑、未来走势，对于研判中美关系走向，探究应对方略，防范“颜色革命”，实现民族复兴具有战略性和现实性意义。

一、文献回顾

拜登上台以来的新一轮对华意识形态攻势，深度契合美国推行价值观外交，大搞“民主促进”的历史传统与政治偏好，引发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国际问题研究等多个领域专家学者以及相关智库机构的关注与思考。

第一，在追溯历史渊源，尤其是与特朗普政府的对比中，审视拜登政府的新一轮对华意识形态攻势。相对于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理念和单边主义执念，拜登政府上台后调整外交政策，升级“印太战略”，更加强调整盟友、伙伴等小集团网络，更加注重在外交、经济、军事乃至地区治理议题上多管齐下，对华展开全方位战略竞争，^②竭力在太平洋岛屿地区打造完善“蓝色太平洋伙伴”，实现对中国的强力制衡。^③这是美国对华意识形态遏制战略的当代表现，深度契合了美国意识形态层面根深蒂固的霸权思维、政治层面两种制度较量的定位、经济层面资本利益的驱动，呈现出“长博弈”遏制计划、全方位遏制手段、孤立主义遏制思维、“全政府”遏制方式等主要特点。^④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5页。

② 韦宗友：《拜登政府“印太战略”及对中国的影响》，载《国际问题研究》2022年第3期，第29页。

③ 梁甲瑞：《地缘政治结构、印太战略升级与拜登政府的“蓝色太平洋伙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3年第3期，第45页。

④ 王晶：《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遏制战略与中国应对》，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2期，第101-110页。

第二，从战略、战术层面系统考察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从战略上来看，在拜登政府眼中，美国面临的最重要战略问题是能否和世界上其他“民主国家”共同维持一个以“自由民主价值观”为主导的国际秩序，或者世界是否会滑向一种由“威权主义”主导的国际秩序，因此，拜登政府将美国民主体制视为重振对华长期优势的根本所在，强调必须发挥这种优势才能增加战胜中国的机会。^①当前，拜登政府以民主价值观统领对华全领域竞争，精心谋篇布局，各手段之间协调性强，基本形成了“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局面。^②从战术上来看，美国协调欧盟、日本等盟伴持续强化“大西洋价值观联盟”，已经达成对华发动意识形态攻势的政策协调共识，在人权、价值观议题上借新疆、香港等具体问题，协调立场、对华施压，将成为常态。^③在此，意识形态既是目标又是手段，具有极强的工具性价值。^④

第三，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的前景研判。一种观点强调，虽然中国在很多问题上表现强势，但并没有彻底改变两国间“竞争性相互依存”的本质，美国政界近年来过于关注和夸大了中国的优势，陷入美国前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James R. Schlesinger）所说的“巨人恐惧症”，^⑤同时，作为一个军事大国，中国没有能力在“不摧毁自己的情况下摧毁美国”，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很难上升到对美国价值观构成生存威胁的程度，有关中国对美国意识形态方面的威胁也被夸大，事实上，中国政府对输出其治理体系兴趣不大，无证据表明中国人在强迫或积极劝说各国效仿他们的经验，^⑥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将趋于缓和。持相反立

① Hal Brands, Charles Edel, “A Grand Strategy of Democratic Solidarit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44, No.1, 2021, p.30. DOI: 10.1080/0163660X.2021.1893003.

② 张薇薇：《战略分析视角下的拜登政府“印太战略”》，载《和平与发展》2022年第2期，第36页。

③ 赵光锐：《拜登政府上台后欧盟-美国的对华政策协调：动因、领域与障碍》，载《德国研究》2022年第1期，第33页。

④ 徐万胜、罗桢韵：《从意识形态议题论拜登执政后美日同盟的强化》，载《日本学刊》2023年第2期，第56页。

⑤ Ryan Hass, *Stronger: Updating American Strategy to Outpace an Ambitious and Ascendant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5-9.

⑥ Michael D. Swaine, “China Doesn’t Pose an Existential Threat for America,” *Foreign Policy*, April 21, 2021,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4/21/china-existential-threatamerica/>

场、观点的专家认为，中美关系合作的基础和前景正在迅速消失，^①美国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想法真正改变中国，也不可能改变中国“谋取地区优势”和“主导亚洲秩序”的意图，因此，拜登政府将会采取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②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的前景并非简单的走向缓和或者强硬。拜登政府将在谋求实现价值观外交与追求商业利益、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防范中国”和“与中国合作”、正常贸易与高科技限制、战略与战术等多维平衡中，与中国形成新的竞争性共存关系。^③对此，中国应高度重视美国联盟体系不断加强、日益将主要矛头对准中国的现实，妥善应对美国联盟外交战略带来的各项挑战，防止出现“反华联盟”或者国际体系再次陷入阵营对抗与集团冲突。^④

国内外学者、智库机构围绕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意识形态输出，从不同学科、多个视角进行考察，拓展了研究视野，积累了丰富资料，在研究路径上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不过，单从对华意识形态攻势问题上来看，学术界对该问题的专注度不够，更加倾向关注拜登政府对华的经济、科技、军事、安全政策，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隐性”攻势，往往是将其置于“印太战略”的其中一维，致使成果较为分散，对涉疆、涉港、涉藏、涉台等议题的分析，缺乏意识形态层面的价值统领，对变化规律、未来走势研判不足。对此，要进一步提高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问题研究的关注度，将其拔高至中美战略竞争的层面予以考察。结合中美关系的“竞争性共存”态势，从政治战理念、联盟战略、热点敏感议题炒作等维度，系统考察新一轮对华意识形态攻势的行动逻辑、优劣条件，洞悉新一轮攻势的烈度与深度，研判变化规律、

① Aaron Friedberg, “An Answer to Aggression: How to Push Back Against Beijing,” *Foreign Affairs*, August 11, 2020,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0-08-11/ccp-answer-aggression>.

② Zack Cooper, Hal Brands, “America Will Only Win When China’s Regime Fails,” *Foreign Policy*, March 11, 2021,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3/11/america-chinasregime-fails/>

③ 王帆：《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性共存与新平衡》，载《和平与发展》2021年第4期，第19-24页。

④ 韩召颖，李伟：《拜登政府欧洲和印太地区联盟战略分析》，载《当代美国评论》2023年第1期，第42页。

未来走势以及中国的战略应对。

二、拜登政府对华的新一波意识形态攻势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沿袭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愿景与目标，发起对华新一波意识形态攻势，是美国对华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斗争不断加剧的客观产物，其战略意图仍是遏制中国崛起，维护美国霸权。

（一）拜登政府对华的意识形态攻势日益激烈

相对于特朗普政府时期更多关注国内事务、对外奉行“孤立主义”外交原则，拜登政府更加关注国际事务，提出“民主国家联盟构想”，召开“全球民主峰会”，在跨大西洋和印太等地区打造“民主联盟”，对外“民主输出”、推行“颜色革命”的战略主动性不断增强，对华意识形态攻势日益激烈。

拜登政府转变了特朗普政府时期实施的高度排外的“美国优先”战略以及对华竞争的“全面脱钩”手法，不过，在对华竞争的战略主线上，沿袭了特朗普政府2018年2月批准的《美国印太战略框架》强调的“打击中国的战略方针”，继续将中国定位为在印太地区乃至全球最主要的战略挑战，“美国唯一的全面性的敌手和竞争者”。^①2022年3月28日，美国国防部在提交国会的2022年《国防战略》（NDS）中，将中国明确定位为“最重要的战略对手和国防部日益紧迫的挑战”，强调美国必须“优先考虑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挑战，然后才是俄罗斯在欧洲的挑战”。^②相较于特朗普政府时期更加侧重于经济、科技领域的对华战略竞争，拜登政府的对华方略极力渲染中美两国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的对立，将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定位为“自由民主世界”与“敌对威权大国”之间的斗争。2021年3月4日，拜登政府发布了《更新美国优势：临时国家安全指南》，以十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审视中俄战略挑战，聚焦印太、欧洲、西半球地区。

^① “Secretary of State Antony Blinken Speech on Foreign Policy Transcript March 3”, Mar 3, 2021, <https://www.rev.com/blog/transcripts/secretary-of-state-antony-blinken-speech-on-foreign-policy-transcript-march-3/>

^② “Fact Sheet: 2022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March 28, 2022, pp.1-2.

这是拜登政府首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讨论中美关系：“‘自由民主世界’在内部遭遇腐败、不平等、社会极化等问题，在外部面临敌对威权大国的挑战……以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等综合实力衡量，中国是唯一可能对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持续挑战的国家”。^① 2022年10月13日，沙利文（*Jake Sullivan*）就《拜登—哈里斯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发表讲话，专门谈到：“中国正在国内外推动一种非自由主义愿景，自信地在经济、政治、安全和技术领域与西方竞争。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意重塑国际秩序，能力又在不断增强的竞争者。”^②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重心并非“备战”，而是以布林肯（*Antony Blinken*）外交政策演讲的“3C理论”——“在应该竞争时竞争，能够合作时合作，必须对抗时对抗”^③为基调，“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④ 拜登政府不断强调中国的战略威胁，“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只有中国同时具备在全球范围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的意愿与能力，中国的挑战将会长期存在”，^⑤ 但是转变了特朗普时期的对华“全面对抗”方式，更加注重竞争、合作与对抗手段的平衡，其目的仍是试图改变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让中国接受西方的价值观，遏制中国的崛起步伐。2023年5月，七国集团广岛峰会再次强调：“七国集团没有与中国脱钩，也没有向内靠拢。与此同时，七国集团领导人认识到有必要回应人们关切，捍卫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表示关切，呼吁中国不

①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The white house, March 2021, p.7-8,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

② “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on the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The White House, October 13,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10/13/remarks-by-national-security-advisor-jake-sullivan-on-the-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

③ “Secretary of State Antony Blinken Speech on Foreign Policy Transcript March 3”, Mar 3, 2021, <https://www.rev.com/blog/transcripts/secretary-of-state-antony-blinken-speech-on-foreign-policy-transcript-march-3/>

④ “Blinken Refuses to Call Biden’s Superpower Competition with China A ‘New Cold War’”, Business Insider, May 5, 2021,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blinken-refuses-call-biden-us-china-competition-new-cold-war-2021-5>

⑤ “The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The White House, October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1/8-November-Combined-PDF-for-Upload.pdf>

要进行干涉活动或破坏我们民主制度的完整性”。^①

（二）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的动因

拜登政府发起新一波对华意识形态攻势，深度契合其对中美关系的战略定位，对全球民主衰退、美国国内民主困境的价值认知，以及拜登本人及其执政团队、民主党人的外交政策理念。

第一，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的战略主动性不断增强，是美国对中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和“21世纪最大地缘政治考验”战略定位，将中美竞争建构为“自由民主价值观”与“威权主义”相博弈的客观结果。

拜登政府以民主价值观为统领，强调对内修复美国及其盟友的民主宪政体制，对外大搞“民主输出”，推行“颜色革命”，以求不断调整改善“民主国家”的政治文化和治理效能。2021年3月25日，拜登召开入主白宫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在发言中明确将中美关系定位为全球意识形态的竞斗，“这是21世纪民主的功用与专制之间的战斗。我们必须证明民主管用”。^②4月29日，拜登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美国的生存取决于向中国证明民主能够胜过专制。”^③2023年7月14日，拜登在纪念“被奴役国家周”讲话中，再次以“自由”与“专制”的对立话语评判中美关系：“反对压迫的斗争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结束。专制势力继续卷土重来。在中国和其他地方，我们看到了对法治、民主、人权，甚至对真相本身的再熟悉不过的蔑视”“美国自豪地与所有为自由而战的人站在一起”。^④

第二，对华发起意识形态攻势，推行“颜色革命”，深度契合了拜登

① “Fact Sheet: The 2023 G7 Summit in Hiroshima, Japan”, The White House, May 21,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5/21/fact-sheet-the-2023-g7-summit-in-hiroshima-japan/>

② “Remarks of President Biden in Press Conference”, The White House, March 25,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3/25/remarks-by-president-biden-in-press-conference/>

③ Jake Tapper, “Betsy Klein, Biden Says China Is Betting the US Can’t Keep Up with Autocracy”, CNN, April 28, 2021, <https://edition.cnn.com/2021/04/28/politics/china-us-democracy-autocracy/index.html>

④ “A Proclamation on Captive Nations Week(2023)”, The White House, July 14,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3/07/14/a-proclamation-on-captive-nations-week-2023/>

政府对全球民主衰退、美国国内民主困境的价值认知，以及拜登本人及其执政团队、民主党人的外交政策理念。

《经济学人》在《2021年全球民主指数报告》中，强调“全球民主指数”处于1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世界民主状况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衰退，对此，拜登深表认同，“在过去10年里，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超过半数的民主国家至少在民主方面经历了衰退”^①“当我们在2021年12月聚集这里时，世界上太多地方的情况是，民主的最好日子已经过去了。民主在某些方面已经连续衰落15年”。^②但是，面对全球民主衰退、国内民主困境，拜登及其执政团队的应对措施并没有放在西式自由民主制度上，而是指向中俄等“威权主义”的挑战，“民主衰退趋势面临的全球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需要共同面对：来自独裁者的外部压力，他们寻求提高自身的实力，在世界各地输出和扩大其影响力，并证明其压制性政策和做法是应对当今挑战的更有效方式”。^③由此，拜登政府将解决全球民主衰退、国内民主困境的现实诉求，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对立相衔接，建构出一套对华意识形态进攻的话语表达与行动框架。

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攻势的战略主动性增强，与民主党人热衷面向全球“民主输出”，擅于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选举中推波助澜，谋划“颜色革命”以及拜登的个人因素有关。“阿拉伯之春”“茉莉花革命”、台湾“太阳花运动”、香港“占中运动”，均发生于民主党执政时期。美国副总统、民主党人哈里斯（*Kamala Harris*）在第一届“全球民主峰会”的讲话中，着重强调：“民主目前受到威胁，而且15年来一直在下降。”^④美国

①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At The Summit For Democracy Opening Session”, The White House, December 09,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12/09/remarks-by-president-biden-at-the-summit-for-democracy-opening-session/>

②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at the Summit for Democracy Virtual Plenary on Democracy Delivering on Global Challenges”, The White House, March 29,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3/03/29/remarks-by-president-biden-at-the-summit-for-democracy-virtual-plenary-on-democracy-delivering-on-global-challenges/>

③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At The Summit For Democracy Opening Session”, The White House, December 09,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12/09/remarks-by-president-biden-at-the-summit-for-democracy-opening-session/>

④ “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Harris at the Summit for Democracy”, The White House, December 09,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12/09/remarks-by-vice-president-harris-at-the-summit-for-democracy/>

前众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Nancy Pelosi）关于“香港修例风波”的不当言论，及其执意窜访台湾，也能看出民主党对全球“民主输出”的执念。拜登本人担任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或资深成员长达12年，在美国外交政策制定实施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也热衷于大搞“颜色革命”。美国出兵伊拉克和阿富汗时，他为之大开“绿灯”；担任奥巴马政府副总统时便以美官方代表的身份，亲自策划指挥了2013年“乌克兰危机”。2021年1月23日，拜登上任三天之后，美国便策划参与了俄罗斯的全国性抗议游行活动；2021年12月，他在“全球民主峰会”提出“即将到来的（捍卫民主）行动年”，2022年1月，哈萨克斯坦便爆发未遂的“颜色革命”。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的干涉力度不断强化，“面对世界和平稳定、民主价值观、自由本身遭遇的威胁，我们做了我们一贯做的事情：美国挺身而出。北约加紧了行动。我们在欧洲、亚太地区以及印太地区的合作伙伴都挺身而出。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加紧了行动”。^①

三、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的行动逻辑

拜登政府重拾对华意识形态攻击的政治战理念，奉行联盟战略，善用涉华热点敏感议题炒作的攻击战术，精心打造了以民主价值观统领对华全领域的战略竞争格局。

（一）重拾对华意识形态攻击的政治战理念

拜登政府新一轮对华意识形态攻势中，十分注重舆论话语建构，在核心话语与话语框架上呈现为：以“历史终结论”否定中国，“中国威胁论”抹黑中国，“中国崩溃论”唱衰中国，“中国责任论”捧杀中国等。

第一，以“历史终结论”否定中国。拜登政府鼓吹西方自由民主价值的至高地位，“民主——透明、负责任的民有、民享、民治政府——仍然

^①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Supporting Ukraine, Defending Democratic Values, and Taking Action to Address Global Challenges (Vilnius, Lithuania)”, The White House, July 12,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3/07/12/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supporting-ukraine-defending-democratic-values-and-taking-action-to-address-global-challenges-vilnius-lithuania/>

是实现持久和平、繁荣和人类尊严的最佳途径”，^①从意识形态上宣扬西方自由民主对决社会主义的绝对胜利与历史终结，将中美关系建构为“民主价值观与威权主义”的对立，谋求消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文化，在国际上持续削弱中国话语权，抹黑玷污中国国家形象，以“确保太平洋两岸的和平，捍卫我们共同的价值观，促进我们的繁荣”。^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将中国早期抗击疫情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与“中国体制阻碍”^③相衔接；面对中国抗击疫情取得的巨大成功，他又改称：“有两个例子，一个是中国，另一个是新加坡，它们通过威权主义的方法成功地控制住了这场危机。”^④

第二，以“中国威胁论”抹黑中国。拜登政府继续秉承“中国威胁论”的对华舆论主调，以中美关系非友即敌的二元对立话语，视中国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从经济、科技、国际安全、意识形态等领域，全方位攻击污蔑中国。拜登及其执政团队的核心成员，比如国务卿布林肯、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等都是“中国威胁论”的鼓吹者。2023年4月27日，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就“重振美国经济领导地位”发表讲话，再次渲染中俄两国的巨大威胁：“中国继续大规模补贴钢铁等传统工业部门，清洁能源、数字基础设施和先进生物技术等未来关键产业。美国不仅失去了制造业，还削弱了决定未来关键技术上的竞争力。经济一体化并没有阻止中国在该地区扩张其军事野心，也没有阻止俄罗斯入侵其民主邻国。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变得更

① “Fact Sheet: The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s Abiding Commitment to Democratic Renewal at Home and Abroad”, The White House, March 29,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3/29/fact-sheet-the-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abiding-commitment-to-democratic-renewal-at-home-and-abroad/>

②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at the 2021 Virtual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The White House, February 19,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2/19/remarks-by-president-biden-at-the-2021-virtual-munich-security-conference/>

③ [美]弗朗西斯·福山：《什么决定一个国家对冠状病毒的抵抗力》，《太平洋月刊》2020年3月号，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6789959

④ Francis Fukuyama, “COVID-19 is Threatening Global Democracy and Peace”, <https://supchina.com/2020/05/01/francis-fukuyama-interview-covid-19/>

负责任或更合作。”^①面对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迅猛发展态势，拜登政府将意识形态问题与科技问题相糅合，推行“小院高墙”战略，将一般性技术问题政治化，反复动用“长臂管辖”策略，对华为、Tik Tok、中兴、海能达等中方企业强力打压，寻求制裁。此外，近年来美国社会带有浓厚种族主义倾向的“黄祸论”也在不断抬头。

第三，以“中国崩溃论”唱衰中国。拜登政府谋求通过军事施压、经济遏制、技术围堵、互联网平台的“颜色革命”等手段，阻止中国崛起、甚至促使中国崩溃。拜登上台以来，美国主流社会“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媒体不厌其烦、“花样翻新”地从体制、经济、生活环境等维度炮制“中国崩溃论”的陈词滥调，以当初对战苏联的手法，大打“舆论战”“认知战”。2001年发表《中国即将崩溃》的美国华裔律师章家敦（Gordon Chang），近年来频频鼓吹“中国崩溃”：2021年7月8日，他在《国会山报》发表署名文章，预测“中国会成为下一个进入阿富汗坟墓的帝国”^②。南加州大学林丹（Daniel Lynch）、布鲁金斯学会葛艺豪（Arthur R Kroeber）、素有“美国最有影响力中国问题专家”之称的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等专家学者，长期考察中国的人口、两岸关系、金融政策、政治体制与司法改革等问题，多次预测中国崛起的悲观前景，持续唱衰中国。

第四，以“中国责任论”捧杀中国。拜登政府承继以往美国历任总统的“中国责任论”话语表达，表面承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要求中国承担“额外责任”，比如，以中国近年来发展耗费世界大量资源的话语逻辑，要求中国在气候、环境等议题上承担额外责任。拜登上任的第一天便签署法令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继而在全球范围借助气候、碳排放等问题对华施压，比如，强调中国要对“一带一路”项目实施中的污染现象及碳排放承担责任，采取金融手段制裁沿线国家的化石能

① “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on Renewing American Economic Leadership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The White House, April 27,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3/04/27/remarks-by-national-security-advisor-jake-sullivan-on-renewing-american-economic-leadership-at-the-brookings-institution/>

② Gordon G.Chang, “China Will be the Next Empire to Enter the Afghan ‘Graveyard’”, The HILL, 2021-07-08.

源产业投资项目等。2021年11月3日，拜登在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COP26）期间，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责中国“不尽责”“不努力”；会议中，美国等西方国家多次谈及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问题，美国《每日野兽》新闻网站撰文专门批判“中国正在破坏COP26会议上的重大气候承诺”。^①2023年5月，七国集团广岛峰会发表领导人公报再次呼吁：“中国在《巴黎气候协定》和《昆明—蒙特利尔协定》框架下，就气候和生物多样性危机、自然资源保护等领域，包括在国际论坛上与我们合作，解决脆弱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和融资需求、全球健康和宏观经济稳定问题。”^②

（二）奉行对华意识形态攻击的联盟战略

拜登政府刚上任便提出“重建美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的口号，继续奉行以实力为原则的战略思想，强调对华战略竞争关系，但同时，又谋求国际竞争效益最大化，不过多地增加对外资源投入，由此，采取了推行价值观外交、动员国际意识形态联盟的方式，协调多维力量对华全面攻击，以求形成“反华大合唱”的全球政治效应。

第一，“印太战略”下的“二三四五”联盟伙伴矩阵。当前，“印太战略”是拜登政府强化对华意识形态攻势、打造国际联盟的重要抓手。

2021年以来，拜登政府着重从联盟关系、前沿外交、经济角逐、军事威慑等维度，大力推进“印太战略”。2022年2月11日，拜登政府发布《印太战略报告》，系统阐述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主要利益、战略意图及行动方案，再次突出中国的战略威胁：“中国正在整合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在印太地区谋求势力范围，寻求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大国。”^③在报告中，拜登政府持续鼓吹美国民主价值观，将推行自由民主、保障人权等作为干预主导地区事务的主要政策抓手，以维护印太地区自由民主、抵制外来干涉胁迫之名，行打压中国、维护美国全球利益之

① Jamie Ross, “China Is Sabotaging Big Climate Pledge at COP26 Conference, Says Report”, Nov. 11, 2021, <https://www.thedailybeast.com/china-is-sabotaging-big-climate-pledge-at-cop26-conference-says-report>.

② “G7 Hiroshima Leaders’ Communiqué”, The White House, May 20,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5/20/g7-hiroshima-leaders-communicue/>

③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White House, February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

实。2022年6月1日，布林肯在讲话中再次批判中国寻求的秩序是“不自由的”，美国追求的则是“不完美但自由的秩序”^① (*Imperfect But Liberal Order*)，竭力将中国描述为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与“挑战地区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强调要在印太地区维护和推行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

为打造印太地区反华的国际意识形态同盟，拜登政府十分注重盟伴关系的重建与修复，“当民主国家站在一起时，我们会加强和扩大彼此的努力，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已经一次又一次地看到——民主国家挺身而出，不仅为我们自己的人民，而且为全世界，共同领导和解决问题”。^② 拜登政府在印太地区的反华意识形态同盟，既包括以往军事同盟、对话沟通机制的修复与升级，又涵盖新型伙伴关系的构建与强化。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传统双边军事联盟，主要涉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对此，拜登政府动作频繁，意在修复地区的联盟关系；拜登政府十分重视、组建了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升级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 (*QUAD*) 机制，充分发挥美英加澳新“五眼联盟” (*FVEY*) 的情报收集与共享功能，进一步加强了与东盟各国的伙伴关系，强调“赞成东盟的中心地位”。^③ 韩国对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反应积极，尹锡悦政府紧跟出台了韩国版“印太战略”，“该战略提出了一种综合的方法，表明了尹总统和国民对维护法治和人权等普世价值的承诺”，^④ 同时，韩国还主动担任了第三届“全球民主峰会”的东道国。2023年5月，七国集团广岛峰会期间，拜登与岸田文雄 (*Fumio Kishida*) 着重强调“美日联盟是印太地区

① Antony Blinken, “Secretary Antony J. Blinken at the Foreign Affairs Magazine Centennial Celebration”,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June 1, 2022.

②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at the Summit for Democracy Virtual Plenary on Democracy Delivering on Global Challenges”, The White House, March 29,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3/03/29/remarks-by-president-biden-at-the-summit-for-democracy-virtual-plenary-on-democracy-delivering-on-global-challenges/>

③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White House, February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

④ “Statement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on the Republic of Korea’s Indo-Pacific Strategy”, The White House, December 27,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12/27/statement-by-national-security-advisor-jake-sullivan-on-the-republic-of-koreas-indo-pacific-strategy/>

和平与安全的基础”，^①与澳总理艾博年（Anthony Albanese）共同发表《澳美领导人联合声明——我们时代的联盟》，持续宣扬“以民主、法治、保护促进人权的共同价值观为基础”^②的美澳同盟。

第二，“反华大合唱”效应的全球政治期待。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的联盟战略，在印太地区选择所谓的“民主国家”，打造俱乐部形态的“小多边集团”，目的在于能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反华大合唱”的政治效应，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

一方面，奉行对华意识形态攻势的联盟战略，有助于进一步协调盟伴、涉华利益相关方的立场，从而在争取“统一声音”中强化对华重大举措的“国际统战”，不断弱化乃至切断盟伴与中国的战略联系。当前，拜登政府正是在持续渲染中国“意识形态输出”“战狼外交”等概念中，以民主价值观为统领，巩固传统联盟，拉拢相关国家与地区，在地缘政治上形塑对华的合围态势：2021年5月，丹麦“民主联盟基金会”高调举办“2021哥本哈根民主峰会”，猛烈批判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在峰会上呼吁全球“民主伙伴”加强合作，大谈威权国家势力扩张给民主价值带来的威胁，“港独”组织“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等人出席；英国前首相约翰逊早在2020年5月便提出组建“民主十国联盟”（D-10），共同应对中国的威胁挑战，与拜登提出的“民主国家联盟”构想不谋而合。2021年1月，七国集团会议期间，约翰逊再次提出讨论组建“民主十国联盟”问题；韩国积极响应美国“印太战略”，主动担任第三届“全球民主峰会”东道国等。

另一方面，拜登政府以民主价值观为抓手，在印太地区展开密集外交攻势，致使近年来中欧、中英、中日关系相继出现波折，其“印太经济框架”的战略实施，对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更是具有极强的针对性，涉及台湾、南海问题的频频干涉，进一步恶化了地区安全局势，乃至中国

^①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and Prime Minister Kishida Fumio of Japan Before Bilateral Meeting”, The White House, May 18,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3/05/18/remarks-by-president-biden-and-prime-minister-kishida-fumio-of-japan-before-bilateral-meeting/>

^② “Australia-United States Joint Leaders’ Statement - An Alliance for our Times”, The White House, May 20,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5/20/australia-united-states-joint-leaders-statement-an-alliance-for-our-times/>

和平崛起的周边战略环境。2021年9月16日，继欧洲议会大比数通过《新欧中战略报告》后，标志欧盟官方整体性“印太战略”的《欧盟印太合作战略》发布，10月21日，欧洲议会通过《欧盟—台湾政治与合作关系》报告，将台湾纳入欧盟的“印太战略”，鼓吹提升欧台关系，这是欧盟进一步强化对华价值观外交的重要表现。2023年7月13日，德国根植于欧盟对华政策以“政硬经软”的姿态，出台史上首份“中国战略”，在政治方略上基本沿袭了德国《国家安全战略》措辞，在一些触及中方底线问题上甚至比2023年“北约维尔纽斯峰会”《联合声明》更加激进。这些都可以视为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联盟战略实施的“蝴蝶效应”。

（三）涉华热点敏感议题操作煽动的攻击战术

拜登政府协调盟伴立场，持续强化“大西洋价值观联盟”，基于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和西方霸权主义逻辑，以人权、价值观为旗号，围绕涉华热点敏感议题煽动炒作，多点强化对华的意识形态攻势。

第一，大搞“人权外交”，炒作煽动涉疆、涉港、涉藏议题。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以维护保障人权、自由民主价值观、国际安全、同盟外交等为旗号，围绕中国新疆、香港、西藏等地区，反复炒作人权、民主、少数民族裔和信仰自由等议题，频频干涉中国内政，对华施压。

拜登政府将国内治理的劳工政策与对华意识形态竞争的“人权问题”相耦合，以不断增强的对华“人权攻势”，谋求获取更大的政治红利。在新疆问题上，拜登政府不顾中国人权保护的事实，强调“解决强迫劳动问题一直是本届政府的优先事项”，^①将新疆产品定位为“强迫劳动”的产物；2021年12月23日，拜登签署《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UFLPA，又称“涉疆法案”），禁止从中国新疆进口产品，发布“新疆供应链企业警告”，胁迫涉及农业、手机、棉花制品、能源矿产等多个产业的美国企业退出新疆。^②欧盟、英国、加拿大等“盟伴”也纷纷跟进，以“严重人

^① Antony J. Blinken, “The Signing of the 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ion Act”,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ecember 23, 2021, <https://www.state.gov/the-signing-of-the-uyghur-forced-labor-prevention-act/>

^② “Xinjiang Supply China Business Advisory”, U. S. State Department, 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7/LS-2021-0114277-CHN-FINAL_Updated_Xinjiang_Business_Advisory_13July-corrected.pdf

权虐待”为由发动对华制裁。2021年6月13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再次要求中国在新疆尊重“人权与基本自由”。^①在香港问题上，拜登政府联合欧盟、英国、加拿大等，反复炒作自由、民主、人权议题，动作频繁：2021年3月12日，针对全国人大关于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举措，“七国集团”外长与欧盟高级代表认为此举将“削弱香港的民主成分”，表示严重关切；5月27日，香港立法会三读通过《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综合修订）条例草案》，对此，布林肯再度发表声明：“美国与我们的盟国和伙伴一致发出强烈的呼声，要求实现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对香港人民承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②2023年7月，拜登公然扬言“香港的局势，包括中国最近采取的从根本上破坏香港自治的行动，继续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构成非同寻常的威胁”，^③将延长所谓的“针对香港局势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一年。在所谓“西藏人权问题”上，拜登政府也是极力炒作，2023年5月，七国集团广岛峰会联合声明中继续妄谈：“我们将继续表达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切，包括对西藏和新疆强迫劳动问题的严重关切。”^④2023年5月，美国发布《2022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在“中国（包括香港、澳门、西藏和新疆）”专栏中，再度以“种族灭绝”“打压宗教”之名，在涉疆、港、藏等地区问题上谋求制华遏华。^⑤

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政府积极利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国际组织平台纠集盟伴共同对华施压，比如，2023年3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2届会议期间，美国便以“人权问题”为由纠集多国持续抹黑诬蔑

① “Carbis Bay G7 Summit Communique”, The UK Government, July 12, 2021,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carbis-bay-g7-summit-communique/carbis-bay-g7-summit-communique/>

② Antony J. Blinken, “Denial of Democracy in Hong Kong”, May 27, 2021, <https://www.state.gov/denial-of-democracy-in-hong-kong/>

③ “Notice on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National Emergency with Respect to Hong Kong”, The White House, July 11,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3/07/11/notice-on-the-continuation-of-the-national-emergency-with-respect-to-hong-kong-3/>

④ “G7 Hiroshima Leaders’ Communique”, The White House, May 20,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5/20/g7-hiroshima-leaders-communique/>

⑤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2022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May 15, 2023, <https://www.state.gov/reports/2022-report-on-international-religious-freedom/>

中国。

第二，刻意突出台湾、南海议题的意识形态色彩。拜登政府以自由民主、维护人权为旗号，将不同性质的台湾、南海议题混淆捆绑，公开干涉中国内政，致使这些议题的意识形态色彩日益浓厚。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拜登政府沿袭特朗普政府时期对华系统性意识形态攻击与宣扬台湾“民主成就”并行的策略，以“一法三报六保证”持续虚化美方的“一个中国”政策，纠集欧盟、日本、澳大利亚等盟伴联合行动，将支持乌克兰抗俄与支持“台湾民主”混为一谈，不断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致使美国在台湾议题上的对华“新冷战”意识形态倾向不断强化。拜登政府一再宣扬捍卫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大肆宣扬“中俄轴心论”，打造围堵中国的“热爱自由的国家的全球联盟”，反复炒作“台湾民主”受到大陆威胁，积极拉动台湾当局投入美国主导构建的全球“价值观联盟”与“高科技联盟”阵营。拜登政府在指责中国“威权主义”“专制政权”“侵犯人权”的同时，高度评价台湾的所谓“民主成就”，认为台湾是一个“充满生机的民主国家”和重要的安全与经济伙伴，在国际社会上是一股“向善的力量”。^① 2021年12月，拜登政府要求台湾参加“全球民主峰会”，再次强调：“台湾是一个领先的民主国家……可以为实现此次峰会在国内外反对独裁主义、反腐败和促进对人权的尊重等方面做出有意义的承诺。”^② 2021年“全球民主峰会”期间，台湾参加了由政府和其他伙伴组成的“焦点小组”工作，并在两次民主峰会期间继续制定计划、寻求增强“民主韧性”。2023年“全球民主峰会”新闻发布会上，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他们（台湾）再次受到邀请，这符合我们的非官方关系和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这个政策没有改变，仍然以《与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六项保证》为指导。台湾被邀请参加会议的方式与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是一致的，这一政策没有改变，基本上将反映我们

① “New Guidelines for U. S. Government Interactions with Taiwan Counterparts”, Press Statement, Ned Price, Department Spokesperson, April 9, 2021, <https://www.state.gov/new-guidelines-for-u-s-government-interactions-with-taiwan-counterparts/>

② “Background Press Call by Senior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on the Summit for Democracy”, The White House, December 7,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s-briefings/2021/12/07/background-press-call-by-senior-administration-officials-on-the-summit-for-democracy/>

在2021年采取的做法。”^①

拜登政府的南海政策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印太叙事”，将“自由开放印太”与“南海问题”相衔接，利用自身国际话语优势，以意识形态语言制造话语对立，持续抹黑中国的南海形象，不断增加中国在南海的行动成本，为介入南海事务寻求合法性，打造在黄海、东海、南海、台海、印度洋等多点位的安全联动态势，持续强化自身联合盟伴遏制中国的能力。拜登政府不断渲染中国在南海的“军事专制”，声称“南海地区是基于规则的海上秩序受到最大威胁的地区，而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胁迫威胁了这条海上通道的自由”；^②重提2016年“国际法庭南海仲裁案”，宣称中国的南海政策是“主张非法、行为非法”，攻击中国2021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渲染炒作中国与南海沿岸国家的冲突，以及所谓的“海上民兵”问题等。2023年5月，美澳领导人联合声明再次强调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权利”，“强烈反对在南中国海采取破坏稳定的行动，例如在有争议的岛礁上进行军事化，危险地使用海警船和海上民兵，以及破坏其他国家海上资源开发的努力。对中国违反国际法的过度海洋主张和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单方面行动表示关切。”^③拜登政府的一系列举措，旨在将中国在南海形塑为“规则破坏者”，相对应，美国是“航行自由”的“秩序维护者”，南海其他声索国是“受胁迫者”，“同盟—伙伴关系”网络的民主国家是“自由、开放”的“捍卫者”。^④

第三，全球抗疫的政治化。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奉行阴谋论、在病毒溯源、追责中国等议题上的“政治化”做法，同时将疫情防控与价

① “Background Press Call by Senior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Previewing Day One of the Summit for Democracy”, The White House, March 28,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s-briefings/2023/03/28/background-press-call-by-senior-administration-officials-previewing-day-one-of-the-summit-for-democracy/>

② “Fifth Anniversary of the Arbitral Tribunal Ruling on the South China Sea”,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July 11, 2021, <https://www.state.gov/fifth-anniversary-of-the-arbitral-tribunal-ruling-on-the-south-china-sea/>

③ “Australia—United States Joint Leaders’ Statement—An Alliance for our Times”, The White House, May 20,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5/20/australia-united-states-joint-leaders-statement-an-alliance-for-our-times/>

④ 贺先青：《拜登政府的南海叙事逻辑、政策意涵与行为选择》，载《南洋问题研究》2022年第2期，第118页。

值观外交相结合，谋求不断提高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与政治领导力。

一方面，拜登政府继续以阴谋论在疫情起源、抗疫模式等方面肆意污蔑中国，“关于这次疫情的关键信息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从一开始，中国的政府官员就一直致力于阻止国际调查者和全球公共卫生共同体成员进行评估”。^① 2021年2月，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世卫组织考察组明确表示实验室事故引发病毒泄露、病原体从中国一家机构泄露出去是“极不可能”的，对此，拜登政府表示不能接受，沙利文随即发表声明强调美国“对世卫组织如何得出这一结论存在疑问”。^② 2021年5月26日，拜登要求美情报机构在90天内提供“对新冠病毒起源的最新分析，包括它是源自人类接触了受感染的动物，还是源自一起实验室事故”，^③ 这一要求带有明确的对华指向性，但是，经过三个月时间的调查，美国多数机构得出“中国官员在新冠疫情暴发前并不知情”^④的结论，致使拜登政府假借病毒溯源污名化中国的计划破产。

另一方面，拜登政府更加强调价值观念与长远利益，将全球抗疫战略化为中美意识形态影响力的竞争，以重塑美国软实力、全球领导力，同时也向全世界昭示：“世界主要民主国家携手协力，民主制依然是最有效的政府形态”。^⑤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全球公共卫生（抗疫）成为美国对外援助的重点领域之一，2021年6月10日，在英国康沃尔参加七国集团峰会的拜登强调，要将全球抗疫视为与中国意识形态影响力的竞争，宣布准备采购5亿新冠疫苗捐献给92个低收入和较低收入的国家与非盟；6月11日，拜登与英国前首相约翰逊（*Boris Johnson*）倡导，七国集团与“嘉

① “Biden Pushes China to Release ‘Critical’ COVID Info After Beijing Warns of ‘Counterattack’”, *Newsweek*, August 28, 2021, <https://www.newsweek.com/biden-pushes-china-releasecritical-covid-info-after-beijing-warns-counterattack-1623890/>

② Michael Hiltzik, “The Lab-leak Origin Claim for COVID-19 Is in the News, But It’s Still Fact free,” *Los Angeles Times*, June 3, 2021.

③ Michael Hiltzik, “The Lab-leak Origin Claim for COVID-19 Is in the News, But It’s Still Factfree”, *Los Angeles Times*, June 3, 2021.

④ Michael R. Gordon, Warren P. Strobel, “New U.S. Intelligence Report Doesn’t Provide Definitive Conclusion on Covid-19 Origins”, <https://www.wsj.com/articles/biden-to-receive-report-on-coronavirus-origins-but-challenges-persist-in-how-to-deal-with-china-11629825758/>

⑤ “Biden and G7 Leaders to Commit to Donating 1 Billion COVID-19 Vaccines”, *CBS News*, June 11, 2021.

宾国”澳大利亚共同宣布向发展中国家免费提供10亿新冠疫苗。拜登本人高度评价了美国在全球抗疫中的巨大贡献，“为我们在过去几个月里共同完成的工作以及我们为全世界接种疫苗所做出的承诺感到无比自豪”，^①同时多次指责中俄两国的“疫苗外交”，这种将全球抗疫政治化的做法，深度契合了“拜登主义”的价值要义：“我们必须保证民主政体——从我们自己的民主政体开始——能够提供我们时代诸关键挑战的解决办法”。^②

四、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的前景研判

拜登政府推行价值观外交，构建民主联盟，对华发起新一波意识形态攻势，对中美关系乃至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产生深远影响。拜登政府发起对华意识形态攻势有着自身的优劣势，未来走势中也充满着各种不确定因素，对此，我们既不能低估其能力与已经取得的效果，又要密切关注其客观困难与主观意愿的上下波动，采取措施有效应对。

（一）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的优劣势

拜登政府对华新一波意识形态攻势，受到国内治理、盟伴关系、中国反向塑造行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优劣势明显。

第一，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的有利条件。当前，美国仍然是世界上GDP第一的国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长期位居西方世界的霸主地位，全球政治领导力略显衰颓但仍然存在，全球话语权优势明显。拜登政府推行的价值观外交历史悠久，热衷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较大吸引力，再加上部分国家与中国存在利益纠葛，或者担心中国全球影响力上升，因此，拜登政府对华攻势引发了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响应。近年来，欧盟对华推行价值观外交，以自由民主、人权为由反复炒

^①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at the Global COVID-19 Summit”, The White House, May 12,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05/12/remarks-by-president-biden-at-the-global-covid-19-summit/>

^② “Biden and Johnson Sign New Atlantic Charter on Trade, Defense Amid Covid Recovery”, NBC News, June 10, 2021, <https://www.nbcnews.com/politics/white-house/biden-johnson-sign-new-atlantic-charter-trade-defense-amid-covid-n1270282/>

作涉港、台、疆、藏、南海议题，跨大西洋联盟共有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已经成为欧美协调对华关系的一面大旗。2023年7月，“北约维尔纽斯峰会”发表《联合声明》，连篇累牍、老调重弹，以浓厚的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肆意歪曲中方立场和政策，刻意抹黑中国，声称中国的政策严重挑战着北约的利益、安全和价值观，是对“欧洲—大西洋安全”的系统性挑战。此外，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也是积极响应。从操作层面来说，拜登政府在印太地区选取所谓的“民主国家”，以俱乐部形态的“小多边集团”展开对华行动，方便、快捷、高效、可操作性强、成本较低。

第二，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面临的挑战。拜登政府推行价值观外交、对华发起意识形态攻势，除去中国应对挑战的反向塑造能力因素，还要处理好奉行自由民主理念的理想主义与注重现实利益的实用主义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拜登政府对华价值观外交难以实现与本国现实利益之间的平衡，其内政外交难以有效兼顾对华的战略实施。拜登接任总统的美国，正处于疫情肆虐、“黑命贵”运动持续蔓延、极端种族主义盛行、社会严重分化的“美利坚分众国”状态，其欲强化对华战略竞争，必须有效兑现修复国内民主、应对新冠疫情、恢复国内经济、妥善处理种族歧视等竞选承诺。当前，国内治理状况严重掣肘着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的战略行动，以“自中而外、自下而上”^①为指导思想的“拜登经济学”毁誉参半，最终效果如何尚待观察。中美两国的巨大合作空间，美国国内进步人士对拜登政府系列做法的担忧与反对，也在持续消解着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的“新冷战思维”。

另一方面，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联盟策略的实施，必须处理好与盟伴的关系，极易陷入盟伴协调困境。特朗普政府时期频现的“坑队友”行为严重损伤盟友对美国的信心。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以“美国回来了”为旗帜，积极修复盟友关系，但是美国全球政治领导能力的衰颓已是

^① “Bidenomics Is Working: The President’s Plan Grows the Economy from the Middle Out and Bottom Up—Not the Top Down”, The White House, June 28,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6/28/bidenomics-is-working-the-presidents-plan-grows-the-economy-from-the-middle-out-and-bottom-up-not-the-top-down/>

事实。同时，美国还必须处理好盟伴内部的利益诉求，在印太地区，除了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能够与拜登政府的对华方略保持高度一致，东盟国家、印度等大多数国家并不想放弃对华合作，或者公开成为中国的“对手”。欧盟近年来在对华价值观外交方面，与美国保持高度一致，不过，其对华关系的战略自主性不断增强，再加上中欧之间的巨大合作空间，他们更愿意当“棋手”，而不只是“棋盘”或者“棋子”，势必影响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的统一意志。

（二）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的未来走势

拜登政府发起对华意识形态攻势，是综合考量国家利益后的战略决策，受到中美两国关系走向的影响，呈现出以下发展态势：

第一，从战略上来说，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服务于美国的“印太战略”，将随着对华战略调适发生转变，但是，遏制中国崛起、维护美国霸权的决心与意志不会改变。同时，中美两国的竞争性共存关系，决定了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击的矛盾性，以及沿袭特朗普政府“全面脱钩”方略的不现实性，因此，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强化联盟战略、对华精准打击将成为一种常态。

一方面，拜登政府发起的新一轮对华意识形态攻势，代表了美国精英阶层打压中国的决心与意志，固然国内治理面临的诸多挑战会制约其对华攻势，但是，遏制中国崛起、维护美国全球霸权的目标将长期存在。我们强调拜登政府国内治理面临诸多挑战时，应当看到：拜登政府上台以来，随着1.9万亿美元救市款、1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3.5万亿美元规模的2022年财年预算框架草案的相继通过，2021年美国GDP不仅扭转了2020年负增长的局面，更是达到了5.9%，创1984年以来历史最高值，2022年GDP增长率恢复至2.1%，聚焦产业政策的“拜登经济学”也取得了初步业绩；美国社会的严重撕裂与社会文化震荡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一度愈演愈烈的“黑命贵”运动不断降温；2022年中期选举民主党优势得到巩固，拜登政府以跨党派议案团结国会两党议员、打造强硬反华立法体系的行动颇为自如；此外，美国民主制的固有韧性、拜登本人“绝地反击”式的激情都不应被人们忽视。因此，今后一段时间内，拜登政府及美国后续政府将不断强化对华意识形态攻势。

另一方面，中美两国的竞争性共存关系，尤其是在风险管控方面作出的诸多努力，决定了对华“全面脱钩”的做法行不通，拜登政府发起对华意识形态攻势时，势必要处理好价值观外交与现实利益追逐、竞争与合作的关系。经过两年多内政外交的努力，拜登政府推行“印太战略”，以价值观外交统领对华意识形态攻势，战略布局合理战术手段得当，基本上形成了全面打压中国的态势，不过，在战略展开的具体实践中，因支撑战略攻势的资源投入不足，目标与手段不匹配，部分战略手段的建设性不足、破坏性较强，盟伴立场动摇、分化，尤其是俄乌战争对美国全球战略资源再配置的影响，以至于对华意识形态战略攻势推行不畅，效果不甚显著。目前，从拜登政府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盟伴立场态度、全球政治领导力等方面综合审视，恪守实用主义，选取所谓“民主国家”，打造反华制华的俱乐部形态集团，对华精准打击，将成为一种常态。当然，也不排除因突发事件，中美爆发直接、全面冲突的可能。

第二，从战术层面来说，构建“民主国家联盟”，推行价值观外交与人权外交，炒作涉疆、涉港、涉藏等敏感议题，充分发挥台湾地区在“民主国家联盟”战略中的重要作用，将是拜登政府及后续美国政府制衡中国、强化意识形态攻击的重要抓手。

一方面，拜登积极构建“民主国家联盟”，宣布召开“全球民主峰会”，引发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期待、响应与支持。假如拜登政府提出的“民主国家联盟”构想、“全球民主峰会”，与“北约峰会”“七国集团峰会”等已有机制相衔接，走向常态化，极易成为其在全球范围内打造反华制华统一战线的催化剂。另一方面，拜登政府以价值观为统领的对华意识形态攻势联盟战略实施，离不开涉疆、涉港、涉藏、涉台等地区议题的炒作与煽动。无论是对华推行价值观与人权外交的需要，还是为了联合东海、南海、台海等区域利益声索国，以及出于国内政治情势的考量，拜登政府都将继续炒作相关议题，以获取更大政治红利。在台湾问题上，美台关系走向与中美关系、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关系的走向密切相关，今后，美国将继续府会协同、大打“台湾牌”，进一步强化美台安全合作，不断发展美台实质关系。台湾“民进党”当局今后也会积极迎合拜登政府的价值观外交，持续渲染大陆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威胁与挑战，扭曲丑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形象，甚至公开拒绝“一国两制”，挑战、冲击

中国大陆的底线。

（三）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的战略应对

面对拜登政府及美国后续政府对华发起的近乎全面的意识形态攻势，以及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下的民族复兴大任，中国应当坚守战略定力，保持高度警惕，把稳方向，避免碰撞，量力而为，量利而行，节约成本，防范风险，妥善应对，强化对外反向塑造能力，稳步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第一，要持续推进意识形态工作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不断夯实以综合国力为基础的国际话语权。面对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攻势、推行“颜色革命”的常态化，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①持续强化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具体来说，进一步强化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以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为重点，不断拓展新时代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守住“红色地带”，压缩“黑色地带”，争取“灰色地带”，不断提升广大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自觉抵制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颜色革命”的侵害；进一步健全意识形态工作制度、法律法规，有理有据、合法合规地开展意识形态工作，不断丰富意识形态工作的内容、创新形式、拓展载体与方法，实现意识形态工作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进一步推进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媒体融合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不断提升运用新兴媒介抵制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渗透、对外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多元文明沟通交流的能力，增强我国的国际话语权。

第二，要进一步强化中国的反向塑造能力，持续消解拜登政府以民主价值观统领、奉行联盟战略、炒作涉疆涉港涉藏等敏感议题带来的巨大危害。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的战略展开，势必给中国和平崛起、印太地区的安全稳定发展带来诸多干扰。作为被攻击的一方，中国要不断强化自我调适、持续提高对美的反向塑造能力，“面对美方发难，中方坚决捍卫国家利益，防止中美关系‘脱钩’，同时把握斗争节奏，争取中美关系

^①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大局稳定》，载《光明日报》，2019年1月22日，第1版。

转圜发展的空间。中国将有能力主动塑造未来的中美关系。”^①面对拜登政府联合盟伴发起的对华新一轮意识形态攻势，中国的反向塑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利用自身庞大的市场与经济实力，反向塑造与包括美欧日澳等在内的利益关系，拒绝对抗，扩大合作，深化各层级实体交往，持续巩固合作共赢主基调，扮演好世界经济复苏的“推进器”、国际局势发展的“稳定锚”；积极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化对外交往的议题塑造能力，不断提高我国的国际议程设置权、国际规则制定权、文化软实力与国际话语权；坚持创新驱动，增强发展动能，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不断提高我国在高新科技领域影响、参与规则制定的能力；促进新时代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反向影响包括欧美国家在内的经济发展理念、社会治理规则等。

^① 马子倩,周呈宣:《国研院发布新版中国外交蓝皮书:中国将有能力主动塑造未来中美关系》,2021年3月13日,载《中国青年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4097874912747571&wfr=spider&for=pc>

非对称性报偿结构如何影响地区合作 ——基于对南亚区域合作进程的分析

李铭恩

摘要：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南亚区域主义的特点是进展缓慢、效率低下、合作机制经常性停摆，同时地区大国印度也未能在区域化过程中淡化与邻国间的敌意、构建区域信任。针对南亚区域主义相对失效的问题，本文尝试以非对称性报偿结构为分析视角，展现南亚区域主义中的三类行为体——地区大国印度、地区强国巴基斯坦和地区小国——在区域合作中的策略变化及其对区域合作的影响，以此解释停滞甚至是逆向的区域化进程是如何形成的。报偿结构决定了区域主义参与国初始策略的稳定性，而在区域化过程中，参与国报偿结构的不对称性影响了它们能否以及如何改变原有的策略选择。对于南亚的区域合作，印度、南亚小国和巴基斯坦分别怀有僵局、胆小鬼和相对弱势的僵局博弈参与者的偏好，它们的报偿结构呈现出了非对称的特点。在南亚区域化进程中，印度与南亚小国、印度与巴基斯坦分别形成了“恶棍博弈”和不对称状态下的“僵局博弈”。两个混合博弈组显示，区域主义不仅不必然改善各国在区域合作中的收益，策略的交叉也可能逐渐演化为所有参与国更加倾向不合作的僵局形式。因此，面对“重复的失败”和“争端的溢出”两个区域主义困局，只有各国重构报偿结构、突破安全主导型的合作逻辑，区域主义才能发挥促进区域稳定与繁荣的正向作用。

关键词：区域主义；报偿结构；不对称博弈；南亚地区；印度

作者简介：李铭恩，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形成的三次“区域主义浪潮”中，世界各地诞生了各种各样的区域治理安排，这些地区层次的国际合作在加强地理毗连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对本文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区域之间的贸易和文化联系，追求区域与次区域持久繁荣与安全方面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近年来区域主义在解决冲突、应对大国战略竞争下的全球治理问题时不断暴露出内在缺陷，欧盟、东盟等合作组织在应对全球和地区危机方面受到了自身条件与外部环境的多重限制。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暴发的背景下，多个区域多边合作机制出现了效用不足甚至是缺位的现象。比较世界各地区域主义的发展现状，南亚区域合作进程发展缓慢，区域组织在应对国际和地区危机上所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作为区域主义发展最不成功的地区之一，南亚的合作困境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其现实经验可以为当前世界各地所共同面临的地区难题提供一种不同于理想模式的新理解。

区域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政治的组织形式、社会文化的发展理念，更是一个研究层次、一种分析视角。多年来，为了描述、解释或探索区域主义这一主题，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产生了许多方法和理论，区域主义和次区域主义概念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①不过，旧有的区域主义分析视角越来越难以解释新出现的各种地区现象，区域主义研究面临着理论与现实不能相融的困境。本文尝试从南亚三类国家在区域合作中的非对称性报偿结构切入，解释南亚区域主义不成功的原因并分析其发展前景，以此提供一种更加反映现实状况、能够更有效解释区域合作问题的研究框架。

一、问题的提出

总体来看，南亚区域合作长期处于发展进程极为缓慢或停滞的状态。自20世纪70年代区域主义的规范传入南亚次大陆，南亚国家很少顾及彼此之间的协调，1985年成立的南亚地区合作联盟也并没有改变合作水平低、效率差的状况。即使在区域氛围较好、区域交往比较活跃的时期，南盟的积极贡献也主要体现在社会领域，在获得必要的政治意愿、解决破坏

^① 区域主义理论包括系统层次的理论(新现实主义,结构性相互依赖与全球化),地区层次的理论(新功能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和国内层次的理论(地方主义和国家一致性,政权类型与民主化,趋同理论)。相关研究参见 Andrew Hurrell, "Explaining the Resurgence of 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1, No.4, 2009, pp.331-358。

区域稳定和安全的共同争议方面，南盟的作用并不大。^①2016年后，南盟框架下的合作再次因印巴边境冲突而停滞不前，次区域和跨区域合作逐渐开始替代南盟的作用，但这些功能性小多边的合作形式同样进展十分缓慢，在关键领域的合作多年来始终停留在制定计划、讨论方案和签订书面协议的初始阶段。本文尝试探究的主要问题是南亚区域主义处于缓慢发展困境的原因。从表面上看，南亚区域合作进程受阻往往是因为受到了区域内国家双边关系恶化的影响，但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是，成员国的双边冲突为什么会经常性地中断南亚区域合作进程，南亚区域主义为什么是相对无效的。

从纵向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南亚的区域主义实践是不成功的。首先，经济相互依存是评判区域主义发展程度的重要衡量标准。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提供的数据，南亚的区域内贸易水平远低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②在南亚区域主义发展的三十多年间，南亚国家没有显著加深彼此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其次，南亚区域主义在缓解国家间矛盾方面是无效的。作为曾经南亚最主要的地区合作机制，南盟峰会在发挥作用的31年中有13年处于机制暂停状态，^③其落入无法正常开展的境地基本上是由于成员国相互交恶导致的。南亚各国不仅没有通过合作改善彼此间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反过来严重阻碍了区域合作进程。最后，南亚区域主义更没有促进区域共同意识。一般而言，区域合作不仅是发展中国家获得新的发展机会、摆脱全球化被动地位的重要手段，更重要的是，区域主义能够使它们与邻国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体系，获得持续可靠的信息，解决政治不确定感。但是，

① Santosh C. Saha, "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SAAR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South Asia: A Study of Som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Indian Journal of Asian Affairs*, Vol.18, No.2, 2005, pp.33-34.

② 2021年，南亚的区域内贸易占区域贸易总量的6.5%，这一比例远低于欧洲（66.6%）、东亚（36.1%）、东南亚（21.7%）、北美（22.8%）；与经济不发达、一体化程度不高的地区相比，南亚的区域内贸易水平也低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18.7%）、西亚与北非（16.2%）、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14.6%）、中亚（9.6%）。"2021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Yearbook", UN Comtrade Database, 2022, <https://comtradeplus.un.org/Publication/ITSY>.

③ 1985年，南盟召开第一届首脑峰会，成员国通过《达卡协议》，标志南盟正式成立。2016年，第十九次南盟峰会原定在伊斯兰堡召开，但由于印巴矛盾迄今未举行。

南亚则没有出现这种因区域合作而淡化敌意、产生信任的正面效应。由此可见，南亚区域主义没有发挥其本应令人期待的良好作用。

从横向看，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南亚的区域合作水平也相对落后。在机制化程度方面，区域主义实践和理论的发源地欧洲最初存在着德法之间深刻的政治矛盾，但欧盟能够通过转让国家部分主权而改善主要机构的政府间性，在经济一体化向政治一体化迈进的过程中得到了机制的有力支撑。在区域协调的一致性方面，成员国基本为发展中国家且在东盟成立之初地区内部面临比南亚更严重意识形态分化的东南亚也存在越南与柬埔寨的冲突、菲律宾与马来西亚的领土纠纷，但东盟依然成功地塑造地区共识，实现了对国际社会的协调发声。欧洲和东南亚的区域化实践证明，不是所有的地区在一开始就具备区域主义发展的良好土壤，现实中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完美的区域主义，但一些地区通过建立合作，不同程度上加强了地区内部的联结与认同，在多数情况下克服了双边问题带来的困境。南亚并非是唯一一个地区内部政治环境为集体合作蒙上阴影的地区，但南亚的区域主义既没有解决冲突，也没有管理冲突，反而始终受限于特定情境下的双边关系，形成了地区合作机制经常性失效的现象。对照现有区域一体化理论，区域主义在南亚受挫的现象是令人诧异的。

对于本文提出的问题，本文试图在总结目前国内外学术界三种解释路径的基础上，证明南亚区域主义不成功的原因是印度、巴基斯坦和南亚小国在区域合作中具有非对称性的报偿结构，非对称性的报偿结构作为中间变量决定了区域合作的发展现状和前景。

二、关于南亚区域主义的三种既有解释路径

一般而言，区域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需要满足某些关系、环境和行为体方面的先决条件。目前，关于南亚区域主义的大量文献，特别是对80年代以来南亚区域合作机制的研究，往往从以下三个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即以印巴矛盾为主要内容的结构要素解释路径、区域内外国家相联动的环境要素解释路径和以地区大国印度为核心的行为体要素解释路径。这三种不同的观点较为全面地涵盖了南亚区域主义实践不成功的原因。

（一）以印巴矛盾为主要内容的结构要素解释路径

以印巴矛盾为主要内容的结构要素是对南亚区域合作困境最为普遍的解释。该解释路径认为，南亚区域合作的最大障碍就是以印巴对抗为主线的南亚地缘政治结构。一方面，在南亚区域主义萌发阶段，印巴两国对区域合作制度化排斥扭曲了地区合作组织的机制设计，即将“有争议的问题”排除在南亚地区合作的议题之外。^①其直接后果是，南亚始终没有建立一个具有合法性的、管控地区冲突的有效机制，而这些机制的设计破坏了南亚的经济合作潜力和政治前景。另一方面，印巴对抗严重干扰南亚地区合作进程，导致区域主义的目标难以实现。^②有研究将南亚唯一一个覆盖所有成员国的区域合作组织南盟比喻为印度和巴基斯坦冲突的“人质”，^③就体现了南亚区域主义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印巴关系。

不过，以印巴矛盾为主要内容的结构要素无法对南亚区域主义困境这一现象做出有效解释。一方面，在南盟之后出现的绝大多数南亚地区组织中，巴基斯坦都不是它们的成员国，如孟不印尼合作倡议（BBIN）、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孟中印缅地区经济合作论坛（BCIM）、南亚次区域经济合作项目（SASEC）、环印度洋区域合作联盟（IORARC）等。显而易见，没有印巴关系这个“最大障碍”，这些区域合作组织运行的速度和效果并没有显著的不同——南亚区域合作进程仍然裹足不前。另一方面，印巴的结构性矛盾不是在双边关系层面上阻碍地区合作的唯一因素。回顾南亚区域合作的历史，因双边关系问题而导致地区合作机制频繁停摆本身就是南亚区域合作的一大特点。印度与斯里兰卡（1988-1991年）和印度与孟加拉国（1992年和2005年）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样对南亚地区合作进程造成了不利影响。^④印巴冲突只是造成南亚区域合作

① Intiaz H. Bokhari, "South Asian Regional Cooperation: Progress, Problems, Potential, and Prospects," *Asian Survey*, Vol.25, No.4, 1985, p.380. V. P. Haran,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South Asia," *Indian Foreign Affairs Journal*, Vol. 13, No.3, 2018, p. 196.

② Kishore C. Dash, *Regionalism in South Asia: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Routledge, 2008), pp.110-141.

③ Tahir Ashraf and Md. Nasrudin Md. Akhir, "SAARC as a Tool of Regionalism in South Asia: Lessons from Asean," *Jati-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21, No. 1, 2016, p.5.

④ Manzoor Ahmad, "SAARC Summits 1985-2016: The Cancellation Phenomenon," *IPRI Journal*, Vol.17, No.1, 2017, p.69.

进程停滞的部分原因。实际上，从该解释路径的话语建构背景看，印巴矛盾原因更可能是印度学者为煽动地区对立、孤立巴基斯坦而构建的话语体系的一部分。一些印度学者把印巴关系对南亚地区合作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推导为巴基斯坦单方面对合作、其实也就是对印度的不配合，认为印度常年向其邻国做出让步，而巴基斯坦“阻碍了经济合作”、“破坏了政治气氛”。^①这一套来自印度学者的话语体系简单朴素地把区域合作不顺利的责任推到巴基斯坦一方，反映了其偏见和政治目的。因此，对南亚区域主义不成功的理解，在学术研究上仅仅止步于南亚地区的结构性矛盾是不够的。

（二）区域内外国家相联动的环境要素解释路径

区域内外国家相联动的环境要素解释路径将有利的国际环境视为区域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环境要素对南亚区域主义的解释主要体现在南亚没有得到域外大国支持和缺少外部威胁两个方面。第一，关于南亚区域主义缺少域外大国支持的研究认为，欧洲之所以成为二战结束以来区域主义最成功的实践，正是因为欧盟得到了美国的支持。^②相反，长期处在冷战的边缘地带、游离于超级大国直接利益之外的南亚，其地区合作进程始终不涉及域外大国的区域政策，区域一体化缺乏来自域外大国的推动。第二，关于南亚区域主义缺少外部威胁的研究，主要比较了东盟和南盟的区域一体化差异，认为存在外部威胁是东盟比南盟更容易放弃内部分歧、一致合作的重要原因。^③这一方面的研究认为，缺失国际环境方面的压力导致南亚不具备内部合作的必要性，更不会形成安全共同体。

将南亚区域主义发展的决定要素归结于客观国际环境始终是片面和狭隘的。在事实层面，几乎没有一个区域合作机制是单独因域外大国而促成的，外部环境解释区域主义问题本身不具备普遍性。同样，应对外部威胁的需要可能也仅适用于冷战期间的欧洲，北美自贸区等合作组织的成立都与外部威胁无关。这种环境解释路径的现实局限在于很难解释除欧盟和

① V. P. Haran,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South Asia," *Indian Foreign Affairs Journal*, Vol. 13, No.3, 2018, p.200. Smruti S. Pattanaik, "SAARC Covid-19 Fund: Calibrating a Regional Response to the Pandemic," *Strategic Analysis*, Vol.44, No.3, 2020, p.248.

② Tahir Ashraf and Md. Nasrudin Md. Akhbar, "SAARC as a Tool of Regionalism in South Asia: Lessons from Asean," p.19.

③ B.Mohanan, "Community Formation in SAARC's External Relations: Lessons from Asean," *The In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51, No.1, 1990, pp.126-135.

东盟以外的区域主义发展水平呈现差异的原因，域外大国的支持和外部威胁可见都不是区域主义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理论层面，这种分析框架忽略了本地区行为体的主观能动性，而且对环境要素的过度强调有堕入宿命论的风险。地区中的大小国家不仅仅是国际环境的受动方，更是具有自主能力的、同样对环境具有塑造能力的行为体。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环境要素是区域主义发展的催化条件，而并不是一种决定论。

（三）以地区大国印度为核心的行为体要素解释路径

上述两条解释路径——关于结构要素和环境要素的研究存在理论层面上解释力不足、事实层面上又不能避免与南亚实际情况不相容的问题。究其原因，这两类研究将结论寄托于南亚的实力结构与外部环境，避开了对南亚各国行为的具体分析。本文认为，对南亚区域主义的主要研究方式应当是行为体要素研究。相比之下，行为体要素解释路径坚持区域主体视角，将南亚国家视为决定区域主义发展的最根本因素，承认地区行为体的主观能动性。目前，有关行为体要素的研究通常把南亚行为体分为三类，在地区大国印度、地区强国巴基斯坦和南亚小国中寻求差异化解释。这种解释框架体现的是以权力为基础的国际合作观：印度作为南亚具有绝对优势实力地位的国家，被认为是南亚区域合作的主动方；巴基斯坦是南亚既区别于印度、也有别于南亚小国的地区强国，在区域主义中被视为是印度的随动方；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五个南亚国家囿于南亚独特的地缘格局，对印关系性质相似，在处理以印巴对抗为主要矛盾的地区事务上具有共同的行为逻辑，在南亚区域主义的分析中可以归为一类行为体。总体来看，既有的行为体要素研究主要聚焦于印度对南亚区域合作进程的核心作用上，其主要结论是南亚区域主义不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印度及其地区霸权主义政策，印度往往以霸权主义的方式介入合作事务，对南亚其他国家构成了外部安全威胁，干扰甚至是破坏了区域合作进程。^①这些既有研究对于理解本文所提出的研究问题有重要的意义，但

^① 相关研究参见 Rajshree Jetly, "Conflict Management Strategies in Asean: Perspectives for SAARC," *The Pacific Review*, Vol.16, No.1, 2003, pp.53-76. Patryk Kugiel, "India's Soft Power in South Asia,"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9, No.3-4, 2014, p.352. Arndt Michael, "Cooperation Is What India Makes of It: a Normative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South Asia and the Indian Ocean," *Asian Security*, Vol.14, No.2, 2017, pp.1-17. 吴琳：《地区霸权的制度护持与印度的南盟政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2期，第60页。

它们通常把巴基斯坦和南亚小国作为客体，把地区大国印度摆在南亚区域主义的对立面，因此目前行为体解释路径随之也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存在观察主体视角偏差问题，二是缺失对建构过程的描述。

观察主体视角偏差的问题主要体现在过度重视地区大国印度在南亚区域主义中的核心作用，在现实情况中忽视了巴基斯坦和南亚小国对南亚区域合作进程的影响。南亚地区合作研究只需要考虑印度一个国家，往往是行为体要素研究的习惯性认识，因为印度作为地区内最主要的国家，对地区内一切事务的绝对影响力都是毋庸置疑的。这样的研究默认这样一个前提，即“如果印度改变其区域策略，那么南亚地区合作将会发展得更好”。其逻辑缺陷在于，虽然印度的确要对南亚区域主义所面临的困境负很大责任，但“有能力施加影响”和“实际上施加了何种程度的影响”存在着区别，换言之，地区内最大行为体并不能被夸大为地区合作不顺利的唯一责任方。尤其在解释南亚区域主义进程经常被双边问题所打断和破坏的问题时，就更不能只考虑印度，而应当关注和重视非体系性行为体在地区合作中独特且关键的作用。目前少量研究从南亚小国的视角分析这一问题，但也仅限于对最先倡议建立南盟的孟加拉国一国拿出来单独分析，^①这种方法同样将南亚某一个国家视为特异的为行为体，对于理解南亚的区域合作问题是孤立且不充分的。在理论缺陷上，过于聚焦于印度这个单一行为体，不可避免地是要强调印度对区域主义的特殊性，这类存在偏差的行为体要素分析无助于归纳出区域主义在理论上的普遍意义，也不能形成区域间的比较和对话。

无法描述建构过程是以印度为核心的行为体要素研究更为明显的缺陷。第一，从整体主义的角度看，行为体要素寻求对每个行为体的各自解释，因而无法回溯南亚区域化的过程，无法精确反映南亚区域合作裹足不前的建构原因。以印度为核心的行为体研究忽视了南亚区域主义本身就是首先由小国倡导，同时巴基斯坦的配合也十分重要的事实，从而无法解除印度以外的南亚国家在区域合作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以及它们如何影响

^① 中外学术界关于小国在南亚区域合作中作用的讨论具体参见 Syedur Rahman, "Issues and Agenda for South Asia Regional Cooperation: A Bangladeshi Perspective," *Asian Survey*, Vol.25, No.4, 1985, pp.405-425. 张立邦:《孟加拉国的区域合作:背景、进程与特点》,载《南亚东南亚研究》2019年第5期,第58-73页。

区域主义的发展。第二，从个体主义的角度看，每个国家在不同时期内的行为逻辑同样不能得到充分解释。以印度为核心的行为体要素研究只能单调地解释印度某一时期内的行为，对印度在90年代后出台“古杰拉尔主义”、“邻国优先”等政策的原因讨论，与这些政策对南亚区域合作所产生效果的原因讨论不相符合，由此无法形成对印度区域政策的连贯解释。因此，以印度为核心的行为体要素分析既不能展现南亚区域合作的互动历史，也无助于解释印度区域主义政策的内生原因，这两方面的缺陷使这类行为体要素分析受到了质疑。

综上所述，坚持行为体要素解释路径，并不能一味地突出印度行为模式的特殊性而模糊其他行为体的作用。对于印度、巴基斯坦和南亚小国，本文认为三类行为体的互动模式可以纳入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即三类国家在南亚区域合作中存在报偿结构的非对称性，它们差异化的策略选择最终导致南亚区域主义不得不走向弱势和失落。

三、非对称性报偿结构视角对区域合作问题的理论阐释

报偿 (Payoff)，作为博弈的基本要素之一，一般将其定义为“（参与者）在不同结果中获得的收益”。^①报偿通常用基数表示参与者对收益的偏好，报偿数额越大，意味着对参与者来说该策略的结果更优先。目前，一些研究讨论了报偿如何影响合作的前景，并且提出在重复博弈的情况下，在给定类型的博弈中，报偿间的数量差是合作的重要决定因素。^②进而，对报偿结构 (Payoff Structure) 的定义，建立在博弈参与者的不同策略所获报偿的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博弈论中的报偿结构概念广泛应用于解释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合作问题，尽管这些应用并不是总是以“报偿结构”为核心概念的形式出现。当前，将“报偿结构”作为核心概念的研究包括但不限于，通过揭示中美两国的报偿结构，解释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80

^① Joel Watson, *Strategy: An Introduction to Game Theory* (WW Norton, 2013), P.13. 报偿 (Pay-off), 亦可翻译为“支付”，结合该词原意，“报偿”更接近本文的讨论内容，即参与者在博弈中选择某种策略而得到的回报和偿付，而不是指付出或支出。

^② 具体研究参见肯尼斯·奥耶主编，田野、辛平译：《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5-11页。

年代末中美关系的演变；^①报偿结构预期作为核心作用机制之一，分析金砖国家合作的起源；^②通过辨别地区制度投资的报偿结构，分析合作中的机会主义问题，以及地区制度的嵌套。^③上述研究潜在地认为，识别报偿结构是关键步骤，只有确定报偿结构，才能定义博弈（或者某一种行为）的类型。结合“报偿”在博弈论中的本源含义和当前国际关系领域对合作问题既有的研究，本文认为，不同的策略组合分别对应参与者获得的相应报偿，而这些报偿之间的相互关系，称为报偿结构。具体而言，不同策略组合报偿的相互关系，可以依靠报偿之间的差值进行定义。不同策略之间所获报偿的差值大小，决定了行为体是否可能在多轮次博弈中变换既有的可供选择的策略。

报偿结构所具有的不对称特征常现于博弈参与者的相互关系和互动模式。报偿结构的不对称是指博弈参与者因相互关系不对等而导致双方选择同一种策略但所获收益却不相同的一种情形。经典博弈论往往基于参与者之间具有对称性的相互关系这一假设，每个参与者的偏好是相同的，他们以一定的频率选择合作或背叛。然而，在不对称博弈中，报偿结构的特点是，即使每个参与者选择和他人一样的策略，他们从合作中获得的收益也不会与其他参与者相同。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了非对称相互关系会显著地影响个体之间的合作行为。^④关于不对称关系如何影响合作，一种较为悲观的结论认为，博弈中的不对称可能危害互利合作的行为，处于更好战略位置的参与者很容易对其他寻求合作的参与者实施敲诈

① Catherine C. Langlois and Jean-Pierre P. Langlois, "Rational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Game-Theoretic and Empirical Study of the U.S.-China Case," *World Politics*, Vol.48, No.3, 2011, pp.358-390.

② 任琳、尹继武：《金砖国家合作的起源：一种理论解释》，载《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5期，第102-128页。

③ 刘玮：《兼容性制度竞争：双层对冲与地区制度的嵌套设计》，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2期，第65-86页。

④ John P. Sheposh and Philip S. Gallo, "Asymmetry of Payoff Structure and Cooperative Behavior in the Prisoner's Dilemma Gam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17, No.2, 1973, pp.321-333. Martin Beckenkamp et al., "Cooperation in Symmetric and Asymmetric Prisoner's Dilemma Games," *MPI Collective Goods Preprint*, 2007, pp.1-37. Vincent P. Crawford et al., "The Power of Focal Points Is Limited: Even Minute Payoff Asymmetry May Yield Large Coordination Failur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8, No.4, 2008, pp. 1443-1458.

策略。^①但更多的研究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在多种博弈模型中（胆小鬼博弈、猎鹿博弈、保证型博弈、僵局博弈和囚徒困境）中，参与者的不对称将大大增加合作存续的机会。^②虽然出现了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但已有的学术共识是，不对称的相互关系蕴含着报偿结构的不对称性是显而易见的。^③“合作双方实力的不对称，使得合作收益的分配也必然具有不对称的特征”。^④因此，在相互关系不对称的条件下，需要进一步考虑每一方博弈参与者本身的报偿结构特征。

本文提出的“非对称性报偿结构”概念围绕行为体非对称性报偿结构对区域合作的影响展开（图1）。行为体的策略选择不仅仅遵循权力规则，每个行为体在合作中两种策略之间的报偿差从长期看同样会干扰博弈的结果。首先，同一区域内的国家间权力关系决定了它们在博弈中的策略空间，以及策略之间的收益差，即报偿结构。由于各行为体的身份和实力地位不同，不同国家即使选择同一种策略，所获的报偿也并不相同，它们在区域合作中的报偿结构呈现不对称特征。第二，不对称的报偿结构决定各类国家在区域合作进程中是否会改变原有的策略选择。当各国合作与背叛策略的报偿差不相同时，必然会出现一些国家有更大动机去改变策略而另一部分国家坚守原策略的情况。不对称的报偿结构显示了各国选择合作或背叛策略之间的报偿差异，而在报偿方面的差异是它们在区域合作进程中从倾向不合作到合作，或者从倾向合作到不合作的基本动力。简而言之，能够体现权力关系的合作逻辑决定了国家采取何种初始策略，而报偿结构特征进而决定策略在合作进程中的相关变化。

借鉴博弈论中的报偿结构概念并将其不对称性纳入考虑范畴，是因为

① Christian Hilbe et al., "Asymmetric Power Boosts Extortion in an Economic Experiment," *PLoS One*, Vol.11, No.10, 2016, pp.1-14.

② Stephen J. Majeski, "Asymmetric Power among Agents and the Gen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Cooper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04, Vol.48, No.2, pp.455-470.

③ 在合作系统中，个体之间的非对称性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报偿的非对称性、演化路径的非对称性和信息的非对称性。具体研究参见贺军州：《非对称合作系统的模型研究》，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0页。

④ 孙杰：《不对称合作：理解国际体系的一个视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9期，第13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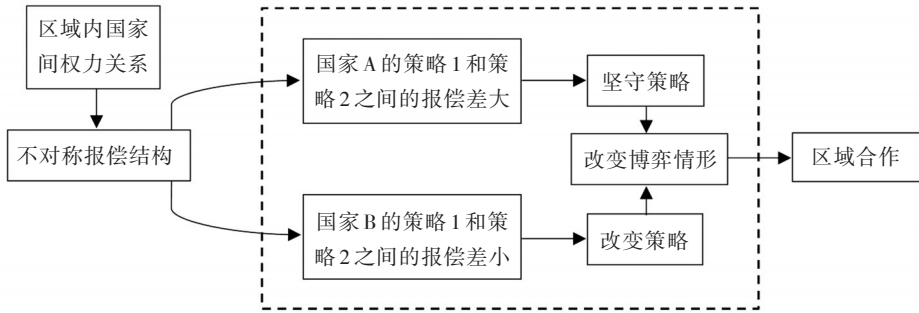


图 1：非对称报偿结构对区域合作进程的影响机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区域主义首先是一种进程。区域化的过程性赋予了参与者在区域互动中策略变化的可能，反言之，正是由于参与者可能出现的策略变化，区域化才得以实现。大多数区域主义实践呈现出正向的发展曲线，成员国规模的扩大、合作内容的深入都体现了参与区域主义的国家由不合作转化为合作的过程，但是现有的区域化理论却不能完整解释停滞的甚至是逆向的区域化进程，报偿结构概念提供了观察这类现象的新角度。区域中不同行为体的报偿结构一方面体现了理想情况下由权力地位决定的博弈模型，更重要的是，对报偿结构不对称性的分析能够解释选择合作或背叛的策略是否延续或变更的原因，揭示参与者的不同策略是否具有稳定性，以及这些策略的转变是如何被触发的。

四、南亚国家在区域合作中的非对称性报偿结构

本章具体分析印度、南亚小国和巴基斯坦在区域合作中的报偿结构。南亚各国具有差异化的博弈参与者偏好，它们在区域合作中的报偿结构不同，在博弈中呈现出了报偿结构非对称性的鲜明特点。通过分析南亚地区大国、地区强国和地区小国三类国家的报偿结构，可以看出，出于不对称的相互关系，南亚国家都秉持着安全主导型的合作逻辑，它们参与区域合作不仅仅只考虑区域主义本身。无论强势方或弱势方，南亚国家在区域合作中的报偿结构中包含对安全的计算，甚至对安全的关注在区域合作中构

成的占比极高，因此各国相似的考虑不会使南亚形成有利于区域主义的一致行动。南亚国家在区域合作中策略的报偿差将决定它们初始的最优策略能否被轻易地改变。

（一）地区大国印度在区域合作中的报偿结构

对于南亚区域主义，印度的政策并不是以增进合作为主色调的，其态度整体倾向于不重视、不负责。长期以来，印度区域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维持区域霸权和稳定，并拒绝域外国家在南亚拥有军事存在。^①在区域问题上，印度往往延续处理双边问题时的霸权主义思维：无论区域主义发展的形势如何，当南亚其他国家与地区外大国交好并试图减弱印度的影响时，印度都会以霸权主义的方式背离区域合作，具体表现为印度不断试图扭转南亚国家脱离印度的趋势并重新加强对它们的控制，而这种行为建立在轻易地以牺牲区域主义为代价的基础上。因此，在南亚区域主义的进程中，印度策略选项为支持区域主义（放弃霸权主义政策）和背离区域主义（采取霸权主义政策）。印度报偿结构的主要特点是，支持或背离区域主义政策之间所获报偿的差值较大。

印度在区域合作中两个策略选项的报偿差较大，主要源于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即使选择支持区域主义，印度也不能增进其利益。从南亚区域合作的经贸收益上看，有关南亚经济一体化的研究清楚地表明，南亚各国实际上不是天然的贸易伙伴，南亚各国不仅不能实现贸易互补，反而是彼此的贸易竞争对手，其中印度和其他南亚国家之间的贸易互补性最弱。^②正如这类研究所指出的，其他南亚自由贸易区成员国很难满足印度的（经济）需求。^③究其原因，印度发展阶段并不显著超前于其他南亚国家，其赖以生存的国际经济环境不包括南亚。印度的经济成长主要是国内市场的驱动和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联系，印度对周边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兴味索然的真实原因，恰恰就在于印度实际上并不需要南亚共同

① Arijit Mazumdar, "India's South Asia Poli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Approach, Old Strategy," *Contemporary Politics*, Vol.18, No.3, 2012, p.286.

② Hafiz Wasim Akram, "Trade within South Asia: Unrealistic Expectations," *South Asia Research*, Vol. 40, No.3, 2020, pp.1-16.

③ Dilip K. Das, "The South Asian Free Trade Agreement: Evolution and Challenges," *MIT International Review*, Spring Issue, 2008, pp.22-29.

市场。^①从南亚区域合作为印度带来的政治资产上看，区域一体化能够对印度的全球战略所作出的贡献始终较为有限。印度并不关心南盟是否有效，不仅仅是因为南盟不能为印度提供有效的出口市场，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无法为印度的战略做出贡献。^②考虑到南亚次大陆历史上的长期分裂和越来越盛行的本位主义，印度更加不会把南亚区域主义放在其国家战略的优先位置。因此，无论是经济利益还是政治资产，印度选择支持区域主义所获得的收益都不显著。

第二，即使背叛区域主义，印度也不会受到损失，但是背叛却有利于印度获得额外的报偿。当前，印度的区域政策越来越采取一种无收益亦无损失的思路，与其说印度需要区域合作，不如说它更需要南亚邻国在区域合作中承认它们对其南亚霸权地位的支持。在南亚区域主义发展的进程中，南亚其他国家并不承认印度的地区霸权地位，却也没有能力对印度背离区域合作的行为施加惩罚；南亚区域主义无法支持印度的大国理想，但南亚区域主义也很难让印度的大国理想受阻，因此印度倾向于采取霸权主义行为，无所顾忌地谋求建立对南亚其他国家的控制。有研究进而指出，区域大国缺少提供地区公共产品、扩大区域影响力的内在利益，是由于它们很大程度上关注国内和（或）全球政治，而非他们的区域性角色。^③区域外关系中的特权，无论是显性的或潜在的，是区域大国背离区域一体化、不提供区域领导力的诱因。^④在投机心态的作用下，印度更加考虑向世界性大国靠拢，对待南亚区域主义的动机带有区域以外的功利性目标。印度将注意力从周边转向世界和亚洲政治，能够将潜在成本最小化，并集

① 叶海林：《印度南亚政策及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的影响》，载《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6年第2期，第11页。

② Partha S. Ghosh, "An Enigma That Is South Asia: India Versus the Region," *Asia-Pacific Review*, Vol.20, No.1, 2013, pp.100-120.

③ Miriam Prys, "India and South Asia in the World: On the Embeddedness of Reg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Regional Power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13, No.2, 2013, p.272.

④ Sebastian Krapohl *et al.*, "Regional Powers as Leaders or Rambos? The Ambivalent Behaviour of Brazil and South Africa i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52, No.4, 2014, pp. 879-895.

中精力实现其更广泛的地缘战略。^①因此，长期存在的区域外报偿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印度放弃区域主义的损失，印度得以越来越自信地抛弃区域协调并追求全球体系中的更大权力。

由此，印度在南亚区域合作中的策略是，不断利用可能达成的区域合作追求外部性，以合作为杠杆，撬动南亚其他国家的行为，使其依附于印度的安全利益。印度报偿结构特点是合作策略与背叛策略之间的报偿差较大，这导致印度选择地区霸权主义而不是支持区域主义的策略相对固定，鲜有必要依据南亚其他国家的选择而调整其策略。

（二）南亚小国在区域合作中的报偿结构

作为应对 21 世纪发展与安全挑战的重要工具，区域主义更可能是在国际体系中不占重要位置的小国实现繁荣而不得不选择的重要方向。比起印度对区域合作的消极态度，南亚较小国家对区域合作的意愿比印度和巴基斯坦强烈。南亚小国在区域合作进程中的两个策略分别为支持区域主义和背离区域主义，其报偿结构的特点是两个策略报偿之间的数量差较小，原因如下。

第一，南亚小国有机会从区域主义中获益，但目前其获益的程度比较有限。关于南亚小国在区域一体化中的收益，目前存在一定争议。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认为，南亚地区较小的国家可以从区域经济一体化中获得显著的好处，原因是参考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后的经验，认为加入区域一体化的较小国家对贸易的依赖性更大，南亚小国的消费者能够获得更廉价的商品，而出口商则可以进入更大的市场，同时获得更有竞争力的投资。^②从贸易数据来看，近年来印度和其他南盟成员国之间贸易量确实显示出令人乐观的增长趋势。不过，尽管总贸易额在增长，但南亚小国对印度始终处于严重的逆差状态。通过对印度与南盟国家的进出口强度指数、印度和南盟国家的显性比较优势和显性进口依赖的研究也发现，区域内贸易大幅度增加的原因是印度对其他南亚国家的出口大幅度增加了。^③这意

① Rajesh M. Basrur, "Global Quest and Regional Reversal: Rising India and South Asia,"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7, No.2-4, 2012, p.274.

② "Opening up Markets to Neighbors: Gains for Smaller Countries in South Asia", World Bank Group, 2015, pp.1-4, <https://www.worldbank.org/southasia>.

③ Radha Raghurampatruni *et al.*, "The Future Potential and Prospects of SAARC Regional Grouping: A Study," *India Quarterly*, Vol.77, No.4, 2021, pp.1-26.

味着南亚其他国家至少在区域内贸易中无法比印度获得更多的收益，甚至可能因其脆弱性而从区域内贸易中受损。对于南亚小国来说，区域主义中的关键大国印度对区域经济增长没有发挥引领作用，而是形成了“虹吸效应”，印度更可能作为南亚小国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对手。例如，2022年初，斯里兰卡发生严重的外汇危机后，服装和茶叶类的国际订单不断转移到了印度，印度服装生产商和茶叶种植商趁机获益。^①印度和南亚小国进出口产品的相似性使区域内贸易缺乏足够动力，支持区域主义的策略并不能使南亚小国从当前的区域一体化中获得与南亚以外的其他地区小国类似的诸多好处。

第二，更为关键的是，鉴于印度倾向于采取霸权主义策略，南亚小国还受到来自印度对其主权安全的威胁，这使得南亚小国怀有动因抛弃原有的合作策略。南亚小国参与区域主义的选项存在隐含条件，即在主权不受侵犯的情况下，合作才有可能得到维持。南亚小国选择放弃区域主义的策略延伸出两重政策意义，一方面可以拒绝印度的霸权主义行为对它们主权的侵蚀；另一方面，选择区域外大国作为更有利的经济与政治伙伴，依照国家利益选择制衡、追随或对冲，以抵消印度的绝对优势。在南亚小国倾向于避免与印度产生自主权纠纷而放弃区域主义的情况下，它们可以转而寻求与中亚、西亚和东亚建立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与中国加强联系方面，南亚小国还可以获得经济利益以外的报偿。相关研究认为，中印在地区内形成的竞争，给了它们共同邻国的小国家在地区舞台上作为外交政策角色运作的新机会，这些国家有能力在近期历史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独立地采取行动，不受印度偏好的影响。^②

出于以上两个原因，南亚小国在区域主义中的报偿结构特点是选择参与区域主义和放弃区域主义策略之间的报偿差很小，由此导致的可能结果是它们很容易改变原有的合作策略。南亚小国的策略选择并不严格依赖印度的区域策略，它们更加出于维护国家自主权的需要而决定是否继续支持或背叛区域合作。在主权安全的条件下，南亚小国愿意支持区域主义；但如果发展区域主义必须以主权可能遭受侵蚀为代价，南亚小国宁愿放弃区

① “Sri Lanka Loses Apparel and Tea Orders to India”, *Dailymirror*, April 9, 2022.

② Carla P. Freeman, "China's 'Regionalism Foreign Policy' and China-India Relations in South Asia," *Contemporary Politics*, Vol.24, No. 1, 2017, pp.81-97.

域合作以维持自主性，其策略由合作转变为倾向于放弃区域主义。

（三）地区强国巴基斯坦在区域合作中的报偿结构

长期以来，巴基斯坦的生存并不依托于南亚，安全上背靠中国、经济上与西方国家及西亚地区来往更密切的巴基斯坦更加不认为区域主义具有多少吸引力。虽然巴基斯坦对参与南亚区域主义的兴趣不大，但巴基斯坦对区域主义的态度往往是其与印度关系的间接反映，在不同时期与印度关系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巴基斯坦对区域主义的态度。在对区域主义的策略选择方面，巴基斯坦没有同印度相似的地区霸权目标，因此巴基斯坦的策略空间同南亚小国一致，分为参与区域主义和放弃区域主义。巴基斯坦报偿结构的主要特点是，放弃区域主义的报偿远大于参与区域主义的报偿，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巴基斯坦参与区域主义并不比放弃区域主义的报偿更多。对于巴基斯坦而言，南亚区域主义远不如其对印度的战略焦虑重要。何况巴基斯坦的学者认为，南亚自由贸易区和最惠国待遇这两个变量对巴基斯坦双边贸易都产生不了太大的影响，巴基斯坦并不能充分从区域一体化中获益。^①所以，南亚区域主义的发展或停滞不会触及巴基斯坦的主要关切。同时，作为一个极度不安全的国家，巴基斯坦不得不保持更高的战备状态，并通过增加军备竞赛和不对称战争来抵消印度的战略进攻态势。^②在相当长的时期，巴基斯坦认为地缘经济是实现地缘战略的一部分，地缘经济应当服务于地缘战略。显然，相对于自身的安全考虑，巴基斯坦认为南亚的区域主义微不足道。

第二，巴基斯坦放弃区域主义的策略选择同样具有额外的报偿，这种额外的报偿来自于与印度对抗的可能得益。首先，作为不同于南亚小国的区域强国，无论印度选择何种策略，巴基斯坦至少在区域合作中不会面临向印度让步而失去自主权的风险。巴基斯坦抵制印度霸权主义行为的能力强于南亚小国，因此印度选择霸权主义的策略不会导致如南亚小国主权可能被侵蚀的后果。其次，巴基斯坦参与或放弃区域主义的行为可以直接作

① Nasir Iqbal and Nawaz Saima, "Pakistan's Bilateral Trade under Mfn and Safta: Do Institutional and Non-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Matter?" *The Pakistan Development Review*, Vol.56, No.1, 2017, p.71.

② S. Paul Kapur, "Ten Years of Instability in a Nuclear South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3, No.2, 2008, p.90.

为对印关系的政策工具。巴基斯坦拒绝参与区域合作的选项可以作为一种政治符号，表达其反对印度霸权的姿态。最后，更重要的是，印度背离区域主义的行为本身可以作为巴基斯坦攻讦印度的武器。通过指责印度在区域合作中的霸权主义行为，巴基斯坦可以削弱印度对南亚主导权的合法性，拉拢南亚小国共同反对印度的霸权。基于以上三个原因，在大多数时期，巴基斯坦甚至认为，我方背叛、对方合作并不是最优情形，而印度选择背离区域主义、令南亚地区分崩离析的霸权行为对其才最有利。

作为相对印度更弱势的国家，巴基斯坦对自身安全利益的担心远超对区域主义的依赖，因此巴基斯坦弱化区域主义的策略很难动摇。基于这类报偿结构特点，当印度借区域合作议题指责或要挟巴基斯坦时，很难想象巴基斯坦会顺从地接受被事先框定好的区域安排以讨好印度，相反巴基斯坦会更坚定地选择放弃区域主义的策略，减少与南亚的区域联系，并日益寻求区域以外的发展机会。

综上所述，对南亚国家在区域合作中报偿结构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出三项结论。第一，南亚国家在区域合作中的博弈关系呈现出不对称的特征。首先，印度对区域合作的态度符合僵局博弈参与者的偏好，即无论对方怎么做，背叛总会出现较好的结果。其他国家为坚持合作而牺牲主权的情况对印度来说最有利，即使对方同样选择不合作，印度也并不会受到背叛区域合作的惩罚（即为DC）。其次，南亚小国与胆小鬼博弈中参与者的偏好一致，它们更希望在自身维护主权独立的情况下达成合作（即为CC），但当主权受到威胁时，它们情愿放弃区域合作的选项（即为DC）。最后，巴基斯坦产生了不同于印度的、作为相对弱势的僵局博弈参与者偏好，认为直接背离区域主义的策略更占优，并且希望借印度对区域主义背叛而削弱其地区合法性（即为DD）。

第二，在报偿结构方面，南亚国家都很难从区域一体化中获益，但一些国家可以获得来自区域主义以外的报偿，因此它们的报偿结构也呈现出了不对称的特点。一方面，巴基斯坦和印度两个策略之间的报偿差相对于南亚小国较大，这是源于印巴虽然很难从区域主义中获益，但它们本身可以借助合作议题获得其他方面的收益，如印度可以利用区域合作实行对他国的胁迫、巴基斯坦可以借地区合作反对印度的区域霸权，而南亚小国则缺少这种获得其他报偿的能力。另一方面，巴基斯坦选择参与或放弃区域

主义策略之间的报偿差又大于印度。这是由于巴基斯坦可以实施的策略选项过于单一且不存在获取区域霸权的诱惑，因此放弃区域主义的报偿具有更高的权重。如果将每个行为体两种策略之间的报偿差记为一个正常值 P ，印度、南亚小国和巴基斯坦的报偿差分别记为 $P_{印}$ 、 $P_{小国}$ 和 $P_{巴}$ ，三类南亚国家在区域合作中的偏好排序、博弈类型与报偿结构可以简要表示如下：

印度： $DC > DD > CC > CD$ （僵局博弈偏好）， $0 < P < P_{印}$ ；

南亚小国： $DC > CC > CD > DD$ （胆小鬼博弈偏好）， $0 < P_{小国} < P$ ；

巴基斯坦： $DD > DC > CC > CD$ （相对弱勢的僵局博弈偏好）， $0 < P < P_{巴}$ ；

$P_{小国} < P_{印} < P_{巴}$ 。

第三，南亚国家在区域主义议题上针锋相对的策略，取决于它们共同的、对安全的需求，以及各国的实力地位差异。可以看出，强势方不舍得让渡公共权力，因为其报偿结构决定了它从区域主义中拿不到回报；弱势方同样不会让渡权力，因为无法相信强势方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同时，南亚国家在区域合作上共同采取了安全主导型的合作逻辑。这一逻辑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各国追求的首要目标不是经济回报；二是追求的报偿在区域合作框架以外；三是报偿预期具有强烈的安全色彩。在这种共同的思维方式下，印度在区域合作中希望牢牢握住地区领导权并发挥支配作用，而南亚小国和巴基斯坦则更担心其国家安全，其中最重要的是自主权。南亚国家共有的安全主导型合作思维和身份差异决定着它们的策略以及报偿结构分别是如何形成的。第五章将试图证明，由于南亚国家不对称的报偿结构，南亚的区域主义在印-南亚小国和印-巴的双边互动中不能得到正向的发展，区域主义被迫成为双边关系的附属品。

五、南亚国家非对称报偿结构对区域合作的影响

如上所述，南亚地区三类国家具有非对称的报偿结构，而南亚区域主义的发展前景取决于不同策略交叉过程中报偿结构对各国策略选择的影响。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中，每一个国家所能实现的成果集合取决于其他国家的决定。^① 对于南亚小国和巴基斯坦而言，印度的策略决定了它们

^① 斯科特·巴雷特，黄智虎译：《合作的动力：为何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3页。

下轮博弈中选择何种策略。因此，南亚三类行为体的互动以印度为中心分为两个博弈组，一组为印度与南亚小国的互动，另一组为印度与巴基斯坦的互动。这两组博弈的共同特征为不对称博弈，即博弈的收益依赖博弈的参与者，而不是参与者所选择的策略。印度、南亚小国和巴基斯坦在区域合作中的博弈过程提供了与博弈均衡状态相对应的现实解释——南亚国家的策略交叉导致了更恶劣的结果。

（一）重复的失败：印度与南亚小国形成的“恶棍博弈”

在南亚区域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印度具有僵局博弈参与者的策略偏好，而南亚小国具有胆小鬼博弈参与者的策略偏好。这两种行为体的策略交叉形成了博弈中的混合类型，即“恶棍博弈”。^①印度从实现地区霸权的角度看待南亚的区域主义，它选择和“恶棍”一样的策略，宁愿暂停区域合作机制，也不愿看到南亚小国脱离其控制。对于印度来说，南亚的区域主义并不是目的，而是印度达成区域目标的手段。因此，印度会采取霸权主义行为，以地区经济议题为杠杆，试图撬动小国改变内政，实现对它们的控制。在南亚区域主义发展的前期，南亚小国对此无能为力。区域主义是南亚小国为数不多的、能使其解决生存问题的重要途径，因此它们尽管不愿接受印度的霸权行为，但当生存的权利受到威胁，它们为了区域主义发展而不得不自愿牺牲一定的自主权。僵局和胆小鬼两种策略的交叉导致的结果是，南亚小国为维持地区合作被迫不断支付沉重的成本，即为了实现区域合作就必须容忍印度的霸权主义行为，而印度往往能够因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志得意满。

表 1: 印度与南亚小国的不对称博弈

局中者/局中者	印度		
	策略策略	放弃霸权主义	采取霸权主义
南亚小国	参与区域主义	(2, 1)	(1, 3)
	放弃区域主义	(3, 0)	(0, 2)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① 恶棍博弈的著名例子是，母亲和骗子都宣称他们是孩子的母亲，但当裁决者提出要把孩子劈成两半时，真正的母亲有胆小鬼游戏者那样的选择，放弃她对孩子的权力以挽救其生命。而骗子则有僵局游戏者那样的选择，宁愿孩子被杀死也不愿意看到孩子重新回到母亲的怀抱。具体参见威廉姆·庞德斯通，吴鹤龄译：《囚徒的困境：冯·诺依曼、博弈论和原子弹之谜》，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7-258页。

然而，时间并不总是永远站在“恶棍”的一边。僵局和胆小鬼两种策略的交叉具有不可重复性，因为南亚小国无法持续地让渡主权。在区域化进程中，南亚小国维持区域主义的成本（向印度支付自主权）越来越高，但是它们从区域主义中获得的收益却并不多。正如本文第四部分所讨论的，南亚小国在区域主义中的报偿结构特点是，两个策略（参与或放弃区域主义）之间的报偿差最小，因此它们逐渐认为自己可以承受僵局。最终，南亚小国原本的胆小鬼偏好逐渐演化为更加倾向于不合作的僵局形式。

在南亚区域主义的进程中，印度认为不必在区域合作领域施恩于地区内其他国家。它以合作为条件，要求南亚国家按其要求行事的行为屡见不鲜。印度经常性地向南亚小国提出要求，作为它参加南盟首脑会议的先决条件。印度试图利用地区合作机制作为一种杠杆，来修正包括南亚国家的行为和政策。^①在担忧国家被印度不断侵蚀主权、而参与区域合作的收益又不足以抵消这种担忧的情况下，南亚小国很容易因同印度的双边关系出现问题而受到印度的胁迫，转也倾向于放弃区域主义。在南亚区域主义发展的后期，南亚小国越来越拒绝印度的霸权行为。2005年2月，在第十三届南盟峰会召开前夕，印度曾以“不满孟加拉国和尼泊尔的安全局势和政治条件”为借口要求两国在国内政策上作出改变，否则印度将拒绝参加会议。对此，孟加拉国和尼泊尔并不买账，最终第十三届南盟峰会没有如期举办，而印度对峰会的流产也毫不在意。在孟不印尼倡议（BBIN）议程中，印度寻求建立一条从印度大陆经孟加拉国到东北地区的过境线，但孟加拉国同样因担心这会对其主权和政治独立产生不利影响而采取了谨慎的态度。

（二）争端的溢出：印度与巴基斯坦不对称情形下的“僵局博弈”

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南亚区域主义进程中都具有僵局博弈参与者的策略偏好。不过，巴基斯坦由于在国家各方面都相对弱势，因此巴应对印度霸权主义的僵局策略相对更严格。印巴的策略交叉形成的混合博弈类型是不对称情形下的“僵局博弈”，这一类型赋予南亚区域合作中的印巴关系两层含义。

① Manzoor Ahmad, "Sarc Summits 1985-2016: The Cancellation Phenomenon," p.61.

从两国关系的层面看，即使在多边合作领域，僵局也是印巴两国不可避免的结果。与囚徒困境不同，僵局博弈的两方参与者都不想真诚合作，它们认为相互背叛比相互合作更有利。在促进南亚区域一体化方面，印巴的共同利益十分稀薄，参与区域主义所获得的报偿并不足以令印巴任何一国产生放弃双边冲突、致力于区域和平的动机。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巴两国的合作是偶发的、短暂的，而这种多边框架下的合作更像是在当时情境下基于双边逻辑的一种为难的相互配合。印巴两国都基本上把合作行动看成是短期的事情，合作作为一种短期的现象也就不会产生长期的渐进影响。^①考虑到印巴两国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的军事对峙和核军备竞赛，在南亚区域主义问题上印巴的相互背叛是更为可取的策略。因此，区域议题被严格限制在印巴双边冲突的框架内，多边合作不可能缓解印巴双边冲突。

从区域主义的层面看，印巴僵局的后果之一就是双边问题“区域化”。在区域合作中，印度对南亚小国和巴基斯坦实施了相同的霸权主义策略，但是收到的效果却不相同。由于南亚小国的偏好具有胆小鬼博弈参与者特征，在区域主义的前期阶段，印度对南亚小国的胁迫行为可以获得一定成功，但是巴基斯坦拥有更多资本以抗衡印度，这使印度以地区合作要挟巴方改变内政这一策略的报偿大打折扣。进而，印度转而试图联合南亚小国孤立巴基斯坦，而南亚小国也不得不尽力配合印度，以达成推迟而不是取消合作议程的共识。印巴双边问题最终成为区域主义绕不开的症结，两个典型的例证是南盟国家第11次首脑峰会（1999-2001年）和第19次首脑峰会（2015年-至今），两次峰会的延期都体现了南亚小国被迫卷入印巴冲突，最终导致合作机制停摆的无奈现实。

表2: 印度与巴基斯坦的不对称博弈

局中者/局中者	印度	
	策略策略	采取霸权主义
巴基斯坦	参与区域主义	(1, 1)
	放弃区域主义	(3, 0)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① 宋德星：《印巴安全两难与中国的南亚政策》，载《南亚研究》2002年第1期，第15页。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印巴无法突破僵局以及南盟合作下的印度霸权主义愈加受到南亚小国的抵触，南亚先后出现了一批次区域和跨区域合作机制。次区域合作机制包括南盟框架下的“南亚增长四角”（SAGQ）和孟不印尼合作倡议（BBIN），跨区域合作机制包括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环孟加拉湾经济技术合作组织（BIMSTEC）。然而，次区域合作机制并不能作为南盟的补充，这类合作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和南盟一样的困境；而跨区域合作机制则稀释了以南盟为中心的区域主义，替代性的话语权在不断增强。^①目前，现有的合作机制延续了印度和南亚小国僵局和胆小鬼偏好的策略交叉，南亚小国因为参与和放弃区域主义的报偿差过小而日益走向僵局的状况并未改变。而巴基斯坦日益被排斥在区域合作之外，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报偿结构导致双方在区域主义互动中僵局状态日益稳固，印巴僵局更加缺乏解决渠道。

综上所述，印度、南亚小国和巴基斯坦不会从重复的博弈中获益，区域主义反而是双边关系另一种形式的消耗。南亚区域主义很容易被双边问题破坏，原因就在于南亚各方很少能够通过区域合作实现共有利益，类似猎鹿等合作型的博弈模型无法在南亚得到体现。对于南亚小国和巴基斯坦来说，参与区域主义的收益很微薄，但为了维持合作而付出的成本却过于昂贵了。虽然一般都会认为，“经济议题通常比军事议题展现出了具有更少冲突性的报偿结构”。^②但是南亚的情况不是总以经济-政治二分法来区分合作的可能性。南亚的区域合作的确规避了许多政治领域的敏感问题，但即使是低层次、低敏感度的经济社会合作也无法避免沦为国家间政治对抗的手段和工具。凡涉及到印度的区域霸权、南亚小国和巴基斯坦的自主权问题，僵局思维必然占据主导性的影响。

六、结论

历史上，南亚次大陆并非是一个毫无地区连接、没有区域主义基础的地区。至少在比殖民时代更远的历史时期，印度各个王朝不断扩展宗教边

① Bhumitra Chakma, *South Asian Regionalism: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Bristol University Press, 2020), p.135.

② 肯尼思·奥耶：《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第238页。

界、语言边界，一度建立过密切的经济网络和一定意义上的宗教-文化共同体。南亚各国也并非不能认识到区域一体化的好处，在南盟建立之初，各国或多或少也曾对与区域主义相关联的美好愿景抱有过热切的期待。然而南亚区域主义之所以面临发展缓慢的困境，并不是因为印度、南亚小国与巴基斯坦在地区合作议题上采取了不理性的策略，而是一个政治上分裂、安全思维占主导的区域无法发展出普遍意义上的区域主义。

区域内国家共有的合作思维决定着它们在互动过程中的策略如何排序，而这种排序和选择的过程就是报偿结构逐步影响区域化的过程。南亚安全主导型的合作逻辑衍生出僵局型的策略选择，而每个国家僵局策略的交互则形成了南亚共同发展的困局。当区域主义不能为印度打开建立地区霸权的方便之门时，多边主义便成为了大国的枷锁，印度不会多此一举自愿选择受到制度的约束；当区域主义不能满足南亚小国和巴基斯坦对于安全与繁荣的期待时，多边主义成为了小国的负担，如果以失去自主权为代价才能实现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这样的选项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南亚国家来说越来越不具有吸引力。由此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是，南亚国家在双边层面的冲突未能在多边框架下得到调和，达成区域协调极其困难，因为区域合作进程本身是由安全逻辑、而不是发展逻辑决定的。

一些对国际合作的经典研究认为，重复，或者重复的实体——制度，会改变国家的报偿结构，使它们可能从合作困境演化为另一种合作型的博弈情形。这些研究认为，行为体的报偿结构在制度化后可以依托可靠信息和日渐形成的规范而得到改善。但是，南亚各国在区域主义中的报偿结构显示，区域主义不仅不会增加各国在合作中的总体收益，更可能的结果是它们拥有的权力都被弱化了——强势方的领导权受削弱，弱势方的自主权遭侵蚀。当已建立的合作机制是低效的，就不得不考虑这样一种僵局状态，即通过协调也不能实现共有利益的情况。因此，各国在区域合作中的报偿结构特征反过来决定了区域主义的未来。对南亚地区两种不对称博弈情形的分析表明，南亚区域主义实际上的推动者始终是以地缘政治为第一考虑的国家，而不是通过所谓机制的惯性来维持的。如果南亚突破不了安全主导的合作思维、不改变政治割裂的状况，各国就很难重构报偿、摆脱区域主义的发展困境。

Biden Administration Restarts US Climate Cooperation with China and its Limits

Ou Ge

Abstrac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issue of climate change. After taking office, it sets out to restart US climate cooperation with China, which had stalled during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o this end,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reinvigorated the policy agenda of climate governance at home and resum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obligations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including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with China on climate change. The resumption of US climate cooperation with China is a result of the climate philosophy of President Biden and his policy team. It is driven by domestic political factors such as the traditional climate position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pressure from the progressive members within the party, and influence of domestic interest groups. It also serve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overall China policy. However, such resumption has been difficult owing to the paradigm of 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 There are multiple restrictions like constant constraints from the Republican Party which is tougher on China, the ga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on the responsibility sharing for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and the dilemma between "climate first or containing China first".

Key words: Climate Change; Biden Administration; Sino-US Cooperation; Strategic Competition

Author: Ou Ge, Ph.D. Candid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iplomacy,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Self-restraint: Domestic Reason for Rising Power Strategic Retrenchment

Pu Yiyuan

Abstract: As a strategic means of accumulating strength and alleviating external security pressures, strategic retrenchment has become a major choice for some rising powers. However, the phenomenon of strategic retrenchment among rising

powers has yet been theorised. Existing studies often focus on the strategic retrenchment of hegemonic powers during the order replacement period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s of rising powers, while neglecting the aspect of rising powers choosing limited strategic retrenchment during their ris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timing of strategic adjustment, the allocation of strategic resources, and the revision of strategic objectives, this paper connects expansion and contraction as strategic options; and examines two strategic retrenchment cases of Bismarck's Germany and the early Song Dynasty's reunification. Both cases involved strategic retrenchment based on domestic political logic, thereby delaying, or even avoiding, the emergence of an order war with the hegemonistic powers, despite the presence of considerable external expectations. Investigating the internal political mechanisms by which rising powers maintain their strategic stability in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great powers helps to rethink the strategic choices of rising powers under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Key words: Strategic Retrenchment;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National Absorptive Capacities; Bismarck's Germany; Song Dynasty Unification War

Author: Pu Yiyuan, Master Candid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Jilin University.

Operational Logic and Prospective Analysis of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Ideological Offensive against China

Shi Lichun

Abstract: Since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ook office, it has been following the vision and goals of its predecessor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Indo–Pacific Strategy", and intensifying the struggle over values and ideology against China, with the strategic intent of containing China's rise and maintaining U.S. hegemon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revived a political concept warfare of ideological attacks on China, pursued the alliance strategy, made use of the attack tactics of speculation on hot and sensitive issues related to China. These have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China–US relations and eve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

conomic orde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ideological offensive against China has its own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and its future course is full of uncertainties. In this regard, one should not underestimate its capabilities and effectiveness, but als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its objective difficulties and subjective fluctuations of will, take measures and respond effectively.

Key words: Biden Administration; China; Ideology; Strategic Offensive

Author: Shi Lichun,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Marxism, Sichuan University

How does Asymmetric Structure Determine Regional Cooperation : an Analysis of Regionalism in South Asia

Li Mingen

Abstract: In the regionalization history of south Asia, the cooperation among states in this region has not run smoothly and has always been low in efficiency. Besides, these states have not dispelled hostility or built trust in the course of regionalism. This article applies the perspective of unsymmetrical payoff structures to explain how India, Pakistan, and the other weak South Asia states , which are players in regionalization of South Asia, adjust strategies and what effects these strategies can cast on regional cooperation.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power structure determines the scope of strategies players can choos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yoff structure. In regional cooperation, an unsymmetrical payoff structure will decide whether the three key players can change their original strategies. India, weak South Asia states, and Pakistan adopt preferences of deadlock game, chicken game, and slimmer deadlock game for all of them take state security as a core concern, and the payoff structures also characterized by asymmetry. In regionalism in South Asia, there is a villain game between India and the weak South Asia states, and an asymmetry deadlock game between India and Pakistan. The two-game matrix indicates that regionalism is not only unbeneficial to the member country, but also that the intersection of strategies may gradually evolve into a stalemate in which all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tend to be more uncooperative. Therefore, faced with the dilemma of "repeated failure" and

《战略决策研究》2024年 第1期

"spillover of disputes", regionalism can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regional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only when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reconstruct the compensation structure and break through the security-oriented logic.

Key words: Regionalism; Payoff Structure; Asymmetric Game; South Asia; India

Author: Li Mingen, Ph.D. Candid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Yunnan University

《战略决策研究》2023年总目录

第1期

- | | |
|-------------------------|--------------|
| 全球海洋公域治理的难题和解决机制 | 陈伟光 孙慧卿 (3) |
| 争夺“灰色地带”：美国安全战略的变化 | 周子淙 (22) |
|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的特点 (2017-2022) | 侯冠华 (40) |
| 拜登政府主办议题峰会的特点 | 刘 畅 (59) |
| 美国北极政策的变化及其动力 | 杜晓杰 谢晓光 (81) |

第2期

- | | |
|---------------------------|--------------|
| 主导国和崛起国的时间认知及其影响 | 田德荣 (3) |
| 美国背离盟友的行为特点分析 (2017-2022) | 谢乐天 (25) |
| 拜登政府南海政策的特点 | 王 森 (46) |
| 英国介入“印太”地区的政策 (2016-2021) | 熊雨荷 (62) |
| 澳大利亚战略视野下的AUKUS抉择 | 许少民 李 琦 (81) |

第3期

- | | |
|-------------------------|--------------|
| 金砖国家对全球经济治理的贡献及其限度 | 杨楚乔 (3) |
| 欧盟次区域组织在欧洲一体化中的作用及其缘由探究 | 边敏嘉 (19) |
| 印度尼西亚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动因与限度 | 徐晓芳 (42) |
| 竞合视域下的越南海洋国际合作 | 林 丽 唐丹玲 (61) |
| 中美关系紧张态势下韩国舆论导向的特征分析 | 葛小辉 (85) |

第4期

揭秘“去全球化”和“再全球化”：理解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结构性力量

李 彤 (3)

区域海洋治理的生成逻辑与善治条件：以地中海治理为例

唐丹玲 郁清漪 (15)

欧盟应对“外籍战士”的策略及其困境

燕新华 (37)

俄乌冲突与德国能源安全战略转型

张语娇 沈文辉 (62)

欧盟庇护政策对难民危机的差异化应对及其原因

王越赞 (85)

第5期

全球主权债务：权力结构与治理体系

刘 宁 (3)

人工智能与国际关系：预期与变革

池志培 (26)

加拿大“印太战略”分析：缘起、主要内容及影响

刘奕玮 (47)

政府产业扶持、大国技术竞争与韩国三星的成长

罗仪馥 (73)

第6期

美国发动代理人战争的国内原因：以叙利亚内战为例

陈 翔 (3)

从走近到疏远：美国与萨达姆政权的交易型代理关系困境 (1979-1991)

文少彪 王利莘 (31)

“一带一路”数字合作：成就、挑战与展望

李 青 易爱娜 邹嘉龄 (51)

非洲安全治理自主性的危机与探索

郝楚语 袁田西竹 (68)

罗马尼亚国家安全战略的特点 (1990-2022)

曲 岩 (90)

注释体例

注释是正文中某一特定内容的进一步解释或补充说明,用①、②等序号标注在文中,序号标在标点符号后,每页重新编号。

(一) 中文注释

首次注释时,中文文献的标注次序为:作(编)者姓名、文献名、卷册序号、出版单位、出版时间、页码。再次引用同一中文文献时,则仅标注作(编)者、文献名、页码即可。互联网资料应注明作者、文献名、首次发表时间,提供的网址应完整,如果属于动态链接,则注明网站名称即可。

1. 专著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梁守德、洪银娴:《国际政治学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页。

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页。

2. 编著

张蕴岭、周小兵主编:《东亚合作的进程与前景》,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7页。

3. 译著

威廉·沃尔福思:《单极世界中的美国战略》,载约翰·伊肯伯尔主编,韩召颖译:《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9~117页。

4. 期刊杂志

张蕴岭:《推动构建和谐亚太地区的意义》,载《当代亚太》2007年第1期,第3页。

吴承明:《论二元经济》,载《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第98页。

李济:《创办史语所与支持安阳考古工作的贡献》,载台湾《传记文学》1976年第28卷第1期,第50~78页。

5. 报纸

《朝韩首脑会晤程序大多达成协议》,载《中国青年报》2000年5月12日。

王如君:《中国发展有利于世界》,载《人民日报》2008年1月18日。

6. 通讯社消息

《和平、繁荣与民主》,美新署华盛顿1994年2月24日英文电。

7. 会议论文

任东来:《对国际体制和国际制度的理解和翻译》,“全球化与亚太区域化国际研讨会”论文,天津南开大学2000年6月5日~16日,第2页。

8. 学位论文

孙学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20年:1979-1999》,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硕士论文,2000年1月,第39页。

9. 互联网文献

《泰国选委会公布大选计票结果》,新华网,2007年12月24日, <http://news.xinhuanet.com>

10. 转引文献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88页,转引自杨玉圣:《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3页。

(二) 英文注释

基本规范同于中文注释。此外,作(编)者姓名按通常顺序排列,即名在前,姓在后;作者为两人,之间用and连接,两人以上的注明第一作者,其后用斜体标注et al.;编者后加ed.,两人以上的加eds.;论文和文章用引号标注,主标题与副标题之间用冒号相隔,期刊名称和书名使用斜体标注;页码的首页标注p.,多页标注pp.。

1. 专著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cGraw-Hill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 81.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Alfred A. Knopf Inc.), 1985, pp. 389-392.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Little Brown Company, 1977), pp. 45-46.

2. 编著

David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06.

Klaus Knorr and James N. Rosenau, eds., *Contending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225-227.

3. 译著

Homer, *The Odyssey*, trans. Robert Fagles (Viking, 1996), p. 22.

4. 论文

Robert Levaold, "Soviet Learning in the 1980s", in George W. Breslauer and Philip E. Tetlock, eds., *Learning in US 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 (Westview Press, 1991), p. 27.

Stephen Van Evera, "Primed for Peace: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3, 1990/1991, p.23.

Nayan Chanda, "Fear of Dragon", *Far Eastern Economics Review*, April 13, 1995, pp. 24-28.

5. 报纸

Rick Atkinson and Gary Lee, "Soviet Army Coming apart at the Seams",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8, 1990.

6. 政府出版物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Rostow) to President Johnson", November 30, 1966, *FRUS*, 1964-68, Vol. II, Vietnam 1966, document No. 319.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hite House, December 2017, p.25.

7. 会议论文

Albina Tretyakava, "Fuel and Energy in the CIS", paper delivered to Ecology' 90 conference, sponsored by the America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Airlie House, Virginia, April 19-22, 1990.

8. 学位论文

Steven Flank, *Reconstructing Rockets: The Politics of Developing Military Technologies in Brazil, India and Israel*, Ph.D. dissertation, MIT, 1993.

9. 互联网文献

"World Economic Outlook 2009",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October, 2009, p.74,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16/12/31/Sustaining-the-Recovery>

10. 转引文献

F. G. Bailey, ed., *Gifts and Poisons: The Politics of Reputation* (Basil Blackwell, 1971), p. 4, quote from Paul Ian Midford, *Making the Best of a Bad Reputation: Japanese and Russian Grand Strategies in East Asia*, Dissertation, UMI, No. 9998195, 2001, p. 14.

(三) 非英文的外文文献

凡此类文献,请翻译为中文,并参照中文文献注释规范注释,请在作(编)者姓名前标注国籍,并在出版单位前标注所在国家。

[日本] 明智慧:《日本文化导论》,[日本] 文斐阁 1998 年版,第 23 页。

战略决策研究 (双月刊)

JOURNAL OF STRATEGY AND DECISION-MAKING

编 委：王 玮 王玉主 毛维准 节大磊 叶晓迪
田 野 刘 丰 池志培 阮建平 李 形
李 青 李开盛 李隽旻 杨 原 杨攻研
宋国友 张 鹏 张 骥 陈 冲 陈志瑞
陈寒溪 周方银 周玉渊 赵 柯 徐秀军
凌胜利 隋广军 隆德新 董青岭 曾向红
魏 玲 (按姓氏笔划排序)

主 编：隋广军

总 策 划：李 青

执行主编：许陈生

责任编辑：张 健 曹金芳

英文编辑：赖雪仪

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该社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并支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我社上述声明。

《战略决策研究》 2023年审稿专家名单

本刊严格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制度。2023年，本刊得到83位国际政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区域国别学等领域专家的大力支持，对来稿进行匿名评审和严格把关，为提高本刊学术质量付出了辛勤劳动，做出了重要贡献。现将匿名审稿专家名单公布如下（按姓氏笔划排序），并向各位专家致以最诚挚的谢意！祝愿各位专家2024年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期待各位专家继续关注支持本刊发展！

王 玮 王树春 王 看 王 燕 韦宗友 毛 悦 古小东 节大磊
左希迎 卢 晓 叶晓迪 田光强 代 帆 冯 梁 兰 江 匡增军
朱 旭 刘 丰 刘 冲 刘若楠 刘继森 刘 彬 池志培 汤 伟
许少民 严少华 李 畅 李明明 李眉颖 李家成 李 彬 李皖南
杨友孙 杨攻研 肖鹤飞 吴金平 吴 艳 何 韵 邹志强 沈 陈
忻 恠 宋国友 张明亮 张 凯 张建立 张 春 张 鹏 陈伟光
陈 冲 陈 祥 陈 翔 陈寒溪 罗仪馥 周方银 周新军 郑东超
郑春荣 孟晓旭 赵卫华 赵 柯 胡文涛 胡 冰 信 强 施爱国
秦 升 徐 进 徐秀军 凌胜利 唐小松 唐 静 黄迎虹 黄登学
曹 玮 崔 越 隆德新 董 亮 韩永红 韩永辉 程永林 曾向红
赖雪仪 漆海霞 熊 炜

《战略决策研究》编辑部